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

(研究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16

2013 年春季号
总第 16 期



河海社会学 (研究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河海社会学（研究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胡 亮

主 编：朱娟娟

编 辑：冯 燕 孙运宏 彭 翔 王刘飞 谢江平

投稿E-mail: hhu1915@163.com

刊 号：校028

目 录

环境社会学

- 农村环境问题的三重维度阐释 蒋培 (1)
- 强制性与自发性: 农村生态环境忧思 盛钊添 (12)
- 影响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相关因素分析 刘月平 (22)

城乡社会学

- 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毅杰、冯显杰 (31)
- “种”出来的困境
- 对江苏省宿迁市荷塘村“种房子”的调查研究 蔡娟 (43)
- 单位社区的变迁所带来的问题研究
- 以某高校家属区为例 肖馥纓 (54)
- 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调查研究
- 以 HH 大学 J 校区为例 胥鉴霖 (62)

移民社会学

- 可行性: 非自愿水库移民社会整合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刘永飞、许佳君 (76)

求 索

- 现役军人婚姻质量的调查研究 冯燕 (86)
- 90 后大学生面子意识与消费购物决策风格关系的一项实证研究 石蕾蕾 (98)
- 同龄群体对发型选择的影响机制探析 朱运亮 (109)
- “光棍节”大学生消费现状、影响因素及特点研究 李亚慧 (117)

开卷

农村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顾金土、邱昊 (128)

快讯

施国庆教授等参加湄公河流域水电可持续水电规划研讨会 (11)

我校师生参加“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科学研讨会” ... (21)

河海社会学喜获三项省社会科学奖 (30)

我校陈涛博士荣获首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53)

顾金土副教授讲座：农村人居环境评价及建设研究 (61)

教育部公布 2012 年学科评估结果 我院学科发展稳中有进 (97)

牛津大学 Anna Lora-Wainwright 副教授讲座：环境-健康的人类学研究 (108)

博士生蒋培获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资助 (116)

洪岩壁博士讲座：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127)

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 (137)



环境社会学

编者按：环境社会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社会学分支。环境社会学以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探索环境与社会相互影响、制约、作用的机制，以及与环境关联的社会冲突、公平公正、社会建构、制度建设等事项。此版块遴选的三篇文章从农村环境治理维度、农村生态发展等角度对环境社会学相关研究主题进行了探讨。

农村环境问题的三重维度阐释*

——义村个案研究

蒋 培

摘 要：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转型期间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保护农村环境，治理农村污染，不仅要注重技术、法律、制度方面的完善，更需要用社会学的视角从农村社会内部的政治资源、经济利益、传统文化三重维度的变化中寻找原因与可能的切入点。本文以义村为个案，通过实证调查考察了当前农村的环境状况，并认识到农村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村环境问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义村 环境问题 文化断裂 经济利益 话语权

十八大报告首次列专章来阐述生态文明，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成为环境保护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村民环境行为与农村面源污染研究”（批准号 12BSH021）和浙江省生态文化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生态环境变迁与行为范式变化的互动机理研究”的阶段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污染企业实行搬迁，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加速发展等，使得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逐渐被摆上议事日程。但是，直到今天，农村环境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很多的新问题与新矛盾，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亟待攻克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文献回顾及评述

当前，学术界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除了自然科学领域注重农村环境污染监测评估与课题研究之外，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开始重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就现有的研究情况而言，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在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重城市环境，轻农村环境；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政府管理，轻农民参与的问题。在监督管理制度上，行政主管部门及其职责定位多变，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照搬城市模式，难以在农村发挥效用。在法律体系、制度方面，缺乏基于法律或专门性法律和法规；立法滞后，立法存在空白；立法不够配套；立法内容不够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的特点，等等（蔡守秋、吴贤静，2009）。

第二，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当前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是城乡不平等（郭琰，2008），城乡二元分治的模式对农村环境保护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城乡二元体制降低了农村对环境的需求。由于农村相比于城市更关注经济发展与提高收入，对环境的关注减少。其次，城乡二元体制削弱了农村对环境的治理能力。农村因为资源、技术的缺乏，在环境保护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城乡环境差距不断扩大（李宾、张象枢，2012）。

第三，农村环境保护经济投入力度不足。目前，全国大部分行政村普遍负债，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中尚没有农村环境保护的专项基金，银行、企业和社会私人资金也很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资金非常匮乏（易国锋，2007）。同时，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环境的范围较广，需要关注与治理的面较大，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农村环境保护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

第四，农村环境教育不足与农民自身意识淡薄。我国环境教育起步较晚，农村环境教育几乎空白，农民的环境知识与环境信息严重缺乏。同时，农民自身环境意识淡薄，存在许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对自身影响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易国锋，2007）。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农村环境保护的确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需要从法律法规、社会体制、经济投入、环境教育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来逐步改善农村的环境状况。从当前的研究内容来看,更关注农村环境问题出现的外在物质性因素,却很少用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农村社会中非物质性社会文化逻辑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影响。从社会学角度来关注农村环境主要偏重于从社会结构、社会规范、话语权力、环境意识、经济理性、现代性等方面阐释面源污染的形成机制,如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洪大用等,2004)、传统环保规范失灵(陈阿江,2000)、乡村知识的边缘化与附庸化(王晓毅,2010)、农民环境意识薄弱(杨明,2002)、农民的“有限理性行为”(王跃生,1999)、现代化性的侵袭(秦红霞等,2006)等。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利用历史性分析的方法来关注农村社会结构与文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下是如何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基于义村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在农村环境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断裂,经济利益的先行,话语权霸占等现象对农村环境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案例村及其环境问题

在社会转型期间,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等发生极大变化,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等问题摆在了农民面前。农民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搞懂现代化的含义,就已经被社会戴上了“现代化”帽子,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也在短时间内被抛之脑后。随之而来的是各类社会问题,社会文化不适应,农村环境状况恶化,经济利益崇拜化等。本文选取了在现代化下环境状况发生恶化的一个典型村——义村^[1]作为研究个案,来深入剖析农村环境问题背后的成因。义村位于杭州临安市Q国家自然保护区东南侧,东距临安市西部大镇CH镇48公里,西距浙皖边界昱岭关25公里。全村现有161户,552人,水田295亩,山地4916亩。产业主要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尤其是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已成为该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同时,义村在历史上位列临安市西四大名村之一,历来属办学圣地,教育发达,以忠孝文化著称,被称为“忠孝文化第一村”。

2012年7-8月,笔者及其课题组成员在义村进行了多次调研,并与调查对象保持着电话联系,时刻关注义村环境污染问题。课题组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问卷法以及口述史的方法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获取了义村近几年的村委会议记录以及村志等资料。访谈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也有少量年轻人,以及村中现任村干部、

[1] 按照学术规范,对案例村进行了处理,采用了学名。

前任村干部等，访谈人数累计超过 30 人。本文正是基于以上所收集的资料来展开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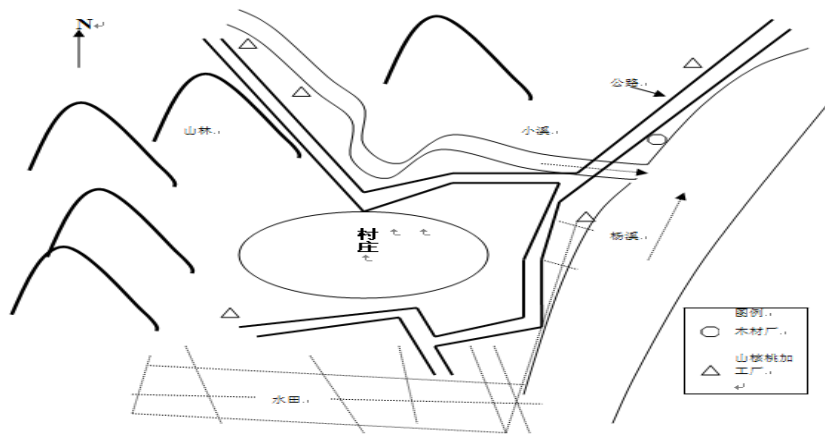


图 1 义村地理位置分布图

义村虽属山区，但村中水系却很发达，村前有杨溪流过，村中也有一条小溪穿过，水田中沟渠网络密集，各路水系相互贯通。村庄周围是山林，海拔在 200-300 米。按照中国风水学说，义村处于“背靠山，面朝水”的极佳风水位置。村中现有山核桃加工厂 5 家，木材加工厂 1 家，分布情况见图 1。值得关注的是，在村庄中间主要是一些古宅民居，现已受到保护，新建的住宅主要分布在外围与马路边上。

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义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主要包括：

（一）工业污染

义村中的工厂主要是山核桃加工厂与木材加工厂，都是本村人自己经营的。木材加工厂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木材废料飘在水面上，对水体造成很大污染。作为本村最大的经济收入来源的山核桃加工厂遍布于整个村庄，现有 5 家之多，而且都沿河和水田分布。山核桃加工过程中有一道“去麻”的工序，需要在其中加入化学添加剂，产生的水体呈现红色，排入水体会产生严重水体污染。每年自 9、10 月份之后，山核桃加工厂就开始大量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水体中。据实地访谈得知，每到那时村中的水体都呈红色，不要说饮用水，就连洗衣服都不行。像这样的污染状况一直要持续到次年 3、4 月份。

（二）农业污染与自然灾害

1. 生态林减少：由于山核桃的经济效益较好，大量的生态林被砍伐，种上了山核桃树苗，山核桃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到 2011 年底，全村山核桃林种植面积超过 2000 亩。在解放前全村山核桃产量只有 1-2 吨，到了 2006 年全村总产量为 35 吨左右，而到

了 2011 年全村产量在 100 余吨。多的种植户有几十亩，一年可以收获 2000-3000 斤。但随之而来的是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现象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也大大减少，打破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2. 农业面源污染：为了提高山核桃的产量，大量的农药与化肥被使用，在雨水的冲刷之下，流入河流中。同样，水田中也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农业面源污染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3. 土壤污染：在山核桃树林中使用大量的化肥，不仅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对土壤也产生很大影响，土壤板结严重，植物树根逐渐腐烂，短期内难以恢复。

（三）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污染

虽然有垃圾回收箱，但是大量生活垃圾堆放在路边、河边与山林中，路上还堆放着猪粪，散发着恶臭，对周边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包括人尿、粪便等，只经过简单的沉淀过滤，直接排入水体中去，增加了水体的负担。

三、传统文化断裂

环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危机。林恩·怀特指出“我们对生态的所为依赖于我们关于‘人—自然’关系的思想”，而基督教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提倡对自然的征服态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Lynn White, 1967）。同样，在义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断裂对环境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反思环境问题需要寻找文化根源中的困境。

（一）忠孝文化的断裂

忠孝文化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强调不仅要对父母孝敬，对长辈尊重，对国家忠诚，同时还需要有一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恻隐之心。仁有亲近的意思，孟子主张要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把爱心推出去，扩展开来，怜爱珍惜万物。孟子的恩惠对象包含外物，这用今天的话来讲，他的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包括外部世界。这种思想，到了汉唐更为明确。郑玄在给孟子这段话作注释的时候说：“仁，爱人以及物。”唐代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说：“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物”包括禽兽、草木。爱，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乔清举，2011：206）。

义村自宋代以来就被称之为忠孝文化村，村内有二十四孝之一的陈斗龙的祠堂，还有忠臣韩世忠的陵墓，忠孝文化的根基十分深厚。在最近几年，义村还被市政府冠以“忠孝文化第一村”的荣誉，具有一定知名度。但根据笔者的实证调查，发现忠孝文化只是停留在表面，仅作为义村的形象工程与宣传工具，为的是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助。忠孝文化原有的仪式都已失传，难以有效地整合起义村村民的忠孝文化思想，更难以对

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相距很远。在村中仍然存在不孝敬父母、不尊重长辈、邻里纠纷、村民与村干部对立的现象。在义村，忠孝文化已经出现了断裂。这可以通过访谈笔录来予以验证。

[陈大妈，60岁，家中有6口人，大儿子作油漆工，小儿子在德国当厨师。家教很好，在村内享有名声] 我们村忠孝文化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中老年妇女跳跳排舞来进行的，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关键还是靠自己教育。我们家比较注重家庭教育，比较严格。家庭内部关系较好，家庭和睦，婆媳之间关系很好。但本村的婆媳关系也有很多不好的，外地人（媳妇）多于本村人，相处起来比较难。村里也存在不孝的家庭，也有儿子打母亲的情况存在。（2012年7月20日访谈内容）

正是由于义村忠孝文化的实质早已断裂，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爱人、爱物的恻隐之心也发生了改变。村民有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可以毫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环境破坏。可以说，忠孝文化的断裂使得义村村民的思想观念早已转变，与现代化冲击之下的普通社会人群并无差异，也是义村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村落规范的丧失

迪尔凯姆将由于社会分工发展速度过快而引起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旧的共同价值规范失去了在社会联系与社会协调中的作用，而新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及时产生而引起的社会状态称为“失范”（L·A·科塞，1991：151）。在现代村落中，传统的规范失去了原有的控制力，而新的社会规范和新的生态伦理或者没有产生或者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水域污染这类社会失范现象的产生就不可避免（陈阿江，2000）。在义村，传统文化规范的丧失是有客观原因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纷纷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从事制造业生产或服务业工作。他们接触到了城市中多样的文化，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却把传统村落的行为规范抛弃了。等到他们重新回到农村生活或工作时，原有的生活方式早已发生变化，讲究的是更多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索取。于是，农村中生活垃圾逐渐开始增多，坐式马桶开始在农村流行，农药、化肥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各类皮革制品、塑料制品也开始泛滥，而勤俭节约、保护环境意识却越来越淡薄。

在传统村落社会中，长辈或村中舆论谴责是最为严厉的规训手段，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传统规范逐渐失去了威力，村落中出现了各类失范现象。在义村调查期间，有两户农家因为土地纠纷的问题，相互之间产生了怨恨。其中一户为了报复另一户，在他家门前的马路上倒放垃圾与猪粪，在村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无论是村干部还

是村中舆论的谴责，都难以使其收敛，仍旧时常把垃圾倒放在人家门口的马路上。正是农村传统规范的丧失，农村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外源污染，还表现在内生污染。村民原有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水塘、小溪、小河、田地、马路等都成了纳污的地方，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疏远。

四、经济利益先行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倒 U 型关系。由于它同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U 型关系非常相似，故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Panayotou T., 1993）。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作如下解释：在经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将随着经济增长而加重，在经济发达阶段，环境污染则随着经济增长而减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先经济，后环境”的发展模式，在当今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也同样遵循相同的路径。义村的经济发展也带有这样的痕迹。

（一）“绿色”的假象

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临安山核桃的品牌知名度也逐渐扩大，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成倍增加。义村作为临安山核桃的主要产出地，近年来山核桃产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提高山核桃的产量，农民砍伐了大量的生态公益林，都种上了山核桃树苗。所以，虽然是同样的绿色树木，但绿色背后的意义已发生了变化。首先，经济林取代了公益林，经济利益超过了环境效益。种上山核桃树之后，由于采摘要求，山核桃树下寸草不留，光秃秃的，等到下雨季节，水土流失与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较大。其次，村民为了追求产量，山核桃树的农药、化肥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农业面源污染越来越严重，土壤污染情况也令人担忧。最后，由于大面积的开发山地，种植山核桃树，导致原有森林植物群落的单一化，生物多样性大大减少，甚至可能对地方的局部气候造成影响。

从以上可以看出，义村山核桃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产量也在逐年递增，但这种“绿色”却是一种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状况的假象。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义村村民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山核桃的产量，而没有考虑到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与生态破坏，选择了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二）经济“短期综合症”与环境“慢性病”

“环境稍微污染一点，从经济上来说还是划算的。”这样的说辞在日常生活中仍能经常遇到。经济利益相对环境利益来看，似乎有一种“先天优势”，只有经济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农村居民，在经济利益面前都犯有“短期综合症”，

只顾当前利益，不顾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可能产生的各类负面影响。经济利益往往被放大和摆在突出位置，而环境利益却经常被忽视和遮蔽在幕后。这样的例子在义村有很多，举其中的两例，一个是上文提到了山核桃的例子，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不断地扩大山核桃树林面积，同时在树林中使用的化肥与农药的剂量也越来越大，造成了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另一个例子是山核桃加工厂的污水排放问题，有的工厂虽然安装了污水处理池，但经笔者实地调查，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运作起来，因为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成本，在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条件下，污水处理设备往往处于闲置状态。由此看来，在一般村民与村干部眼中，经济利益远远高于环境利益。

但反之，环境状况得不到关注，各种“慢性病”会逐渐暴露出来而且在义村已经开始出现。水质恶化、土壤板结、自然灾害、身体健康影响、产业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已经使义村人意识到环境对于自身的重要性。所以，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对于人类来说都不可或缺，但不要仅仅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视环境状况于不顾，发展经济需要从价值观念上逐渐转型，需要意识到环境效益的重要性，能够从长计议。

五、话语权霸占

当今中国农村治理的法定模式是村民自治，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农村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权往往被少数人霸占。正如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曾说过：“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加塔诺·莫斯卡，2002：2）要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仍需要经过长期的改革与斗争，民主在当前只是对少数人而言。

（一）谁在说话？

那么，现在在义村，谁在说话呢？中国农村的变迁历史告诉我们，农村的政治权利或者说农村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村中的干部与能人手中，而这些干部与能人往往是在当地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或者在某些政治资源、技术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群体。义村也不例外，在村中“能说话的人”主要是村干部与各类私营企业主，而且很多时候这两种身份往往重合在一起。义村话语权的霸占，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话语霸权之下，各类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为自身牟取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村民的利益。在话语霸权的情境中，普通农民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也失去了反抗权威的力量。

在义村，环境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几家山核桃加工厂排污造成的，而这几家山核桃加工厂的老板都是本村的现任或者前任村干部。所以，虽然工厂排污对村民的日常生

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有部分村民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义村的山核桃工厂排污现象仍没有根本解决。原因在于村干部等能人往往代表了全村，在环保等部门的检查过程中往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普通的村民却难以得到反映真实情况的机会。话语权掌握在村干部等少数人手里，从他们口中透露出来的问题与信息也已发生了变化，真相却被掩盖住了。

（二）少数人的民主

话语霸权在有的时候会演变成权力资源的垄断，甚至能够凌驾于国家的制度与法律之上。在义村，曾经有一个告示，告示中呈现的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告 示

广大村民：

义村如来佛是始建于清代的历史文物，是义村百姓非常信仰的佛教古迹，现正在恢复重建中。但在这关键时刻，如来佛上方荷花石帽突然不在原存放处，去向不明。

村委会特告示：如是好心人真心保管在那儿，请于****年*月*日*时前主动拿出来或主动与村干部联系，村委会表示欢迎和感谢。超过时间，村委会正式向公安部门作为文物盗窃案件报案，一切均由公安部门查处。

欢迎广大村民主动提供有关线索和信息，村委会可以为您保密，一经查实，给予奖励。

特此告示。

义村村委会

****年*月*日

可以说，义村村委会是最为典型的具有话语霸权的少数人代表。按照国家有关文物保护与刑事法律规定，村集体财产遭受盗窃后，村委会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及时进行查处。但在案例中，义村村委会利用自身的权力违反了法律程序，制订了自己的一套方案来行使自身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凌驾于法律与制度之上的现象，反映出农村话语权被霸占后权力资源也同时被垄断，少数人的民主代替了大部分人的民主。整个村落掌控在少数人手里，而其他村民的民主权利则被无情的剥夺了。分析其原因：其一，从义村的地理位置来看，处于浙江、安徽两省交界之处，距离县城也有三个小时的车程，相

对来说比较封闭，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干扰比较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村干部等能人的权威被放大，影响力也越大。其二，义村所处的昌西地域，历来政治文化具有很浓的地方性特色，地方政治有较强的自主性，地方政治力量的控制能力较强。

正是这些拥有话语霸权的少数人垄断了地方的政治资源，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的过程中，甚至能够超越相关法律法规。各级立法部门所颁布的环境法律法规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对这部分群体来说，遵循法律、制度的规定是表面上的一套说辞，在实际中，则利用各种权力优势与资源网络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把环境成本外部化，转嫁到整个社会中去。

六、结 论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都发生很大的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外部环境对农村的影响，更需要理解农村社会内部如何应对冲击与调整自身结构。就以环境问题为例，很多外部的政策、措施、制度等都已经比较完善与健全，但到了农村实际运作中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问题也许就出现在农村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中。农村环境问题治理需要“标本兼治”，才能达到一定效果。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才能真正改善农村的整体环境状况呢？也许只有通过弥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转变急功近利甚至竭泽而渔的价值观念；调控农村政治资源，把话语权赋予给广大的农民，才有可能对农村环境问题治理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蔡守秋、吴贤静，2009，《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成就、问题和改进》，《当代法学》第23期。
- 陈阿江，2000，《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郭琰，2008，《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学术论坛》第7期。
- 加塔诺·莫斯卡，2002，《统治阶级》，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L·A·科塞，1991，《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宾、张象枢，2012，《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研究》，《生态经济》第4期。
- 乔清举，2011，《儒家生态文化——泽及草木，恩及水土》，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易国锋，2007，《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对策》，《农业环境与发展》第6期。

Lynn White, 1967,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3767):1203—1207.

Panayotou T. ,1993,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Z].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WP238.

☆ 作者简介：蒋 培，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孙运宏

※ ※

施国庆教授等参加湄公河流域水电可持续水电规划研讨会

2012 年 12 月 10-12 日，湄公河流域水电可持续性规划研讨会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中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以及南亚、欧洲、美洲、非洲有关国际机构、政府部门、水电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4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环境和社会经济基底研究途径为主题进行研讨，就不同流域在水电站的环境流量、鱼道、泥沙、水质、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移民、健康、跨领域内容的基底调查及监测评估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水电协会管理委员会委员施国庆教授，国土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余庆年副教授和法学院王志坚博士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就水电开发中的受影响社区和生计、移民、少数民族、公众健康、际河流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发言和讨论，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会议期间，施国庆教授、余庆年副教授还与参会专家进行了广泛交流，与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的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就双方在科研、教师和学生访问、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的可能合作进行了交流，形成了一些初步意向。

（公共管理学院 供稿）

强制性与自发性：农村生态环境忧思

——苏南 S 村与皖中 Z 村的对比研究

盛钿添

摘要：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五位一体”新理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要求。在加速城市化和城市环境问题逐步解决的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是基层政府和村民关注的焦点。苏南 S 村和皖中 Z 村反映出构建“生态村”的两种类型，前者是打造生态旅游村的“他组织”社区，人口回流对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后者是回归原初生态村的“自组织”社区，人口空心化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无论是他组织还是自组织，都要在实践中把握“度”，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村环境 人口流动 政府决策 自发性 生态村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五位一体”新理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要求，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科学家海克尔《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著名作家罗伊·莫里森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1]，把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保护生态环境^[2]、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充分反映出人们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一切美的、

[1]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首次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

[2] 2003 年，黎祖交围绕《“生态环境”的提法值得商榷》一文阐述了“生态环境”的使用存在误区，多年来人们使用这一词所表达的真实含义相当于生态学中所说的“生态”、“生态系统”、“生态状况”。过去《辞海》中并未出现“生态环境”的解释，在《辞海》第 6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中才将“生态环境”单独列出，是指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本文中使用的“生态环境”概念来源于此。

好的、健康的、和谐的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并将其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生态旅游”、“生态科技园”、“葡萄生态园”、“生态假日酒店”等等出现于偏远乡村、城郊结合部抑或城市的大街小巷，“生态”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词汇，而演变为商家的营销策略、政府的建设手段以及民众的信任来源，发挥的经济社会效应与应该达成的目标有一定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和农村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不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带来的环境问题引起国家、企业、个人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境治理技术的成熟，城市环境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而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迫切要求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质量，不同区域的农民目的一致，出路不同。一种出路是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思路，倾力打造生态旅游村，农民回流在家乡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另一种出路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在乡镇或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回归原初生态村。这两种出路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二、苏南 S 村与皖中 Z 村简介^[1]

1. 苏南 S 村现状

苏南 S 村归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周村社区管辖，最初只是一个掩在牛首山中的破旧古山村，58 户人家，200 人左右，农民以种田为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村庄周边开始发展工业经济，外出打工的人日益增多。2008 年前后因京沪高铁建设，70%村民的土地被征收，一夜之间他们沦为失地农民，农业基础薄弱。2011 年，为建设美丽乡村，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江宁区政府将区位独特的 S 村规划为农业旅游示范村“五朵金花”之一，定位为牛首山风景区的“后花园”。同年 10 月起，由政府出资，经过集中打造，S 村由原本普通村庄成为一个较大的农家乐。从自然景观上改头换面，建成整齐划一的徽式建筑格调，新修一条公路直接与牛首山相连，家家户户开起了“农家乐”^[2]，于 2012 年 4 月下旬正式开放迎客，现有 28 个饭店、2 个茶社、2 个旅馆以及 1 个生态园区和 1 个农事体验 DIY 区。

2. 皖中 Z 村现状

皖中 Z 村位于巢湖市槐林镇惠峰行政村，人口最多时达 60 多户，300 人左右。由

[1] 笔者于 2012 年 5 月-7 月对苏南 S 村和皖中 Z 村进行实地调研，这两个自然村分别代表“人口回流”和“人口外流”的村庄，对环境的正面效应显著。

[2] 根据访谈得知，当时有 10 户人家不愿意办“农家乐”，政府“以房换房”，空出来的房子出租给外人经营。

于村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距离最近的乡镇 7、8 里路，仅靠农业生产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20 世纪 90 年初，农民开始自发地外出打工，通过“传、帮、带”效应，80%以上的人口迁出，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1]。Z 村现有常住人口 58 人（即经常居住在本地半年及半年以上的人口），28 户，户均 2.07 人，男女各 29 人。留在村里的家庭以年纪较大的两口之家为主，有 12 户，每户种植 15-20 亩农田。山地较多的农民会种茶叶获得额外的收入，零散的土地被利用起来种植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蔬菜或豆类、瓜类等。村民一周上街^[2] 2-3 次，购买一些肉类、日用品或者化肥农药等。Z 村最大的特点是“看起来像 70、80 年代的老旧村庄”，村民即使有钱也不会在村里建房，以“清一色”的红砖平房为主，仅有 4 栋九几年盖的楼房，偶尔会对危房或漏雨的房屋进行修补、翻新。如果家中老人已经去世或者已经接到外地和子女一起居住，这样的人家逢年过节也不会回去，与村庄逐渐失去联系。

3. 人口流动、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

一般来说，人口流动可以分为人口迁出和人口迁入两种形态，前者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后者多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本文中，笔者以苏南 S 村和皖中 Z 村为研究个案，将村庄内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前者称为“人口回流”村^[3]，后者称为“人口外流”村。起初 S 村在未享受政府扶持的背景下，居民靠务农、就近打工维持生活，在政府集中打造生态旅游村后，部分居民返回家乡，用心经营自家“农家乐”的生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Z 村则不同，村庄内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随着老年人的相继去世，笔者甚至可以做出“再过二三十年，该村将会消失”的推断。

分析人口流动现象，经济因素是考虑的首要因素。现代推拉理论被认为是解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性流动的重要原因。（宋林飞，1996）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总量对环境的影响，二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人口流动最直接的后果是区域内的绝对人口数量发生变化，假定单个人（假设的“平均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一定的，那么人口越多，对环境的影响越大。（陈阿

[1] 农村“空心化”的出现致使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学校教学质量不高，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村里的孩子也越来越少。笔者调查时 Z 村只有 6 个孩子。

[2] 这里的上街指去较近的槐林镇或坝镇。由于村民很少，原来通往村内的班车取消，大多数留村居民家里有一辆电动三轮车。

[3] 为了与 Z 村人口流动对比，笔者虽然将 S 村界定为“人口回流”村，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现象称为主流，相反外出打工人数所占比重仍然较大。

江，2012）Z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在农业生产方面，老年人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决定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在日常生活方面，老年人大多保留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使用的塑料制品、高科技产品较少，饮食结构中清淡的食物为主，产生的生活垃圾不多；在行为规范方面，对村庄内部不成文的“乡规民约”熟知，比如用水规范，有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就是说，人口流动的初衷都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人口流动又会给农村环境带来正面或负面效应。

三、强制性：S村打造生态旅游村

1. 打造生态旅游村

S村作为政府倾力打造的生态旅游村，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走进农户，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发动村民响应政府的号召，通过开农家乐的形式在农业与旅游业之间搭建桥梁。在街道统一指挥下进行全面整治，主要包括改善村庄卫生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房屋墙面出新、雨污分流、强弱电下地，扩建停车场等一系列具体项目。

经过为期一年的集中打造，政府出资对居民原有的房屋进行改建或新建，统一加上粉墙、黑瓦、马头墙、回廊、门楼以及窗户的飞檐，建成浓郁的徽式风格；同时新建两到三幢建筑，作为茶馆及旅游接待中心，确保游客能够享受到全面到位的服务。沿着道路两边的28户人家经营名称不同的农家乐餐馆（其中有些还在装修），基本上以本村村民为主，生意较好，尤其是周末、节假日等旅游旺季。另外有2个茶馆兼零售商店，1个在建的大规模宾馆，有专门供游客骑马、垂钓、烧烤、野营等活动场所。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新增或改善道路、路灯、水塘、绿地等。新修的柏油马路直通牛首山景区，道路干净整洁，路边每隔一段就设一个垃圾箱，清洁工人不定时打扫。竖立的太阳能路灯，节能环保，减少资源消耗。将原有水域改建成分散的2个大水塘和4个小水塘，看上去水质清澈。绿地面积较大，除了山地和林地外，每家房前屋后及其它空地也种上了花草，土地充分利用。除此以外，村庄内部用8亩地开发出一片“开心农场”，向那些想要体验农业种植的游客分块出租，一个游客一年交纳租金500元，可以认领一块30平方米的自留地，随你种花、种草，还是种水稻、种蔬菜，收成全部归“农场主”所有。约10亩地刚刚种上玉米，据称是“绿色无公害玉米”^[1]，发展生态农业。村内有一片桃花园，游客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认领，待到果实成熟可供游人采摘，S村历史上就有

[1] 笔者于2012年5月对玉米地的负责人访谈所得。

桃花源的故事^[1]。“开心农场”的开发商对田地进行人性化设计，在每块田地分界处用镂空砖代替了传统的田埂，采用水泥的灌溉渠，以免给游客带去不便。

通过与 S 村清洁女工和当地村民的访谈得知，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村内过去的环境状况就不差，有花有草，有山有水，无工业污染，农业、生活污染不严重，人地矛盾也不突出。那时的环境治理主要在于村民自己，政府工作人员只是起到监督作用。如今随处可见的垃圾桶成为一道“新风景”，村里有垃圾车专门来收，早晚各一次，一天两次，若是旅游旺季垃圾产生量比平时多，会适当增加收垃圾的次数，务必将垃圾清理干净。清洁女工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她们大多数不是本村人，本来在别的地方干活，但是清洁公司将其借调过来，缓解暂时的人员紧缺。上班时间是上午 6:30-10:30，下午 13:30-17:30，虽然工资不高，每月 1140 元，但是相对来说活比较轻松，每人分管一小块区域，除了早晚各扫一次地外，看到路面脏或是有塑料袋等漂浮物就要进行不定时清扫，清理时尽量避开游客，确保工作时间内村庄环境的整洁，维护村民、游客的利益。自从 S 村有了政府作为“幕后推手”，生态旅游村呈现出令人向往的模样，“我们这儿的环境比过去还好，以前是靠我们自己来治理，现在政府出钱，让农村建设地更加生态环保”。^[2]

2. “他组织”社区

现阶段 S 村到处是一片安静祥和的景象，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将 S 村打造成生态旅游村，是当地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由上至下逐级执行，有了政府的外部作用力，从短期看给村民带去了显性的经济环境收益，各项景观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都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奠定基础，产生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S 村是“他组织”社区的事实需要引起当地政府和村民的高度重视。根据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区的主体关系，可以将村庄分为两类：“他组织”社区和“自组织”社区。（熊辉，2009）“他组织”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区参与中，指的是“社区”的划定和社区组织化力量来自外部的政府行政命令，而非居民自发、自愿，“社区”居民往往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服从上级政府的制度安排。笔者在这里将 S 村界定为一种“他组织”社区类型，也就是村庄环境治理的主导力量来自政府。

村民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缺位为 S 村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在有建设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收垃圾、设垃圾箱、聘请清洁人员、花草树木维护等费用都是由政府出资，村

[1] 目前 S 村被称为“SA 桃源”，景观建设与名称相符。

[2] 根据笔者与 S 村村长的访谈资料整理。

民不用掏一分钱就能享受到优美干净的居住环境，肯定是受到他们的欢迎和一致好评。但是后期资金不足时，这些费用又该从何而来，由谁来出？另外，农家乐在政府“催化剂”的作用下风风火火地办起来，前期有资金、政策扶持，后期效益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自家的经营模式、管理理念、销售策略，“饭菜好不好吃”、“东西实不实惠”、“环境好不好”、“老板人怎么样”等。春夏季节是景区的旅游旺季，游客的到来会使村庄人数陡然上升，他们在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村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村民和游客能否按照预期遵守村庄制定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1]，这取决于村民所扮演的角色。必须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做到充分合理的注重村民本位，他们不仅是村庄的生活者，也是生态环境的建设者。只有真正从村民的实际需要出发，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环境意识，增强游客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消除“他组织”社区的不利影响。

四、自发性：Z村回归原初生态村

1. 回归原初生态村

人类需要空间、清洁的空气、食物和其它基本营养物质以求生存和维持一定质量的生活，但是如果相对于环境来说，人口规模过大，那个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就会被过度使用，而人类福利就会受到威胁。Z村的现状恰好与之相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空心化”，而这种“空心化”带来更多的正面效应。人口数量的减少，环境承载力减轻；老年人占多数的人口结构使得村庄内部保留较好的传统规范，留在村里的人制造更少的生活垃圾，依据经验从事农业生产，减少人类活动对村落环境的“贡献”。任何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环境资源，在质量、数量、空间和时间等方面不能无限制供给，对外界的干扰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随着村民人数的增多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侵入，诸如化肥、农药施用量过度，人畜粪便的弃用，高科技电子产品进入等，对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形成威胁，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庆幸的是，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副作用伴随着人口外流而减小，村民对水体、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工农业发展带来污染问题的发生概率降低。

塞林斯在《原初丰裕社会》中指出，大多数狩猎者的需要易于获得满足，这种“物质的丰盛”，部分由于生产上的简易、技术单纯，部分由于所有制的民主。他们习惯可消费物件的限额（以及消费者的数量），都在文化上设定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不要就不缺”。Z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即符合这种原则，较之年轻人他们的需求更少，向往简单、舒适的生活。笔者将这种模式界定为“环境上的丰裕”，Z村的人口、食物、能源、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五大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不突出，达到一个相对

[1] 调查期间，村庄内的宣传栏里贴出了当地社区制定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规章条例。

稳定的平衡阶段，回归“原初生态村”^[1]。目前，“生态村”的定义是指在一个自然村或行政村范围内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加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以取得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从这一层面上看，Z村村民的经济文化需求较为单一，大多保留传统农业技术，例如2-3户人家共养一头水牛，老人为节约耕作成本和方便小块田地耕作，减少机械化设备的使用率；甚至还会收集牛粪，当作有机肥使用。村民这种不自觉的行为方式对生态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减少污染排放，实现村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将其与S村的“生态村”类型区分开来，这种“原生态村”形成更多地是来自村民无意识的行为方式，他们不强调生产效率，不强调经济效益最大化，没有日益增长多层次的社会需求，村落环境中的“天人合一”体现“自然、自发、不自觉”的特征。人们敬重自然界提供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生存养料，将保护水环境、土地资源等融入日常生活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起大规模地人口流动，人们自发地向外迁移，客观上减轻环境压力；村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简单、容易满足的生产生活方式^[2]，不自觉地“将‘生态文明’践行开来”。

2. “自组织”社区

按照村民在农村社区参与中所扮演的角色，Z村则属于“自组织”社区的范畴。“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Z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村庄，人口“空心化”使得基层政府的控制力更加减弱。村庄精英的缺失，“村长成为吃力不讨好的活，没有人愿意为了一年几百块钱得罪别人”^[3]，人们更乐意安分守己地过生活。村落环境的好坏取决于村民自身，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运作动力来自村庄内部，熟人社会中面对面的协商，彼此之间的信任，使得他们在共同的利益或需求面前，采取多数人受益的集体行动。Z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且与巢湖水系相通，水环境是基层政府与村民关注的焦点，农民会对破坏水体的行为嗤之以鼻。换句话说，环境治理的主导力量是村民自己，居于主导、主体地位，

[1] 原初生态村简称为“原生态的村落”，朱炳祥在《何为“原生态”？为何“原生态”？》（2010，原生态民族文科学刊）一文中指出，“原生态”包含三要素，时间上指起源时的初始结构方式，空间（地域）上指某一族群自我对特定环境的选择与适应所构建的文化形态，方式上的“原生态”指某一族群依据环境建构本民族或族群文化的方式。这种界定更偏向于“原生态文化”这一概念，笔者想要阐述的只是“自然生态”，即人们尊重自然规律，持续地取得丰富而又合乎要求的资源来发展生产并保持洁净、优美和宁静的生活环境。

[2]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子女不会再回农村居住，Z村的农民不会在村内建房，村内几乎不会出现建筑垃圾。

[3] 笔者对Z村曾经的生产队长访谈得知。

外界的干扰力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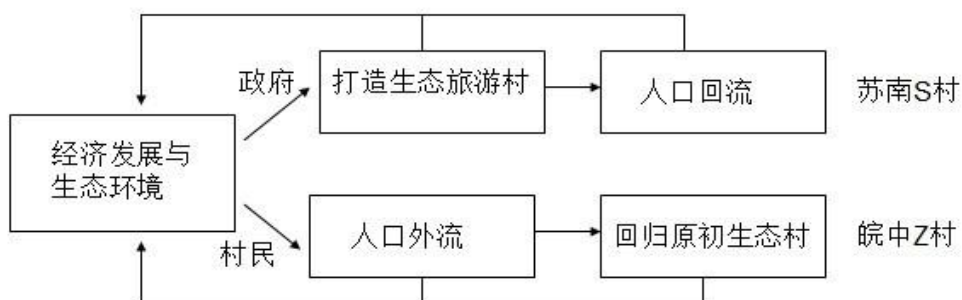
近年来，人口“空心化”现象一方面使得村民人数骤减，政府资金投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原生态”的环境，相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村落，人口数量下降明显对环境起到积极的正面效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值得深思的问题。以老年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反映出那些文化程度较高、能力较强的“村庄能人”缺乏，少了类似卡里斯马的领袖型人物，村落规范只能靠村民个人遵守，参与形式分散化，“自组织”社区的实际效能减弱，甚至仅仅是原子化、家庭化，尚不能达到“自组织”。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不能被有效利用，愈来愈多的空房闲置、杂草丛生，这些都是发展的阻碍因素。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是生态、环境、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不能只要生态，而不管发展，囿于传统与现代断裂的尴尬境地。农民自身也有无法回避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政府干预能够直达“要害”，如“西医治病”，能够快速缓解“病痛”，正如前文所述，政府决策一下子改变S村的“常态”，解决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从短期看也给村庄带来正面的经济社会效应。

五、结论：构建生态村的两种范式

人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村落与自然亦是如此。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生态环境，人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生存，村落不可能离开村民而存在。人始终是自然环境、村落环境的主体，人类的生产生活对环境产生影响，外界环境对人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

苏南S村作为一种“他组织”社区，村庄生态环境的主导是政府等外部因素，在政府的强制作用下，村民丧失话语权，被动性地建设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生态村”。政府决策的出发点是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益，没有充分了解老百姓的实际意愿，这种做法的副产品是引起“人口回流”现象的出现，从客观上对农村环境又会产生新的影响。

皖中Z村作为一种“自组织”社区，村民在村庄生态环境中起主导作用，在人口外流的大背景下，村民无意识的行为方式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使其回归“原初生态村”。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改变对生态环境埋下了一定程度的隐患，政府角色的缺位抑或农民的“完全主体性”都是过度自发性的表现。



图为构建“生态村”的两种范式

图 1：构建“生态村”的两种范式

结合 S 村和 Z 村个案，提出构建“生态村”的两种范式，前者以强制性、被动性为主；后者以自发性、主动性为主。宏观上看，不论是“他组织”还是“自组织”，关键是要把握“度”的问题。如果“生态文明”被单纯地当作商家的一种营销策略，政府的一种逐利手段，必然会不利于“生态村”的长远发展；如果“原生态”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代价，一种固步自封甚至历史性的倒退，必然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初衷。总之，传统与现代不能断裂，生态与发展不能隔离，未来决不能是“分离的世界”（布迪厄，1972）。

参考文献：

- 埃弗里特·M.罗吉斯，1988，《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布迪厄，2012，《知识场域：一个分离的世界》，王春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陈阿江，2012，《剧变：中国环境 60 年》，《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何强、井文勇编，2004，《环境学导论（第三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宋林飞，1996，《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网站报道 1,2012，《十八大报告全文》，(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 熊辉，2009，《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杨庭硕，2009，《“原生态文化”疏证》，《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第 1 期。

Miller,G.T.,JR.1992,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7th Ed.).Belmont,CA:Wadsworth.
ODUM,E.P.1983, *Basic ecology*.Philadelphia:W.B.Saunders.
WEEKS,J.R.1994, *Population:An introduction to concepts and issues*(5th ed.).Belmont,CA:
Wads-worth.

☆ 作者简介：盛钊添，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刘飞

※ ※

我校师生参加“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科学研讨会”

由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统计学会共同举办的“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科学研讨会”于 2012 年 12 月 30 日在南京华东饭店顺利召开。会议紧密围绕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成果的开发利用、分析研究成果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来自江苏省政府相关部门、江苏省多所高校的 170 余名领导、专家学者、统计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校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施国庆教授、院长助理韩振燕教授等参加了会议。

施国庆教授就《江苏流动人口研究》做大会主题演讲，受到与会领导及各位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师生主持或参加了 30 日下午多个分论坛的交流。施国庆教授主持了“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的讨论，并对分论坛发言进行了点评。黄健元教授、韩振燕教授、朱秀杰副教授、张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王欢就做了专题发言，受到与会专家一致称赞。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师生在人口学和人口统计领域理论基础扎实，实证分析规范，视角独特，分析透彻，准备充分，报告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可。

（王欢 供稿）

影响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相关因素分析

刘月平

摘要:本研究利用 298 份环卫工人调查问卷对影响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程度总体上较高;影响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有性别、工龄、工作量、工资满意度、福利满意度、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网络。福利满意度、社会支持网络、工作量对环卫工人职业认同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不同的户籍在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程度上没有差异。

关键词: 环卫工人 职业认同 相关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民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而环卫工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发展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环卫工人作为“城市美容师”,为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环卫工作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现代文明程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个文明的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浪网”曾经也举办过中国职业受尊重程度排行的调查,总共有 21466 位网友参与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环卫工作被排在第三,获得 6425 票,占参与投票人数的 29.9%。人们普遍的观点认为环卫工人这个职业是个崇高的职业。但是环卫工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环卫工人被视为城市的底层人群,游离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造成一些环卫工人自我城市归属感的缺失。环卫工人受侵害事件也时有发生。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每天接触大量垃圾,暴露于各种致病危险因素之中,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也是现代社会中特殊的弱势群体。环卫工人这个群体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环卫工人自身的职业认同现状如何?它又受哪些相关因素的影响?但目前国内学界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值得我们去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 职业认同的概念及测量

职业认同是由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Erikson 首先提出同

一性这个概念,他认为在青少年时期个体面临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角色的巨大变化,建立自我同一性成为其中心发展任务。在同一性形成过程中,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上的位置和角色。而对自己在职业世界中将要扮演的角色进行澄清则是青少年同一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后继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借鉴 Erikson 的自我同一性发展出职业认同的概念,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对职业认同持有不同的观点。Holland 认为的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职业兴趣、天赋和目标等方面认识的稳定和清晰程度。Meijer 与 Holland 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职业认同是心理发展过程中逐渐构建和成熟的概念,个体使用这个概念来将自己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与可接受的职业目标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个概念也会随着不断的社会学习过程而发生改变。而 Fugate 认为作为职业领域内的同一性,可以将其认为是个体选择用“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或“现在正在从事的职业”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总之,职业认同概念的解释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职业认同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过程”是说职业认同是个体自我从自己的经历中逐渐发展、确认自己的角色的过程;“状态”是说职业认同是当下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认同程度。从状态的意义讲,职业认同是个体对自己的“职业角色特征”的认同状态,包括职业自我概念、职业获益感、职业动力感 3 个方面。职业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职业及自我符合所从事职业角色规范程度的认知;职业获益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所从事职业感到喜欢、认为有价值,从而感到满足的积极情感状态;职业的动力感是指个体有能在职业取得成功的期望和不调动工作、不离开职业的意志倾向。

由于研究者对职业认同的概念和结构上认识不一致,所以在职业认同的测量方法方面也不尽一致。总结前人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 Holland 理论,从单一维度测量个人与职业有关的特点的清晰度和稳定性,另外一类是通过区分职业认同的不同状态和发展阶段来进行测量。

(二) 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方面,总结以往的研究,大体可以从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在家庭因素方面,其中关注度比较高的是家庭关系模式对于职业认同的影响。在个人因素方面,少数研究者提到自尊水平对职业认同水平的影响,或者生活目的可以预测个体的职业认同水平。就总体上而言,研究者多从人口统计学变量、自我效能感、应对风格等角度探讨个体特征对职业认同的影响。

(三) 环卫工人的相关研究

当前学者对教师、护士、辅导员等职业的认同研究较多，但对环卫工人群体的职业认同研究非常少。当前学界对环卫工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方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经过实证调查发现环卫工人易受细菌感染，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高，他们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影响。相关研究也发现环卫工人的防护设备投入少，职业防护意识薄弱。同时环卫工人的作业安全保障也不容乐观，作业安全难以保障，极大地影响了环卫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城市环境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

三、数据和研究设计

（一）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以南京市环卫工人为调查主体。抽样方法为偶遇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采取结构式访问法。调查员总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了 298 份，回收率为 99%。本文运用 SPSS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 and 统计。

（二）关于问卷

整份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调查环卫工人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工作量、工资、福利状况等。第二部分主要调查环卫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人、朋友、上级、政府、同事等。第三部分是环卫工人职业认同量表。

本文参考了袁丽丽、魏淑华等人对职业认同的测量，认为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是职业认同的概念在环卫工人这一具体领域中的体现，它指的是一种与环卫工人这一职业有关的积极的态度，是包含了认知、情感、行为倾向、行为持续等部分的综合体。具体来说，环卫工人职业认同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行为倾向以及职业坚持四个维度。

职业认知包括职业中对自我的认知，对职业的认知，对自我——职业匹配的认知三个部分。因为“认同”的基本涵义与主体对客体的“认可”、“承认”、“接受”等有关，而主体要“认可”、“承认”、“接受”客体，必然是以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理解为前提和基础的，即“认同”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职业情感包括职业中个体的喜爱、归属、自尊、价值、欢乐等情感体验和情绪状态。因为“认同”包含情感成分，是一种积极的主观心理体验。“认同”有主体在“承认”、“接受”客体的基础上“认可”、“赞赏”客体的涵义，而“认可”、“赞赏”总是伴随着积极的情感体验的。

同时，职业认同作为一种与职业有关的态度，不是具体的外显的行为，却包含可能会表现出某些外显行为的倾向，具有以认同对象的规范要求、按认同对象的规范行事的倾向。职业认同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个体选择用“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或者“正在从事的职业”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所以在量表中增加此项来反映其职业认同状

况。环卫工人职业认同量表总共有 22 题，第一到第五题测量环卫工人的职业认识；第六到第十四题测量环卫工人的职业情感；第十五到第十八题测量环卫工人的职业行为倾向；第十九到第二十一题测量环卫工人的职业坚持。

四、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表1：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有效样本	类别及分布
性别	298	男45%；女55%
年龄	298	均值52.6；标准差6.6
户籍	298	南京本地户口35.3%；南京以外的户口64.7%
文化程度	298	小学及以下71.8%；初中未毕业及以上29.2%
工资	298	均值1540.8；标准差279.9；
工龄	298	均值5.8；标准差4.6；
工作量	298	每周工作天数：均值6.6；标准差0.55；每天工作时间：均值9.4；标准差2.4；
福利状况	298	有工伤保险，20%；有医疗保险，22%；有养老保险，21%；有失业保险，16%； 有公积金，0%；有节假日补贴，80%；有工作服，99.7%；有病假工资，8%； 有恶劣环境的作业补贴，65%；

表1为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正如表中所描述，女性环卫工人占多数；环卫工人的年龄也偏大，平均在53岁左右；在南京工作的环卫工人中，外地人占多数；而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的工作量也相对较大，而工资与福利待遇却有待于提高。

（二）职业认同总体水平

表2：环卫工人职业认同及其各因素总体水平

	职业认同得分	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	职业行为倾向	职业坚持
N Valid	298	298	298	298	298
Missing	1050	200	500	200	150
Mean	77.75	17.47	33.22	17.04	10.02
Std. Deviation	10.61	2.15	6.36	2.241	2.39

注：职业认同得分、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行为倾向、职业坚持最高计分分别为 105、20、50、20、15。

从统计结果可知，在最高分为 5 分的计分标准下，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比较高。在各子因素中，职业情感的平均分最高，其次是职业认知倾向、职业坚持、职业情感。

（三）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性别相关分析

表3：男女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上的得分

项目	性别	Mean	N	Std. Deviation	Sig.
职业认同	男	76.07	134	11.09266	.014 [※]
	女	79.11	164	10.02	
Total		77.75	298	10.61	

注：※表示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示在 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表4：职业认同与性别的相关分析

	Eta	Eta Squared
职业认同得分 * 性别	.143	.020

从表 3 结果可知，男女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程度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男性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平均得分为 76.07，而女性则为 79.11。但从表 4 中可知，Eta 的数值为 0.143。一般学界认为 Eta 的数值在 0.3 以下为弱相关，Eta 的数值在 0.3 到 0.7 为中相关，Eta 的数值在 0.7 到 1 为强相关。很明显 0.143 小于 0.3，性别与职业认同是弱相关。

（四）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户籍类型相关分析

表5：不同户籍的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上的得分

项目	户口	Mean	N	Std. Deviation	Sig.
职业认同	南京本地农村人	75.91	47	11.68	.605
	南京本地城市人	78.62	58	7.50	
	南京以外农村人	77.94	185	11.14	
	南京以外城市人	77.75	8	11.27	
	Total	77.75	298	10.61	

从表中分析结果可知，职业认同与户籍的相关性没有通过显著检验，说明不同户籍

的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程度上不存在明显差异。

（五）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文化程度相关分析

表6：不同文化程度的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上的得分

项目	文化程度	Mean	N	Std. Deviation	Sig.
职业认同	不识字	75.94	93	10.70	.022 [*]
	小学及小学未毕业	77.60	121	9.74	
	初中未毕业及以上	75.54	84	11.31	
Total		77.75	298	10.61	

表 7：职业认同与文化程度相关分析

	Eta	Eta Squared
职业认同得分 * 文化程度	.160	.026

从表中分析结果可知，不同文化程度的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程度上有差异。文化程度越低，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越高。测量相关程度的 Eta 值为 0.160，小于 0.3 为弱相关。

（六）环卫工人职业认同与工资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表 8：不同工资满意度的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上的得分

项目	工资满意度	Mean	N	Std. Deviation	Sig.
职业认同	非常满意	81.25	4	7.54	
	比较满意	79.73	33	11.56	
	一般	80.70	76	8.61	
	不太满意	76.62	119	11.50	
	很不满意	75.18	66	9.90	
Total		77.75	298	10.61	

表 9：工资满意度与职业认同相关分析

	Eta	Eta Squared
职业认同得分 * 工资满意度	.206	.043

从表中分析结果可知,环卫工人对工资的态度在职业认同程度上有差异。工资满意度低的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也低。而 Eta 值为 0.206, 小于 0.3 为弱相关。

(七) 环卫工人职业认同与福利待遇的相关分析

表 10: 不同福利待遇满意度的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上的得分

项目	福利待遇满意度	Mean	N	Std. Deviation	Sig.
职业认同	非常满意	77.00	2	9.90	.000**
	比较满意	80.71	49	8.07	
	一般	80.22	109	8.25	
	不太满意	72.43	105	12.29	
	很不满意	82.15	33	8.70	
Total		77.75	298	10.61	

表 11: 福利待遇满意度与职业认同相关分析

	Eta	Eta Squared
职业认同得分 * 福利待遇	.375	.141

从表中分析结果可知,不同福利待遇满意度对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程度上有显著差异。而 Eta 值为 0.375, 大于 0.3 为中相关。

(八) 环卫工人职业认同与社会支持网及其他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对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程度分别进行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同事支持、上级支持、工作地居民支持、工龄、工作量的方差分析,根据其结果(表略)可知,环卫工人社会支持网的强弱对环卫工人职业认同有显著差异,工龄和工作量对环卫工人职业认同也有显著差异。

五、总结与讨论

总的来说,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普遍较高,这与我们的设想不一样。关于影响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性别差异。男女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程度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男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程度低于女环卫工人。究其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是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在成就期望上,性别差异很大。社会和个人对男性的成就期望一般要比对女性的成就期望高。相比于其他职业,环卫工人职业枯燥、烦琐、累、

脏,在权力、金钱等社会资源占有上,比其他职业少。而较少满足男性的成就期望。从事环卫工作对男性来说有失体面。原因之二是,从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点和性别特征上看,环卫工作更适合女性。

第二,不同文化程度的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上有显著差异。环卫工人文化程度越低,职业认同越高。不识字或读了小学的环卫工人认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比较适合从事简单的体力活,需要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作自己做不了,所以他们认为自己适合从事环卫工作,职业认同程度也就高。

第三,环卫工人对工资的满意度在职业认同程度上也有差异。一般工资满意度低的环卫工人职业认同也相对较低。工资满意度是工资水平这一客观因素与环卫工人的职业价值观等因素在环卫工人主体身上的交互作用反映,是环卫工人自我对工资水平是否满意的感知,是它影响了同样与环卫工人自我有关的职业认同的程度。所以本文认为,要通过提高环卫工人的工资满意度而提高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不仅需要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还要引导环卫工人积极的职业价值观。

第四,不同福利待遇满意度对环卫工人在职业认同程度上有显著差异。福利待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所以当前应贯彻落实相关政策,为环卫工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发放特殊岗位津贴,改善相关福利待遇,合理安排他们休假,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为环卫工人购买工伤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提供必要的生活卫生设施等。

第五,社会支持网、工作量、工龄和环卫工人的职业认同有较强的相关性。社会支持网强,职业认同程度高;工龄越长,职业认同也越高;同时工作量越大,职业认同也相对较低。因此为环卫工人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社会与政府职能部门应切实关心他们,给予他们更多尊重、支持和关心;家人应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同事之间应相互帮助和支持。

综上所述,影响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有:性别、工龄、工作量、工资满意度、福利满意度、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网络。福利满意度、社会支持网络、工作量对环卫工人职业认同有较强的相关性。而户籍对环卫工人职业认同没有影响。

参考文献:

高艳等,2011,《职业认同研究现状与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

期。

宋广文、魏淑华，2006，《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第1期。

吴明隆，2010，《问卷统计分析实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Erikson, E. H. 1994, *Identity :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Fugate, M, Kinicki, A.J., & Ash forth, B.E.2004 ,*Employability: A psycho-social construct, it s dimensions,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Holland, J. L, Johnston, J. A. , & Asama, N. F.1993, *The Vocational Identity Scale: A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tool*. Journal o f Career Assessment.

Meyers, F.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a caree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t-selling.

☆ 作者简介：刘月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刘飞

※ ※

河海社会学喜获三项省社会科学奖

近日，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公布河海社会学专业喜获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分别是：《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一等奖，陈阿江）；《西部水电移民风险管理》（二等奖，郑瑞强、施国庆）；《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三等奖，王毅杰、高燕）。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

我校共有 11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4 项，获奖数量和获奖等级均创历史新高，一等奖获奖数量名列江苏高校前列。

（公共管理学院 供稿）



城乡社会学

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毅杰 冯显杰

摘要：基于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农民工分配公平感。分析发现，影响因素主要是客观经济地位维度的职业地位、主观经济地位的在工作城市的收入层次、生活体验维度的生活压力与社会距离。对于农民工而言，并非结构决定论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地位亦非局部比较论所青睐的参照点的选择决定分配公平感，而是他们的生活体验起着重要作用，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远、生活压力越大，越认为其收入是不公平的。

关键词：分配公平感 结构决定论 局部比较论 生活压力 社会距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加速了城市化的步伐，同时，城市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囿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民工无法与城市居民同等地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与机遇。而且，经济的发展并未缩小收入差距，差距反而日益扩大。农民工在收入分配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更突显了他们遭受的众多不公平的待遇，导致了诸如仇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分配公平感（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是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状况的主观判断、评价和态度（Jasso & Wegener, 1997），是一种对收入不平等的主观评价与认知。近年来部分研究以收入差距代替分配公平感，但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一些经济指标只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研究”（11&ZD02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SH015）“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能感研究”（10SHB008）

对分配差异状况的客观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涉及公众感知与价值判断。而有关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认知与评价涉及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属于一种伦理的判断，它排除了区域、经济发展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真实的感知，这种主观评价最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态度与行为模式（李骏、吴晓刚，2012；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2012）。

那么分配公平感是如何产生的呢？有学者认为，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这种差距一旦超越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回报与付出失衡，分配不公平感就会产生，并很可能呈增加趋势。在该领域，存在着两种思路：结构决定论与局部比较论。脱胎于自利理论（self-interest theory）的结构决定论认为人们对分配是否公平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整个分配过程中获得了多少利益（Sears and Funk 1991）。在分配中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公平感越强，反之，越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越会产生不公平感（马磊、刘欣，2010；王甫勤，2011）。经验研究也指出宏观层次上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决定着个人所能够获得的权利和机会，决定着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体现着社会正义，而一旦在局部范围内出现规则执行不公、权力寻租等问题，就会影响人们的公平感（赵琼，2005）。农民工群体产生不公平感的原因也在于制度与政策的限制使得他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陈映芳，2005；徐铭，2006）。

局部比较论（local comparison）则认为人们当前境遇的公平感不仅仅取决于自己地位的高低，还会受到他们所选取的参照点（自己的过去或是家庭成员、同辈群体等）的影响。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平感主要基于局部情境的比较而产生（马磊、刘欣，2010）。如果他们在地位对比中处于劣势，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将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不公平感；相反，则会产生公平感（J. S. Adams, 1963；翁定军，2010；马磊、刘欣，2010；王甫勤，2011）。

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公平感既与一个人的阶层身份、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社会地位、年龄等因素有关，又受制度安排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其中权力、职业和行业是导致不公平感的主要因素（赵琼，2005；李春玲，2006）。也有人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对其公平感有显著影响（胡荣、陈斯诗，2010），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不公平感则源于城市人为保护原有公共利益而对他们进行的盘剥（许传新、许若兰，2007）。

由此，以往对分配公平感的研究忽视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感知与体验。农民工由于群体身份的特殊性，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也不同于其他群体。因而，我们试图在以往研究所提出的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的生活体验，探讨影响

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因素。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设置

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概念，前文已涉，不再赘述。我们对分配公平感的测量主要通过农民工对财富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获得的，其答案的赋值为：“很公平”=1，“比较公平”=2，“不太公平”=3，“很不公平”=4，在构造模型时，为了避免由于变量某一类别个案过少所造成的偏倚，我们将比较公平与很公平两项合并为公平。

遵照以往的研究传统，对于影响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因素，除人口特征变量，即受访者的性别与年龄，我们还纳入了客观经济地位维度与主观经济地位维度。

客观经济地位维度主要是借鉴了结构决定论。该理论强调分配公平感是由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积极的分配公平感。收入、教育和职业地位往往被用来测量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考虑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家庭经济地位对个体认知的影响，我们将收入分为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分层的一个关键变量，经常被用来验证自利理论（李骏、吴晓刚，2012）。此外，教育也常常被用来证明利己主义，如前文所言，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平感也高。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1a：农民工的个人年收入越低，分配公平感越低。

假设 1b：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越低，分配公平感越低。

假设 1c：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越低，分配公平感越低。

假设 1d：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低，分配公平感越低。

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有四个方面：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包括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股息、保险、退休金等在内的被访者的年总收入和家庭年总收入，然后取其自然对数，以避免数据过大或过小所造成的误差；职业地位则被分为三种“管理者=1、技工=2、普工=3”；教育程度，为被访者所接受正式教育的受教育年限。

主观经济地位维度则参照了局部比较论，该理论实际是“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拓展。它强调，人们的分配公平感源于通过在局部范围内与他人或自己过去状况的比较。参照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对于社会公平的感知（Jasso, 1980; Wegener, 1991; Kreidl, 2000; 马磊、刘欣, 2010）。因此，我们得出，

假设 2a：农民工在家乡的收入层次越低，分配公平感越低。

假设 2b：农民工在工作的城市收入层次越低，分配公平感越低。

假设 2c：农民工在具备同等能力的人中收入层次越低，分配公平感越低。

假设 2d: 农民工与三年前的自己相比收入层次越低, 分配公平感越低。

参照已有研究, 我们选择了四个参照点, 既包括不同的参照群体也包括纵向的自我比较, 据此形成四个问题“按最近一年的情况, 在家乡, 您个人的收入属于哪个层次?”、“按最近一年的情况, 在工作的城市, 您个人的收入属于哪个层次?”、“在具备同等能力的人中, 您个人的收入属于哪个层次?” 答案的赋值为“中上层”=1, “中层”=2, “中下层”=3, “下层”=4。“与三年前的自己相比, 您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 其赋值为“有很大改善=1, 有一些改善=2, 没变化=3, 有点下滑=4”。

除了以上两种理论外, 我们不得不考虑, 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体验对其公平感的影响,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生活压力与社会距离。

作为流动群体的农民工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 他们即属于农村场域却又不得不在城市中挣扎, 无论其最终回归到哪里, 他们都不得不承担着两个场域带来的生活压力, 这其中既有来自家乡生活的压力, 也有来自城市生存与交往的压力, 以及游走于这两个场域之间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所带来的压力。行为心理学家伯勒斯·斯金纳(Burrhus Skinner)指出, 人的行为可以用刺激——反应公式来解释, 一旦刺激出现, 人们就会出现某种心理状态, 从而采取行动。而生活压力就是这样一种刺激, 使得个体产生分配不公平感。社会冲突论也强调了个体迫于生活压力, 感知到自身的劳动成果被剥夺, 形成分配不公平感, 从而引发社会冲突。对于农民工而言, 紧张的生活压力可以刺激他们看到丧失公平的不良社会现象, 感受到随时都可能降临到自身的利益损失与机遇丧失的危机感, 而如果社会无法对个体的努力给予公平的补偿, 那么他们的分配不公平感就会日益强烈, 刺激他们不惜采取过激的举动来宣泄自己的不满进而产生越轨行为。国内的经验研究也表明生活压力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李培林、田丰, 2011)。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3: 农民工的生活压力越大, 分配公平感越低。

生活压力感的测量主要参照李培林、田丰(2011)所使用的生活压力量表, 涉及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收入、支出、稳定就业、工作负担、养老、人际、家庭与社会等十四个方面, 然后将所得分值直接累加, 形成生活压力变量。其赋值为: “没有压力”=1, “有点压力”=2, “压力很大”=3, 分值越高, 生活压力越大。

社会距离最早是由塔尔德(G. Tarde)在其《模仿律》中使用的, 并认为它反映了阶级间关系的亲密程度; 齐美尔(Georg Simmel)和帕克(Robert E. Park)赋予了它主观性的色彩, 帕克指出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 由于这种状态使得我们自觉

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和隔离”。在这里，社会距离开始强调心理上的区别和隔离状态。在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的情况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也逐渐由客观转化为主观（郭星华、姜华，2009）。由于他们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与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很容易被单一化为“肮脏、粗鲁、野蛮、危险、不守规则”的形象，项飏把这种心态比做“秩序决定洁污定义”。当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他们就不得不作为受歧视群体的一分子开始与城市居民展开日常交往，就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只能占据这样一个先定的受歧视位置，他们所掌控的交际资源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并因此从一开始就只能扮演一个被歧视被拒绝的社会角色。这样，农民工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分配不公平感。

另一方面，长期的社会距离的存在会导致亚文化群体的形成，一旦这样的群体存在，生活于其中的人很容易受限于狭小的区域内，缺乏与外界的信息沟通，当其成员是由社会底层群体组成时，有可能导致长期的或永久性的社会不平等，分配不公平感随之产生，并很可能形成对社会的怨恨心理。胡荣、陈斯诗（2010）的研究就表明农民工的交往融入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融入程度越低，社会距离越远，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就越低。而事实上这种社会距离更体现在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距离，体现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被孤立状态。由此提出，

假设 4：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远，分配公平感越低。

对于社会距离的测量，通常采用博格达斯（Emory S. Bogardus）的社会距离量表。他将社会距离从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测量刻度，使其成为社会学中普遍适用的概念。这一量表是通过考察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距离的感觉。我们对社会距离的测量延续了先前编制的流动农民与市民的社会距离量表（王毅杰、王开庆，2008）。其赋值为：“非常愿意”=1，“比较愿意”=2，“不愿意”=3，累加后，分值越高，社会距离越远。

本文数据来自 2012 年 1 月-2 月课题组进行的“外出务工人员调查”。调查对象为 15-60 岁、跨县/区外出务工、被他人雇佣从事非农活动至少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劳动力，不包括各种类型的自雇和雇主。此次调查，课题组从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各选一所本地生源较多的高校，每所学校分别选择一两个社会学或社会工作专业的班级，每个班级的同学本着自愿原则参与调查，他们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调查返乡过年的农民工。问卷为自填式，避免了以往访谈式问卷由于调查员的理解、念读、填写时所产生的各种误差（尤其是认知-态度量表部分）；每名学生最多只能调查 10 位农民工，这样保证了调

查对象的地域覆盖面，涉及 10 个省的 153 个县区。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562 份，全部回收，有效问卷 1469 份，有效回收率 94%；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进入本文分析的有 1228 个样本。

表1 各变量值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		类别及分布
人口特征	性别	女 37.5%，男 62.5%
	年龄	均值=27.48，标准差=8.52
客观经济 地位变量	教育程度	均值=10.31，标准差=2.99
	个人年收入	均值=26236.77，标准差=18612.154
	家庭年收入	均值=59231.60，标准差=43734.609
	职业地位	管理者 25.1%，技工 29.8%，普工 45.1%
主观经济 地位变量	在家乡的收入层次	中上层 9.2%，中层 43.9%，中下层 32.9%，下层 14%
	在工作的城市收入层次	中上层 4.3%，中层 24.0%，中下层 38.2%，下层 33.5%
	在同等能力的人中收入层次	中上层 16.0%，中层 52.4%，中下层 22.2%，下层 9.4%
	与三年前相比的收入状况变化	中上层 19.8%，中层 64.2%，中下层 10.6%，下层 5.5%
生活体验	生活压力	均值=27.70，标准差=6.00
	社会距离	均值=15.72，标准差=2.77
分配公平感		很不公平 22.7%，不太公平 47.3%，公平 30.0%

三、数据分析

（一）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状况分析

通过与以往研究的比较，我们能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

表 2 对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与马磊、刘欣（2010）研究中的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进行了比较。在马磊、刘欣的研究中，城市居民认为财富及收入分配很不公平、不太公平的分别占 8.8%、48.4%，两者占到了 57.2%，认为比较公平和很公平合计为 42.8%；而农民工认为分配很不公平、不公平的分别占 22.7%和 47.3%，合计为 70%，认为比较公平和很公平的分别占 27.7%、2.3%，两者占到了 30%。对这两份资料进行独立样本检验，发现的确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认为分配不公平感的比例的确要多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较低。

表 2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分配公平感比较^{*}

	农民工		城市居民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很不公平	279	22.7	336	8.8
不太公平	581	47.3	1847	48.4
比较公平	340	27.7	1564	41
很公平	28	2.3	69	1.8
N	1228		3816	
F=1.3258>F _{critical} t=181.7673>t _{critical} a=0.05				

（二）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

由表 3 可知，模型 I 和模型 II 均通过了比例特性检验，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比例特性，因而有理由使用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模型 I 纳入的是人口特征、客观经济地位和主观经济地位两个维度，模型拟合劣度 Nagelkerke $R^2=8\%$ ，模型 II 在模型 I 的基础上纳入了生活体验维度，拟合劣度为 10.5%，拟合劣度的增加表明生活体验维度的纳入是有分析意义的，且提高了对农民工分配公平感变异的解释力。

在模型 I 和模型 II 中，人口特征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性别和年龄对收入公平感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具体来说，性别方面，男性的分配公平感要低于女性，其原因可能是男性相较于女性在生活的各方面都会较多地接触到社会资源的分配；年龄与自然对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年龄与分配公平感呈一个正向的非线性效应，年龄越大，分配公平感越低，越认为不公平，但当年龄达到某个值后，分配公平感就会升高，认为公平。

模型 I 中，客观经济地位维度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自然对数）、职业地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来说，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单位，倾向于认为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是认为分配公平的发生比的 1.05 倍，这与假设 1d 的方向恰是相反的，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越认为存在分配不公平现象。其原因可能是教育提供了一种公平的期望，但现实又难以实现这种期望，农民工形成的反而是失望；也可能是教育提供的是个体洞察现实的能力。收入方面，最能代表农民工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年收入并没有通

^{*}鉴于数据之间比较的需要，马磊、刘欣研究中的数据并未有频数，表中频数是根据该文提供的样本数与百分比计算得出。频数=样本数*百分比。

过检验（假设 1a），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得到证实（假设 1b），表现为每增加一单位，认为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是认为分配公平的 75%。职业地位方面，比普通工人相比，管理者倾向于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是认为公平的 74.6%，技术工人倾向于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是认为公平的 76.9%，职业地位越高的人越认为分配公平，假设 1c 得到证实。

主观经济地位维度的在城市收入层次变量，自我感知为中上层的与下层的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检验，通过检验的是：与感知为下层的相比，收入为中层的农民工倾向于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是认为公平的 64.8%，收入为中下层的倾向于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是认为公平的 71.7%，就整体而言，农民工在工作城市自我感知收入越低越倾向于分配不公平（假设 2b），其原因可能在于在城市感知到的收入越低，尤其是自身与参照群体的空间距离很近时，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会越强，越认为分配是不公平的。在家乡收入层次变量，与感知为下层的相比，收入为中上层的倾向于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是认为公平的 1.77 倍，收入为中层、中下层的与下层的没有显著差异，这样在家乡感知收入最高的农民工反而倾向于分配不公平，这与假设 2a 的方向相悖。其原因尚待深入分析。参照对象为同等能力的人、三年前自己时的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样假设 2c、2d 没有得到证实。这点值得引起注意，与目前主要生活情境（城市）中居民相比所引起的冲击，要强于自身以往经历和生活情境（农村、三年前的自己）经历的影响，换句话说，当下生活情境（城市）是影响公平感的重要参照点。

表 3 农民工分配公平感影响因素 Ordinal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 I			模型 II		
	B	Std.E	Odds	B	Std.E	Odds
性别（女）	-.241*	.120	0.786	-.251*	.120	0.778
年龄	-.129**	.046	0.879	-.106*	.046	0.899
Ln（年龄）	4.835***	1.452	125.839	4.044**	1.463	57.054
客观经济地位变量						
教育程度	.049*	.020	1.050	.061**	.020	1.063
Ln（个人年收入）	.122	.119	1.130	.118	.120	1.125
Ln（家庭年收入）	-.288*	.125	0.750	-.190	.127	0.827
职业地位（以普工为参照组）						
管理者	-.293*	.145	0.746	-.266	.146	0.766
技工	-.263*	.134	0.769	-.329*	.135	0.720

续表3

主观经济地位变量

在家乡收入层次（以下层为参照组）						
中上层	.572*	.281	1.772	.635*	.283	1.887
中层	.164	.210	1.178	.200	.212	1.221
中下层	.149	.195	1.161	.158	.197	1.171
在城市收入层次（以下层为参照组）						
中上层	-.367	.309	0.693	-.357	.311	0.700
中层	-.434*	.176	0.648	-.383*	.177	0.682
中下层	-.333*	.144	0.717	-.309*	.145	0.734
在同等能力人中收入层次（以下层为参照组）						
中上层	-.476	.262	0.621	-.384	.263	1.468
中层	-.119	.224	1.126	-.078	.225	0.925
中下层	.191	.231	1.211	.219	.232	1.245
与三年前相比收入变化（以有点下滑为参照组）						
有很大改善	-.332	.274	0.718	-.265	.276	0.767
有一些改善	-.034	.247	0.967	-.008	.248	0.992
没有改善	.132	.287	1.141	.125	.289	1.133
生活体验						
生活压力				.044***	.010	1.045
社会距离				.055**	.021	1.057
截点1	11.708***	3.558	11.708	13.103***	3.595	13.103
截点2	9.514**	3.552	9.514	10.866**	3.589	10.866
-2LogLikelihood		2494.584			2464.128	
X^2		88.888			119.344	
拟 R^2		.080			.105	
比例特性检验		$X^2=26.847$	$P>.05$		$X^2=32.130$	$P>.05$
样本量		1228			1228	

* $P < .05$, ** $P < .01$, *** $P < .001$, 双尾检验

在模型 I 中通过显著检验的变量,而在模型 II 不再显著的有客观经济地位维度中的

家庭收入变量、职业地位变量中管理者与普通工人的差异；其余变量的影响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仅是具体的发生比，尤其是城市收入层次变量。这种变化需要从模型 II 中纳入的生活体验维度的生活压力和社会距离两变量来加以理解，表明农民工的生活体验抵消了农民工在家庭年收入方面所感受到的公平感，也削弱了农民工因比较在工作城市的收入层次时所产生的不公平感，平衡了职位地位是管理者在类别上对因变量的影响力。

就纳入的生活体验维度而言，生活压力与社会距离两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检验，农民工感知的生活压力、社会距离每增加一单位，认为分配不公平的发生比分别是认为分配公平的 1.045 倍、1.057 倍，即农民工的生活压力越大，感知社会距离越远，越倾向于认为分配不公平，假设 3 与假设 4 得到证实。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农民工越认为自己承担的压力大，尤其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个体努力难以得到合理回报，越容易归因于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愈远，农民工愈认为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排斥甚至是歧视，从而将这放置于公平的背景下予以考虑。而这恰好与怀霆默（Martin K. Whyte）将归因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分配公平感的解释（怀霆默，2009）不谋而合。归因理论认为，导致人们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即内因（个人绩效方面的原因）和外因（先赋的原因，如性别，或结构方面的原因如社会制度）。当人们将收入不平等归因于内因时，他们对这种分配结果的判断是公平的；反之，当人们不平等归因于外因时，他们将会作出分配不公平的判断（Cohen 1982；Skitka and Tetlock 1992；王甫琴，2011）。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12 年“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针对目前分配公平感领域内颇受欢迎的两种理论，强调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决定论与重视主观相对感受的局部比较论，将其运用于农民工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生活体验维度，提出了解释当前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的第三种机制，从而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分配公平感的因素。

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否定了结构决定论与局部比较论在农民工群体的应用。对于农民工而言，并非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亦非参照点的选择决定了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而是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影响了他们的分配公平感。结构决定论中的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几乎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教育程度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是反向的，并非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分配公平感越高。局部比较论中的在同等能力的人中的收入层次、与三年前相比的收入变化也均未通过检验，在家乡的收入层次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亦是反向的。二理论中只有职业地位与在工作城市的收入层次对应的两个次级假

设得到验证。

生活体验维度下的社会距离与生活压力两者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远,生活压力越大,越认为其收入是不公平的。与结构决定论、局部比较论相比,生活体验维度在阐释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的形成原因方面或许更具有说服力。农民工的分配公平感是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社会资源分配状况时所产生的的一种主观评价,任何个体都无法脱离自己的生活场域单纯地对某一事物进行评价,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生活场域中种种情境的干扰。相对而言生活感知更能影响农民工的社会态度与个体行为。这也从侧面揭示了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性因素。笔者相信,这对今后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尚未揭示农民工感知到的生活压力与社会距离大到何种程度时会促使农民工由过低的分配公平感转向抗争行为,这点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陈映芳, 2005,《“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郭星华、姜华, 2009,《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探索与争鸣》第 1 期。
- 胡荣、陈斯诗, 2010,《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怀默霆 (Martin K. Whyte), 2009,《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李春玲, 2006,《各阶层的社会不公平感比较分析》,《湖南社会科学》第 1 期。
- 李骏、吴晓刚, 2012,《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 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 2012,《“患不均, 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4 期。
- 李培林、田丰, 2011,《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第 3 期。
- 马磊、刘欣, 2010,《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王甫勤, 2011,《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第 3 期。
- 王毅杰、王开庆, 2008,《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 5 期。
- 翁定军, 2010,《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 公平感和态度倾向》,《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徐铭, 2006,《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衡的危机》,《江苏社会科学》第 S2 期。许传

- 新、许若兰, 2007《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第5期。
- 赵琼, 2005,《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光明日报》B4版。
- Adams, J. 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3,67(10).
- Jasso, Guillermina & Bernd Wegener "Methods for Empirical Justice Analysis: Part I. Framework, Models, and Quantiti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997(10).
- Jasso, Guillermina "A New Theor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0,45(1).
- Kreidl, Martin "Perception of Poverty and Wealth in Western and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0(13).
- Sears, D. O. and C. L. Funk. "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1(24):1-91.
- Wegner, Bern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Judgment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 7(1).

本文已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 作者简介: 王毅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冯显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谢江平

“种”出来的困境

——对江苏省宿迁市荷塘村“种房子”的调查研究

蔡 娟

摘 要：“种房子”行为是荷塘村民为应对拆迁而采取的维权行动，其初衷是为了在拆迁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可是拆迁日期的延长使得村民们陷入了因“种房子”而导致的困境，寻找形成困境格局的因素应该结合行为者、事件以及事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背景。

关键词：征地拆迁 农民 种房子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征用农业用地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扩张。城市扩张首先体现在城市规模的扩大，各种形式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纷纷涌现，大量农村土地及农业用地被占用，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2004年以后，新一轮城市扩张以征用农民宅基地和拆迁农村房屋为主要特征，农民开始“集体上楼”。有学者指出：“2004年后，土地问题开始取代税费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每年发生的土地冲突事件约占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25%，占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65%左右。”^[1]征地与拆迁均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分配，也是关乎农民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拆迁大部分农民都是较为顺从的，但也有一部分农民通过某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因而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剧。有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纠纷已成为目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农民和政府的冲突程度变得越发激烈，抗争的方式也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2]学界对于征地拆迁农民应对行动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较为显现和激烈的行动，如集体上访、暴力抵制、自杀以及甘当“钉子户”等。但是，征地拆迁过程中所发生的远远不止这些，还上演着很多无声的甚至是隐忍的应对行动。笔者在宿迁市荷塘村见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该村尚未拆迁的民宅四周自2010年已经全部“种”上了房子，但村民当初“种房子”时的喜悦心情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埋怨与咒骂，“种房

[1] 于建嵘，2009，《底层政治》，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第119页。

[2] 于建嵘，2005，《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研》，《调研世界》第3期。

子”种出了麻烦，种成了困境。

一、现状描述——“家家盖得不冒烟，静等政府来拆迁”

江苏省宿迁市外环路运河五号桥向东北方向延伸约五公里处，有一处弯口，弯口下以南是一条村级水泥路，路左边是民宅，路右边原本是村部所在地，现在已经成为一堆废墟，前方被圈起来，里面正在建楼房，当地村民说，这处楼房已经建了三年，现在才只建到地面。左边的民宅几乎是一色灰，家家院子全被封得严严实实，许多人家在平房上又建起了二层或三层，但这二层或三层基本上只有框架，有的根本没封顶；走近向院子里望去，里面黑洞洞的，有好多门，里面什么都看不清楚。如果你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的院子，就可以发现在院子里有好多房间，除了当地传统的正房，东、西侧屋及过道，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很简陋的房间，例如东西向的侧屋与正房连在一起（在当地东西侧屋与正面之间要保留一定距离）的房间，这个房间利用了侧屋与正房的一面墙壁，然后加了一堵墙，再在上方铺上石棉瓦，就可以了。同样，东西侧屋与过道也连成了一片（以前这地方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利用原有的两堵墙，另外又砌了一面，上面加上石棉瓦，而原来的院子中间又砌了东西两面墙，这分别与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与正房、侧屋及过道连成一片，上面都铺设石棉瓦，这四面墙上方又在东西方向铺设石棉瓦，这样一个四合小院就被封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人走进去，需要适应一阵子才可看清室内物品，在院子中间喊一声，会有回声传过来，然后在某处房门走出一个人来。当然如果房子前面或后面有空地的话，空地也建起了“房子”，四面墙上方铺着石棉瓦，有的人家建了二层或三层，这些二层或三层均建在原来的房子上，即正房、侧屋及过道上方，这些楼层都没有楼梯。除了原来四个方向的房子，这些多出来的房子有共同特点：墙体粗糙，不遮风不挡雨，不可储物不可居住。这种行为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种房子”。这是笔者在荷塘村所看到的一幕，对于这种行为，当地人有句顺口溜“家家盖得不冒烟，静等政府来拆迁”。据了解，这些房子是在2010年开始7-8月间“种”出来的，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拆迁的准确消息。



图 1：村民“种”下的房子，在原有房子上方加盖，将院落封实。

二、研究回顾

对于失地农民的应对行动，国内外学者均提供了相应的解释。波普金和舒尔茨所代表的“经济理性”派认为小农行为具有经济理性的特质。舒尔茨认为：“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它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纪人”。^[1]斯科特所代表的“生存理性”派认为农民们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其实是为保证生存所做出的合理选择。他强调农民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生存安全第一”“规避风险”等的原则。^[2]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同时体现在人类的行为中。而农民所处社会中的这种有限理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比较而言小农的社会更加信息闭塞、风险不确定，农民不得不在风险和收入之间进行权衡。^[3]

而我国对于失地农民的应对研究是基于一种危机意识，即在征地拆迁工程中农民因利益遭到损坏而进行了诸多的维权行动，这些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目前我国学界对农民的应对行动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归纳总结失地农民的应对行动以及相关的特征，探究失地农民维权行动产生的行为动机，挖掘农民应对行动背后所隐藏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失地农民的行动逻辑。张雄以“多重

[1] 西奥多·w·舒尔茨，1987，《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89 页。

[2] 詹姆斯·C·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 19 页。

[3] 赫伯特·西蒙，1989，《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论说》，杨砾、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 133 页。

知识和多重秩序”的视角，解读近十年在近郊农村的拆迁过程中，村民如何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争取利益。^[1]折晓叶认为，“当下中国农民在本土农化压力、城市化暴力和工业私有化境况下，出于对外部强势力量的难以招架和对于生存及保障的考虑，他们被迫采取的可能是审慎而又具有合法性的抵制方式，从而获得基本而又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农民使用的是“‘韧武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采取非对抗性抵制方式，选择了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且借助于“集体（合作）力”的效应，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公共化，从而获得行动的合法性，也是行之有效的行动策略。”^[2]还有的学者指出：“在失地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失地农民会选择隐忍，发发牢骚而已，或是进行一些微小的、零星的反抗，表达自己的权益诉求；随着失地风险的增大，失地农民抗争的组织性、目标性以及资源动员的能力都会不断增强。而且，他们抗争的政治诉求也会越来越强烈。在抗争中，不同的抗争方式会遭遇到不同的抗争风险，为了不使自身伤害太大，失地农民一般都倾向于进行风险较小的日常抗争。只是当失地压力把他们推向风险很大的边缘境地时，才会选择成本较大的抗争方式。”^[3]徐琴在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失地农民问题分析后，发现失地农民的真实困境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可行能力”欠缺，二是利益表达能力短缺，三是经济参与能力短缺与社会机会不足，这三项能力的短缺使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成为潜在的贫困社群。^[4]应星从“草根动员”的角度入手，“认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5]

通过对上述的研究梳理，笔者认为对于失地农民应对行动的研究充斥着理性的概念，如经济理性、生存理性及社会理性等我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危机意识下的精英思维的反映，这种关注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为民做主”的色彩较为浓厚。笔者认为失地拆迁农民作为一特殊群体，其应对行动不同于日常活动中的经济选择，因此应该在相关的人、事及社会环境的背景下阐释他们的行动，将他们的应对行动区别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经济选择来分析他们的行动逻辑。

[1] 张雄，2001，《讨价还价：政策法规与村民行为——对郊村拆迁过程的解读》，《开放时代》第12期。

[2] 折晓叶，2008，《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社会学研究》第3期。

[3] 李向军，2008，《风险社会视角下失地农民的困境与抗争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4] 徐琴，2006，《可行能力短缺与失地农民的困境》，《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5] 应星，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三、“种房子”始末

荷塘村位于宿迁市外环路两侧，江山大道以东，共包括王庄、辛庄、吴庄、赵庄、石庄、苗庄、潭庄、朱庄等 8 个自然村落。现有居民 556 户，总人口 2008 人。除赵庄及吴庄部分居于外环路居于外环路内侧，其余村落均居于外侧。见下面截图。



图 2：荷塘村地理区位图

注：图片源于百度地图截图

1999 年宿迁市开始修建外环路，沿线荷塘村吴庄，王庄一部分人家需要拆迁。政府在外环路外侧即路东划定区域安置拆迁户，由拆迁户自建新房，房子统一为两层小楼，楼下还有院落，外面的墙体统一刷成白色，很齐整。当时就赢得了那些没拆迁户的羡慕。

2000 年荷塘村的土地始被征用，一直延续到现在，大约有一百多次；2005 年自荷塘村的最南端——朱庄部分被拆迁，到现在还有 200 多户未拆迁。

拆迁是按原有面积进行折算的，到目前为止，荷塘村的拆迁安置共分两类：第一类是按面积折算，直接拿现款；第二种“房子换房子”，即原有房子多少面积，就可以换得相同面积的商品房。许多农户拆迁后获得了两套甚至两套以上的房子。所换的房子在荷塘村的东部——荷塘新区，是专为安置拆迁户而修建的小区，现在一期、二期工程早已竣工，已有居民前去居住，现在正修建三期工程。如果不愿意在荷塘新区换房子的农户，可以拿折算款自行购买。

尚未拆迁的荷塘村民很快意识到房子大可以获得更多的安置费，或者可以拿到更多的商品房，已经拆迁的农户也在不断地抱怨时间太紧，没来得及多建点房子。尚未拆迁

的荷塘村民开始悄悄添加房子，在 2006 年以前当时添加的房子，还是可以住人或储存物品。但是同时荷塘村也多次公告：严令禁止私自营建私人住宅。2005 年，荷塘石庄一位农户营建私宅，被当地人告密，被罚 500 元钱，这件事让荷塘村民很受震动，之后好多年荷塘村民都不敢私自建屋。

2009 年 10 月，荷塘村石庄、张庄、赵庄约 100 多户被拆迁，整个拆迁工程中在一个月被完成。后拆的农户连夜“种房子”，据说后种的房子也拿到了同样的拆迁款。买下这块地的是浙江的许港电子厂，是一期工程；许港一期拆迁工程以东的荷塘村区域为二期拆迁工程。据当地村民说二期工程大概在第二年 9、10 月份。村里一如既往地严禁“种房子”，但到 2010 年 7、8 月间，荷塘村还为拆迁的居民全部“种房子”：封院落，向前向后加建，在正房、侧屋即过道处加建二层或三层。据村民描述，当时天天夜里听到轰轰隆隆的声音，天天看到运材料的货车进村，天天晚上可以看到许多泥瓦匠忙碌，每天总能看到灯亮（连夜“种房子”），一夜间就可以看到邻居又多了几间房。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种房子”，村民说有可能第二批拆迁要提前，去年是 10 月份，今年应该是 9 月份。2010 年 9 月没动静，10 月没动静，当年春节期间村民议论纷纷，说有可能是翻过年四、五月份，然而过了 2011 年，2012 年，拆迁还是没什么动静。荷塘村人很愤怒，开始咒骂许港电子厂的老板。

荷塘村民的愤怒是有理由的，首先是因为“种房子”，家家户户增加了一笔支出，原本在房前屋后栽下的树木、瓜果都被连根刨起，少了一些时令瓜果，也少了一部分家庭收入，两项相加村民们更感觉到赔本了。其次是，院落被封，夏天很闷热，冬天不见阳光，很阴冷，一年四季，都是黑洞洞的，这与以前冬暖夏凉的四合小院是不同的，在里面很不舒服，尤其是老年人长期在这种房子里居住更容易得病。尤其是那些加盖了二层或三层的房子，原本当地人在建屋时往往是平地起房，不打地基的，现在起了层，地基就有可能不太稳，尤其是一些老房子，更是令住在里面的人提心吊胆：即便是晴好天气，室内也是阴暗潮湿，一遇上刮风下雨，室内就开始漏雨，刮风，有的居民说就感觉房子动。2011 年 6 月的某一天，当地风大雨急，有一家房子东侧屋与正房的衔接部分倒塌，但幸运的是无人受伤。

这房子何时能拆，当地人都不知道，2010 年以前说是 9、10 月份或过年后 4、5 月份，2011 年也是这么说，2012 年又是这样传说着。其实这只是当地人根据常识的一种推测：9、10 月份，农忙已过；4、5 月份，农忙还未到，而且这两个时间段不太冷也不太热。与其说这两个时间段适合于拆迁，倒不如说是村民盼望在这两个时间段拆迁。有

关拆迁时间的传言从何而来，当地人都说不知道，而村干部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2012年已经过去，村民又把希望寄予 2013 年。

当初在“种房子”时，就有人担心这样的房子会带来安全隐患，但是建筑工人说至少可以“撑个二、三年”，当年都以为过不了几个月这些房子肯定要拆，就算耽搁一下，也应该是第二年的事情，谁也没料到竟会拖得这么久。

四、“种房子”何以成为困境

作为一种与政府博弈的应对策略，农民“种房子”的初衷是为了在拆迁过程中能够占据有利地位，即获得较多的经济赔偿。但历经三年之久，“种”下的房子并没有如他们所愿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而成为一种安全隐患，可以说“种房子”的农民如今陷入了一种他们当初未曾料到的困境。可是，究竟谁该为这个困境负责？“种”房子的农民认为那个传说中要购买土地的许港电子老板应该付全部责任。而笔者以为这不过是因为许港电子作为不在场的陌生人，给予了当地农民的一个有效的宣泄渠道，因而成为了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笔者以为该村“种房子”之所以成为一种困境是与当地的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的。

（一）征地拆迁过程的持续性

荷塘村上的土地在 2000 年开始被征用，拆迁也在 2005 年开始。征地已经征了一百次，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而拆迁也是如此。该村土地被征用是在这些情况下进行的：如修建道路、开挖沟渠、扩建厂房及兴建居民楼等，当该村部分村民的种植用地及宅基地处于规划区内时，村委会便开始动员相关村民，于是开始征地拆迁。因为每次征地拆迁都是很突然，往往是一夜间之间相关村民就接到通知需要征地拆迁，农民们往往是拆迁完毕后才开始了解一些规则的真正含义，即便事后后悔，但由于每一次涉及到的都是一少部分的村民，形成不了强大的集体合力。而过不了多久另一批征地拆迁又开始了，而这一批赔偿的方式与上次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村民们比较清楚：越晚拆迁，赔偿越多；房子越多，赔偿越多。因此早期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心理不太平衡，他们经常性地在村里宣泄他们的不满，而那些尚未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在听他们的宣泄过程中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向他们讨教如何应对将来的拆迁。荷塘村大部分土地被征用发生在 2004 年以前，而自 2005 年开始拆迁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中。2009 年 9、10 月间的一次拆迁是规模较为宏大的，这一批次拆迁中许多较晚一点被拆迁的农民得以偷偷地“种房子”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而这种行为在当时也未被村委会阻止。这一切无疑是给其他村民的一种暗示：原来只要有房子，就可以拿钱。

荷塘村民在最初被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服从与顺从到后来集体采取“种房子”的行动，一方面是在该村持续性的征地过程中习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策的多变性让农民缺乏安全感，以至于他们开始了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二）从众心理

荷塘村民大规模“种房子”是在 2010 年夏天进行的，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尚未拆迁的农户全部种上了房子。有的农民一开始并不愿意“种房子”，但最终还是种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别人家都种了，如果你不种的话，显得跟人家不一样，自己感觉不舒服。对于农民的从众心理，斯科特有过论述：“一个农民从不会想到要单独做某件不寻常的事；相反，他受自己的群体所驱使。”在访谈中，有的农民说“盖这些房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捞上成本”，有的说，“后庄上人家说院子没封起来的与封起来的一样拿钱”。可是最终他们还是把院落封实，“种”上了房子。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愿意自己与村里其他人不一样，如果过于另类的话，村里人也会另眼相看的，那他在村庄里将会被孤立。另外，这种从众心理还体现在一种“法不责众”的心态，即尽管政府不允许“种房子”，但是大家都种了，也没见政府有什么举动。第三，表现在“多数人做的应该是正确的”这种心理认知上。如果大家都做了，就可以说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要不然为什么多数人都要做呢。和大家一起“种房子”，如果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扛，如果获益的话，那就更说明多数人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村民已经开始埋怨，“早知道这样，倒不如当初不把院子封实”，许多村民都强调，“要是有人拆掉（后续的房子），我马上就拆”，可是村里一直无人率先拆房，所以家家户户还是住在阴暗潮湿的院子里。

（三）征地拆迁过程中的信息的不对称性

征地拆迁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相关的赔偿规则标准也是由上级制定的，而农民所获得的信息只是知道自己的地被征了，房屋将被拆迁，赔偿多少钱，那是政府制定的。而由于荷塘村征地拆迁的持续性，即这一次赔偿标准与上一次赔偿标准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不一样他们不清楚，也无人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答案。他们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样的：这一批就是这个样，一批一个样。许多农民都不清楚自己的土地何时有可能被征用，房屋被拆迁。村里负责人往往说“我们也搞不清楚，上面叫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2009 年的拆迁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在当时村民纷纷传言：下一批所有的土地都被征完、房屋都被拆掉，而且据说是在下一年翻过年即 2010 年初春就要开始了。三年后，这一批拆迁还是没什么动静。在征地与被征地、拆迁与被拆迁过程中，主动者的一方与被动者的一方在信息占有方面均体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即政府——征地拆迁的主动方

——是信息的全能掌控者，而农民——征地拆迁的被动方——只是信息的接收者，信息占据的多少预示着行动能力的强弱。农民们从其乡邻处获得的信息往往真假难辨，他们所能获得的正式信息大多来自于当地村委会，而村民们在从村委会获得的信息时就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很快会被征用，房屋马上被拆迁，到那时候他们讨价还价的余地已经很小了，更多的时候，村民们不愿意直接面对村委会及直接与村委会发生正面冲突，更担心因自己的不顺从而使自己的邻居获得好处，因此，该村的征地拆迁一向较为顺利。村民们只是嚷嚷一阵子就算了，最后还是由村委会说了算。

（四）成本沉没心理

村民之所以怨那位不在场的许港电子厂的老板，关键是他们认为是该老板耽误了拆迁致使他们陷入了两难：久不拆迁，大部分房子已经成为危房，极有可能威胁到居住者的人身安全；拆掉又舍不得，毕竟买材料、找工人都是需要金钱的。本来希望靠此可以多获得一些经济补偿，没想到一直拖到现在，荷塘村民甚至有时认为也许他们这些“种房子”的村民将会永远被遗忘。荷塘村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地的工业园区与开发区早已布局到位，正在兴建的安置新区的三期工程基本完成，所有的交通要道已经铺设完备，好像再没有拆迁的需要，但是政府并不允许将旧房推倒再建新房。虽然说可以到新区买房安住，可是村民认为没有拆迁就去买新房，是亏大了。而且当地又有一种谣言，说尚未拆迁户如果购买了新区房子，在拆迁后他们购房时将不再享受优惠政策。之所以将此种说法称为谣言是因为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在前期有部分居民在新区买房后，在“以房换房”的拆迁补偿中依然换到了相应的房子，即购买新房并不影响他们后期的拆迁补偿。

在前期决策中成本已经投入，但随着事态发展，投入的成本已经无法收回，而决策者却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决策方式，心理学上把这称为“成本沉没心理”，这些已经发生而且不可收回的成本（如金钱、时间、精力及感情等）被称为“沉没的成本”。已经投入的成本已经没有明显的收益，但决策者顾及到已经投入的成本而不愿意及时改变对策。因为如果放弃了继续行动，那意味着前期投入为零，尽管目前态势不乐观，但只要支持下去，也许总有收回成本的可能。对于“种房子”的村民来说，已经种下的房子、坚守于老屋拒绝购买新房等待拆迁便是一种可能的“沉没的成本”。有的已经拆迁的村民说在拆迁中拆迁办是按照2008年的房子面积补偿的（2008年该村尚未出现“种房子”现象），即“种”了也是白种，而且“种房子”还要多出一部分支出。可是那些“种房子”的村民却无人愿意将那些“种”下的房子拆去，而宁愿守着黑洞洞的庭院。他们一

直认为盖好的房子如果白白拆掉，那岂不是划不来，多一点肯定要比少一点要好，而且大家都加盖了房子，那些村委会都是乡邻，无论如何也应该给一点成本钱。

当然，造成荷塘村“种房子”困境的因素远不止于这些，正如那个始终不在场许港电子厂也应该为此付一定的责任，因为在村西一带正在兴建的居民楼的开发商正是许港电子厂，而这块地原本是用来建厂房的，这处房子已经建了三年多，还只是地基。另外笔者感觉到很有意味的是，当地政府在“种房子”的行动中仿佛突然消失，在历时一个多月的“种房子”的过程中，政府没有任何举措。这是当地政府对此行为的默许，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反抗？对于这些问题的探寻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研究。

在观看征地拆迁过程中，村民逐渐学会如何去应对，“种房子”无疑是他们认定的较为稳妥的一种应对方式，而实际拆迁日期的无限延长，致使“种房子”成为当前村民们无法摆脱的困局。这里没有过激的行为，也没有公开的冲突，甚至连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都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无组织的集体行动，“种房子”行动在本质上是农民对于自己权益的一种有意识的维护，是一种力图在可允许的范围内的无声的讨价还价。参照以往的惯例，“种房子”是一个投资小但回报较为丰厚的行为，所以后来的村民无一例外选择了这一行动，但是开发商迟迟不见行动，村委会默默无声，“种房子”的村民发现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维持现状等待拆迁还是扒掉种下的房子享受阳光？这一次，小农的从众心理与坚决不当领头羊的心理又一次占了上风，他们保持一致沉默，或者说他们还是在期待拆迁，期待这些“种”下的房子可以补偿他们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种房子”困境的形成决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故事，因为凡是偶然的故事背后都有着一个必然。困境是在众多的合力下形成的，而困境的中摆脱则只需要其中任何一方一个有力的举措。

参考文献：

- 赫伯特·西蒙著，1989，《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论说》，杨砾、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33页。
- 李向军，2008，《风险社会视角下失地农民的困境与抗争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孟庆延，2012，《“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西奥多·W·舒尔茨，1987，《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89

单位社区的变迁所带来的问题研究

——以某高校家属区为例

肖植纓

摘要：笔者根据对某高校搬迁后的家属区进行了调查，从邻里关系、居民和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关系三个方面来研究其变迁所带来的问题。在邻里关系中存在着原有规则被打破以及感情冷漠的问题，居民和单位的关系中有居民单位情结遭受“创伤”以及相关机构的工作面临挑战的问题，家庭关系层面主要存在关系的复杂化问题。笔者希望从这几个方面来反映单位社区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单位社区的转型和建设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高校搬迁 单位社区 邻里关系 居民和单位关系 家庭内部关系

一、引言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由改革前的单位制社区模式逐渐向具有现代城市生活意义的社区模式转变。但是在这浩大的转型大潮中，传统的单位制社区并非“一刀切”，而是呈现了参差不齐的现状。目前虽然这种社区不再是城市社区的主流模式，但其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在社会的变迁洪流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本文研究对象是一处于变迁过程中的鲁北某高校家属区，该高校 1969 年在 D 市建校，在 2011 年几乎整体迁至 Q 市。D 市校区主要有教学区和生活区，生活区总共分为八个区，每个区有 10—15 幢楼不等。现在教学区几乎关闭，只有生活区也就是所谓的家属区还有一部分居民，且多数是离退休职工以及家属，在职教职工多数跟随学校迁至 Q 市。之前该家属区是一典型的封闭完整的高校职工住宅区，因为学校的整体搬迁打破了其封闭完整性，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影响。本文从邻里关系、单位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变化三个方面着手深入了解该社区的变迁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笔者希望以此为个案来反映单位制社区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发展困境，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单位社区的变迁

（一）邻里之间的关系

对于“邻里”的界定，费孝通说：“邻里就是一组户的组合，他们日常有着很亲密

的接触并且相互帮助。这个村里习惯上把他们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对此他们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乡邻’。他们互相承担着特别的社会义务。”说到邻里我们就不能不提乡土社会，乡土性表现为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稳定的社区组成、集团聚居的空间格局、以社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首属关系为主的差序化的社会网络、排外性和内聚性的社区认同等特点。而在中国计划经济特殊的城市制度与空间背景下，单位制体现了这种乡土性在城市中的延伸。单位作为一种制度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和内聚性，规范了单位居民的行为模式，形成了具有类似乡土性的单位社会空间。在搬迁前该家属区八个区中住的几乎都是该大学的教职工，相互熟悉，平时交往频繁。大家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形成了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彼此之间的感情是真诚而深厚的。特别是对在这里生活了 30 年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这里留下了他们大半辈子的记忆，从该校 1969 年在 D 市建校以来他们就生活在一起，在当时，D 市还是一片不毛之地，面对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这些“外来人”更加团结互助。

1. 规则被打破的邻里关系

随着政策的改革以及学校发展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住宅管理和服务，学校决定将房产证发给教职工个人，不再由学校统一管理。当时要求房屋的交易只能进行内部交易，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将房子租给外面的人。因为该高校里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学质量不错，在 D 市的口碑也很好，加之学校接近商业区，所以“暗租”现象并不奇怪。

在四区访谈时遇到一 75 岁的大爷说：“搬迁后我自己住在一层，二三层都空了，只有第四层住了一对年轻人，在这租的房，我都不认识，这对年轻人素质很差，经常从四楼扔垃圾扔、吐痰，都搞到我的院子里了，脏得很。以前没事还到院子坐坐，现在都不敢坐在那了。而且他们每次垃圾袋不扔到垃圾桶直接扔到楼底的树下，很不像话。我的女儿去找他们理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

大爷的女儿非常生气地说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现在居民区内居民构成变得复杂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访谈中有些居民还提到了之前居民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早上七点前，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以及晚上九点后是不许在家里或者外面大声喧哗制造太大噪音的。但是现在的许多外来居民在这方面并没有遵循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个阿姨提到她的邻居装修的时候从来不考虑他们，中午也不停工，噪音非常大，他们根本没法睡午觉。

原来的单位社区有“熟人社区”、“乡土社会”的特征，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

单凭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而这些外来人作为非单位新居民进入单位社区后,社区原有的生活规则 and 行为规范被打破了。就像垃圾应该扔到垃圾桶,别人休息的时候不要制造噪音,这对在该小区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常识,如果你违背了肯定是要被人埋怨指责的,但对于外来人来说,他们没有在这个社区中生活过,一些规则对他们来说并无约束力。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之前的居民多是大学教师,他们和这些外来人的基本素质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这些年轻人从 30 年前就一直住在这里,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2.感情冷漠的邻里关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感情定向的界定:一个人发展感情的方向受着文化的规定,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却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喜怒哀乐固然是生理现象,但是总发生在人事圈局之中,而且影响人事的关系,它们和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在社会现象的一层里得到它们的意义。

访谈中很多居民在谈到对未来养老的担忧时,讲述了发生在去年冬天的一件事: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身体一直不错,之前和邻居关系很好,虽然八十多了,还经常和邻居到楼下来转转,但是前年邻居搬走了,新来了一对年轻人,这位老奶奶就很少出来了。平时和外人交往的很少加上子女不在身边以至于她去世好几天都没人知道。这件事让整个居民区的人都感慨万千,他们在这位老奶奶的事件中想到了他们的将来,流露出的是担忧和无奈。

笔者在此处提到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责怪新来的这对年轻人,他们住到这边的时间并不长,再说年龄的差距让他们的交往很少是正常的。如果之前的邻居没有搬走,这位老奶奶肯定和邻居经常走动,这种事情就有可能避免。正如费老所说的感情定向问题,它受着文化的规定,它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发生着它的作用。当然这是个特殊案例。但是在访谈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多数居民和外来人几乎没有交往的,他们虽然住在同一社区,但是形同陌路,完全没有了往日居民之间的亲密感情,有的只是陌生的面孔、冷漠的感情。

(二) 居民和单位的关系变化

1.居民的单位情结遭受“创伤”

单位社区是一个熟人的社区,在其保障居民生活的同时,也将人们的社会交往多数限制在了单位内部。这种封闭化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催生出了单位人那种特有的单位情

结。同时也使居民对单位的依赖性极强，而这次学校的搬迁让多数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和依赖性遭受“创伤”。

访谈中有位老奶奶说：“当年他们从北京搬出的时候，学校的相关领导是执意让我们来这，那时的 D 市就是荒凉一片，很多人都动过要走的念头，都被领导说服了。D 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盐碱地，树木很难生长。当时为了绿化学校，我们到外地去运土，用那种小毛驴车，一车车的运到学校来种树，种草，可是有的长两年就死了，只能是重新返工。现如今都长成参天大树了，可是学校就那么毅然决然的走了，花费那么多钱去 Q 建校，这不是浪费资源吗。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现在根本就没人了。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现在领导走了，这个家的一家之主没了，大家被拆的四分五裂，小家也被折腾的乱七八糟。”

从她的言语中流露出的是那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们当年的付出被否定，更没有得到欣慰的回报。说到一家之主，也就是他们心中所谓的组织所谓的单位，“组织都走了，谁还会管我们”，这恰恰折射出了他们内心的归属所在。中国的单位现象使单位人员对单位具有高度依赖性。人们一旦进入单位，在获得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单位属性，单位严格的管理制度将单位人员禁锢在其内部，成员在劳动报酬，生活条件等方面高度依赖于单位，正是这种单位管理方式使该社区的居民对其单位的认同感和依赖性极强。他们生活的年代就是“有问题找组织”，虽说年代变了，可他们内心仍是向组织靠拢的。领导都移至 Q 市，让他们觉得心中的组织已经移居 Q 市，单位的模型消失了，而他们成了组织的弃儿，没有了单位的“荫蔽”。

单位的“关怀主义”使多数居民习惯了对单位要求各种福利待遇，这次学校整体搬迁后，开始收取物业费以及水电取暖费等，这在之前都是免费的。对于这个问题一位阿姨讲到了 2013 年春节时发生在他家的一件事“快过年的时候我家的马桶突然堵了，我和我老伴弄了半天就是不行，我们没辙啊，孩子都不在身边，就给维修的地方打电话。维修的人一进门就先要五元上门费，然后再去卫生间给查看，维修人员检查了一下说很难修理，弄不好马桶就会坏掉，最后没修好就走了。我们老两口又捱饬了半天还是不行，最后就让那维修的人来把马桶给拆了，那个人又要了二十五元的维修费。我们问他要个收据什么的他说没有，他们太不正规了，钱是装自己腰包还是上交谁知道啊。”旁边的阿姨附和着说“免费这种事以后就别想了，都得自己掏腰包。别说这，现在过年过节的都发不了什么福利了，不能跟以前比了啊！”

居民习惯了在这种单位的关怀下生活，水电气暖费用的征收在现在的商业小区里是

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对这种典型的单位制小区是不同的，封闭化的工作和生活空间，使单位人的归属意识和对单位的依赖性极强，而这次学校的搬迁让多数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和依赖性受到了创伤。学校刚搬走就对政策调整，这让居民觉得单位的这把大伞再也不能为他们遮风挡雨，所以在以“福利”为焦点的问题上居民觉得这不仅仅是福利的问题，是学校的做法明显的在“抛弃”他们。

2.居民对相关机构工作的埋怨

学校搬迁之前居民区内楼道的卫生是由学校勤工俭学的学生负责打扫，居民自己保持的也很好，所以平时是很干净的。现在是由学校物业管理中心负责，加之很多外来人在这些方面并不遵守社区的规则，居民反映楼道没有以前干净了，外面的绿化带也长满了杂草。访谈中有位家属说她之前就在学校做保洁工作，但是学校搬走后相关的领导就把他们辞退了，“现在的卫生之所以这么差，是因为打扫卫生的人都是和相关领导有关系的人，他们哪是打扫卫生，天天在那晒太阳，反正领导又不检查，打不打扫一月都能领到一千多块钱。”在这个问题上物业方面说：“现在的物业管理中心也是之前的好几个机构合并的，学校的主要精力是在新校区那边，这边很难顾及到，鉴于资金问题还辞退了一些之前的聘用员工。”对于那位家属所说的物业相关负责人是持否定态度的。

整个学校的安全问题是由学校的安全处来负责的，之前学校的治安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访谈中很多居民反映自行车、电动车经常丢，入室抢劫也发生了好几起，他们对目前的现状非常不满。笔者在该校的网页上也看到了相关的信息：2011年5月17日，发生高档帕萨特轿车被盗案件；2011年8月19日近期，我校周边家属区盗窃案件频发。7月25日、30日凌晨，我校家属区发生攀登窗户、入室盗窃案件；8月18日夜間，又发生撬防盗护栏爬窗入室盗窃案件。2012年3月8日，我校及周边学校近期发生的笔记本盗窃案件。

对此事居民反映学校的门卫数量减少了很多，而且多数是老年人在那看门，公安处那边平时几乎就不巡逻了。由于外来的租住户使居民区的人员构成变得比较复杂，同时也加大了人员的流动性。对于租住户没有统一的管理及规定，这就使门卫对出入人员无从管理。所以门卫主要是对出入的轿车检查，对行人和电动车以及自行车都“无权问津”。

单位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方式为单位成员及其家属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单位里的物业管理中心不是营利性的企业，他们不同于外面商业化运营模式、以营利为目的物业管理公司，现在学校资金不足，给的经费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在学校所给经费范围内尽自己职责去干好相应的工作。对于该居民区的物业和安全问题，并不排除

学校相关的领导迁至 Q 市校区之后，相应的治理监督工作做的不到位，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治理使人们服从正式制度和规则，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学校搬迁使该校区的治理机制不再完善，致使相应的资源也得不到合理的配置。目前居民对相关机构的工作的确是不满意的成分占据多数，他们之前对这些机构非常尊重甚至充满感激，现在随着一些使居民利益受损的事情的发生，居民对他们的态度也渐渐由尊重转为抱怨了。

（三）家庭内部关系的复杂化

校址的搬迁迫使大多数的非双职工家庭只能过着分居生活，据说这类家庭有五六百户左右。而这种长期的分居使一些家庭出现裂痕，甚至离婚。访谈中一位阿姨说她儿子的办公室七个人，有五个离婚了。具体的数据笔者没有去证实，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学校搬迁，是分居导致了离婚，可能有其他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因素的潜在“推动”。在这种家庭中还有一问题就是所谓的婆媳关系，调查中有位阿姨就讲到了她家的故事

阿姨：“儿子在 Q 市校区上班，儿媳在 D 市上班，儿子家在 Q 市买了房子，儿子和孙女的户口也在去年搬迁时迁至 Q 市了，那边高考分数比这里低啊。但是现在孙女和儿媳还是在这住。他们现在生活很不方便，儿子一般半个月回来一次，忙的时候一个月，每次回来做学校班车花费将近 200 元，要是自己开车得四五百。儿子自己在那边也没人照顾，天天吃食堂。”

我：“那孩子和儿媳怎么没过去呢”。

阿姨：“那边哪有学校啊，小孩上学得送到市区那边，天天接送，那天天油钱得多少啊。再说儿媳的工作在这边很好，现在找份工作多么不容易，哪能说辞就辞了啊”。

我：“您在这边怎么样啊，习惯吗？”

阿姨：“一点也不习惯，哪有在自己家舒坦啊，但是为了儿子没办法呀。你看前几天那个储老师家，婆婆来好心给他们接送孩子减轻他们负担，可没想到和媳妇不对付啊，那储老师和他媳妇都离婚了。哎，不好处啊。”

其实阿姨的讲述道出了婆媳间的关系问题，人和人之间相处难免出现摩擦和矛盾，婆媳关系更是相对复杂、微妙的关系。日常生活中，多数人会选择尽量不要生活在一起的办法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但是这种家庭鉴于生活的需要，他们只能住在一起，这就难免使家庭内部的关系变得相对复杂。

阿姨说的情况确实存在，分居不仅使生活的成本增加还使很多家庭的关系变得复

杂。访谈中听有些居民说有很多人想回来。当然，这都是听说而已。不过在访谈相关机构负责人时，负责人说现在针对分居的情况居民反映较多，学校也在着手解决该问题。前段时间已经有近 50 名教师通过申请又回来了，回来主要给成人教育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上课，但这些只是杯水车薪。

总之，该家属区在慢慢地脱掉单位的外衣向后单位社区转变，但是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居民以及相关机构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此笔者想特别强调一下该社区的居委会，其工作人员是学校配置的，他们的任务只是负责家属和儿童的医疗和养老工作，现在这些工作都已归到 D 市统一管理，该社区的居委会形同摆设，根本就没有起到它的作用。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居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的组织。从法律角度看，驻单位社区居委会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其权力来源于社区全体居民代表大会；从政治民主角度看，驻单位社区居委会是一个维护居民利益和民主管理居民公共事务的居民民主组织；从功能看，驻单位社区居委会是一个稳定社会、服务居民、表达民意、调节纠纷、维护治安和协助政府和单位关系的组织。总之，驻单位社区居委会不应是基层政府和单位的下级组织，不应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企业，也不应是事业单位，而是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实现居民互助、管理居民公共社会事务的自治组织。笔者觉得鉴于目前该社区的现状居委会应该转变其职能，使之成为能真正表达民意、为人民利益考虑的机构。

三、小结

学校的搬迁是一项很大的工程，特别是对已经扎根四十多年的学校来说，整体搬迁难免会遗留一些问题。由于单位社区的特殊性，其“乡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单位社区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杂化的过程。一定程度上的杂化就会对整个单位社区造成一定的冲击。像邻里间的规则被打破以及邻里间感情的冷漠这些问题也许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像社区的安全问题，卫生问题只要相关机构能把工作落到实处，相应的监督工作做到位，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过渡期。我们也并不企求所有问题一天两天就能改变、就能解决。但是相关机构应该很好地迎接挑战，尽量弥补居民单位管理弱化后所形成的“真空”，建立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完善各种法律法规，把本职工作做好，给予居民更多的人文关怀，让这些已经为国家、为社会、为学校做出贡献的人能安度晚年。

笔者仅仅是以这一高校家属区为例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对其他方面的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希望通过对单位社区变迁过程中问题的呈现，能对单位社区的

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7，《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41、p47。

费孝通，2009，《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p95-96。

李汉林，2004，《中国的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文星、尹鹏程，2007，《论驻单位社区居委会的困境及其对策——以大学校园内的社区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塔娜、柴彦威、刘志林，2012，《单位社区杂化过程与城市性的构建》，《人文地理》第3期。

俞可平，2000，《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作者简介：肖馥纓，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彭 翔

※ ※

顾金土副教授讲座：农村人居环境评价及建设研究

1月9日下午，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顾金土副教授在管理楼402会议室做了题为《农村人居环境评价及建设研究》的专题讲座。讲座由社会学系副主任王毅杰副教授主持，《江苏社会科学》方心清研究员及社会学系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在讲座中，顾老师介绍了关于农村人居环境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结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顾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指标体系，即将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数分为自然环境、人造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不同的子系统在研究中所占权重和包含的变量、指标各不相同。在对农村人居环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顾老师分别对农村人居环境总指数和分指数进行了分析，并将村落分为三类：宜居村、安居村和次居村。接着，顾老师指出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评价的因素包括村落荣誉级别、地理位置和聚居形态等。而后，顾老师提出了关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几点建议，并通过图片的形式展示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面临的一些问题。讲座最后，方编辑和社会学系老师就此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我国当前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顾老师的研究主题和实证研究方法均值得师生借鉴。

（彭翔 供稿）

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调查研究

——以 HH 大学 J 校区为例

胥鉴霖

摘要: 本文以南京 HH 大学 J 校区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状况进行了个案分析。研究发现, 大部分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和使用手机, 只有少数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现象, 但部分学生已出现手机强依赖, 需要引起重视。另外, 本文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专业、年级这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程度, 从个人、朋辈、家庭、社会四个方面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 大学生 手机依赖 现状 影响因素 比较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手机人数最多的国家, 且使用手机的人口数仍在逐年攀升。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1990 年, 中国仅有手机用户 1.8 万户; 到 2000 年底, 飞速攀升到 8 453.3 万户; 2002 年 8 月 14 日, 达到 1.206 亿户, 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据预计, 到 2006 年底我国手机用户数将超过 4.4 亿。^[1]近几年, 手机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手机依赖即是其中一种。在手机这一媒介工具高度普及的今天, 它所承载的职能和功效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沟通和联系, 而成为现代人体现个性和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手机的过度使用, 在某种情况下会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体验和心境, 对手机的依赖过度也让受众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 使得主体被客体化。若长期地沉溺于这种体验之中, 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刘传俊等人的研究就显示手机短信交往行为已明显影响到大学生的焦虑水平^[2]。

手机在大学生中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 为了解高校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依赖程度, 我们选取了 HH 大学 J 校区的学生为调查对象, 编制了手机依赖问卷, 选取部分人群进

[1] 王芳, 2008, 《山西大学本科生手机依赖研究》, 《中国健康教育》第 5 期, p380 — 385。

[2] 刘传俊等, 2008, 《江苏省 513 名大学生短信交往行为调查》,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 5 期, p357。

行调查。问卷共发放 300 份，并利用 SPSS 17.0 for Windows 软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所得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处理。

一、相关概念及研究回顾

（一）手机依赖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手机使用的普及化，“手机依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类似“网络成瘾”等行为成瘾的异常行为方式，有学者也称其为“手机综合症”、“手机依赖综合症”、“手机焦虑症”、“手机成瘾”等。韩登亮等人将“手机成瘾症”界定为由于某种原因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病症。徐华等人从操作层面界定为：由重复地使用手机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产生强烈的、持续的需求感和依赖感的心理和行为。

心理医生指出：手机依赖症属于一种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可综合为：1、出门如果忘记带手机就会心神不宁，有落寞感或总想着手机；2、手机没信号或信号减弱便开始烦躁；3、常把手机放在随时都能拿到的地方，即使睡觉时也放在身边；4、经常下意识地拿出手机看，在开会或要求静音的其他场合，会下意识地悄悄查看手机；5、经常会感觉自己手机在震动或者在响，其实没有；6、如果手机铃声长时间不响或来电明显减少，会感到不适应、甚至心烦意乱；7、在与人沟通时过分依赖手机，明明可以直接面对面交流，却要发短信或打电话。^[1]有关专家指出，如果具有上述症状中的一半以上，那么就很有可能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它实际上是一种焦虑、一种期待，表现为心理渴求和心理依赖。虽然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疾病，但长此下去会严重影响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后果。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课题：“‘短信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及行为影响的问题研究”中对“手机依赖”的定义：使用手机（短信息）作为其人际互动主要手段的群体，存在强烈的、持续的需求感和依赖感的心理和行为。

本文中的“手机依赖”有四个维度：失控性：指使用者在手机上花费大量时间而不能自控；戒断性：指无法正常使用手机时出现挫败的情绪反应；逃避性：指利用手机回避一些现实问题；低效性：指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到日常生活学习的效率。

（二）关于手机依赖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手机依赖成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征描述上，并且对产生手机

[1] 蒙雨，《缓解你的“手机依赖症”》，（<http://dlib.cnki.net/kns50/scdbsearch/cdbindex.aspx>）。

依赖的社会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

1.手机依赖与焦虑状况的研究

手机依赖作为一种异常行为,会导致人的焦虑心理。黄玉莉调查发现大部分大学生表示出门忘带手机后会很不舒服,有人甚至无法忍受,产生幻听,这些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焦虑特征。^[1]朱其志等人研究表明有关手机短信依赖程度的6个变量与焦虑状况均成非常显著性的正相关。工作短信对焦虑状况有非常显著正性预测关系;陌生交流对焦虑状况有显著正性预测关系。大学生短信交往行为一旦受阻,会产生相应的焦虑情绪,严重时会出现心烦意乱、情绪难以自控的状态。^[2]

2.手机依赖与孤独感的研究

在此类研究中,黄才炎等人发现频繁地使用手机短信交往与孤独感有关;对手机短信交往行为的自我认知上的不同可能与更大群体关系的孤独程度有关;朋友友谊关系的孤独程度与大学生的手机短信交往行为的自我控制、情绪体验、自我认知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3]

3.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的研究

相关研究发现,产生手机依赖症可能与个体人格有关,王碧英等人认为具有外向、活泼、待人热情、好交际等人格特征的人更容易造成手机依赖,即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与其个人的社交能力成正比。而秦曙等人的研究认为,孤僻、自信水平不高、低自尊、低自我评价的人也可能造成手机依赖。Bianchi 也发现了手机依赖的人具有外向的、低自尊的人格特征。

综上,近年来研究手机依赖的热潮很高,但很多只是停留在定性层面,对手机依赖与其他方面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还是比较少,在研究中存在着角度相对单一、资料运用相对薄弱等问题。本文从手机依赖程度的四个维度,结合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教授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采用自编的手机依赖问卷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所得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并从个人、朋辈、家庭和社会等四个方面分析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可以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的研究做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1] 黄玉莉, 2009,《大学生手机短信使用情况及影响的调查分析》,《中国教育信息化》第11期。

[2] 朱其志、宫佳等, 2009,《江苏省513 名大学生短信交往行为与焦虑状况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第3期。

[3] 黄才炎、严标宾, 2006,《大学生手机短信交往行为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3期。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以南京HH大学J校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图书馆、寝室及实验室随机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回收率100%。(见表1)

表 1：大学生被试样本构成情况

	类别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167	55.7
	女	133	44.3
年级	大一	19	6.3
	大二	111	37.0
	大三	42	14.0
	大四	19	6.3
	研一	90	30.0
	研二	14	4.7
	研三	5	1.7
专业	文科	105	35.0
	理工科	195	65.0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在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考察手机依赖程度的四个维度：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

2.问卷法

从手机依赖程度的四个维度，结合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教授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根据该院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制了《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调查问卷》。问卷由以下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小组成员自编，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专业、是否独生子女等项目，二是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大体上分为四个方面：个人因素、朋辈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第二部分为手机依赖状况调查，采用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教授编制的《中学生手机依赖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共 17 道

题目，每个题目按“从不”到“经常”采用5级评分，量表总分与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手机依赖程度越深，在各维度及总体上每题所得平均分大于等于3分的，判断为手机依赖。最后用SPSS 17.0软件对此次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经过测试表明，本次使用的《大学生手机依赖调查问卷》及其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均符合统计学要求，能够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其效度也比较高。

3.访谈法

通过对问卷调查中得分最高的1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该院校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现状。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手机依赖现状

300名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及分量表得分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平均每题得分大于等于3分的，即判定有手机依赖倾向。

表2显示，总手机依赖平均分大于等于3分的大学生仅占总数的10.7%，说明HH大学J校区的大部分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和使用手机，少数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现象。在四个维度中，逃避性最为明显（占样本总数的37.3%），表现为当事人利用手机回避一些现实问题。其次是戒断性（占样本总数的33.7%），指无法正常使用手机时出现挫败的情绪反应。

表 2：大学生手机依赖描述性统计结果

	总手机依赖	失控性	戒断性	逃避性	低效性
人数	32	22	101	112	61
比例（%）	10.7	7.3	33.7	37.3	20.3

（二）性别比较

总体来说，男生平均分要略高于女生，但男生和女生在总依赖程度上以及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维度上并不显著。(见表3)

在失控性维度上，性别差异比较显著，达到了0.05的水平。表现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在失控性维度上产生手机依赖，说明男生更易在手机上花费大量时间而不能自控。（见表4）

表 3：男女大学生在总依赖程度及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性别	人数	小计
总依赖	男	23	32
	女	9	
失控性	男	17	22
	女	5	
戒断性	男	57	101
	女	44	
逃避性	男	57	112
	女	55	
低效性	男	37	61
	女	24	

表 4：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失控性维度上依赖程度的方差分析

ANOVA 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失控性 * 性别	组间	(组合)	.305	1	.305	4.529	.034*
	组内		20.081	298	.067		
	总计		20.387	299			

注：* 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01 的显著性水平。

（三）是否独生子女比较

在是否独生子女因素上，不同独生子女状况的大学生在手机依赖总体和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维度上的频数分布差异不明显，情况见表 5。

根据方差分析显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因素在手机依赖总体和四个维度上的数值均高于 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这一因素上的差异不显著。（见表 6）

表 5：不同独生子女状况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数分布

	是否独生子女	人数	小计
总依赖	是	16	32
	否	16	

续表 5

失控性	是	9	22
	否	13	
戒断性	是	45	101
	否	56	
逃避性	是	52	112
	否	60	
低效性	是	28	61
	否	33	

表 6：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总依赖程度及各维度的方差分析

ANOVA 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总依赖* 是否有 兄弟姐妹	组间	.001	1	.001	.006	.937
	组内	28.586	298	.096		
失控性* 是否有 兄弟姐妹	组间	.046	1	.046	.671	.413
	组内	20.341	298	.068		
戒断性* 是否有 兄弟姐妹	组间	.311	1	.311	1.388	.240
	组内	66.686	298	.224		
逃避性* 是否有 兄弟姐妹	组间	.141	1	.141	.600	.439
	组内	70.046	298	.235		
低效性* 是否有 兄弟姐妹	组间	.058	1	.058	.359	.550
	组内	48.538	298	.163		

（四）专业比较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数分布情况如表 7 所示。

根据方差分析，达到0.05 的水平才能说明差异水平显著。据表8显示，无论是手机

总依赖程度，还是从四个维度来分析，文科生和理工科生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见表8）

表 7：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数分布

	专业	人数	小计
总依赖	文科	12	32
	理工科	20	
失控性	文科	9	22
	理工科	13	
戒断性	文科	35	101
	理工科	66	
逃避性	文科	40	112
	理工科	72	
低效性	文科	18	61
	理工科	43	

表 8：不同专业大学生在总依赖程度及各维度的方差分析

ANOVA 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总依赖 * 专业	组间	.009	1	.009	.098	.755
	组内	28.577	298	.096		
失控性* 专业	组间	.025	1	.025	.362	.548
	组内	20.362	298	.068		
戒断性* 专业	组间	.002	1	.002	.008	.929
	组内	66.995	298	.225		
逃避性* 专业	组间	.009	1	.009	.040	.842
	组内	70.177	298	.235		
低效性* 专业	组间	.164	1	.164	1.012	.315
	组内	48.432	298	.163		

（五）年级比较

1.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从大一至研三分为七个年级，根据表 9 可知，各个年级出现手机依赖情况的人数分别为 2 人、7 人、8 人、5 人、10 人、0 人、0 人。其中研一学生出现手机依赖的人数最多，为 10 人，占手机依赖总人数（32 人）的 31.25%。在调查的研二和研三学生中，没有出现手机依赖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调查到的研二和研三的学生在样本数量上较少，根据访谈得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因为这两个年级的学生年龄更大，心智更成熟，即将步入社会，忙于各种事务，因而不容易对手机产生过多的依赖行为。

根据方差分析显示，年级因素在手机依赖上的差异不显著。（见表 10）

表 9：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数分布

		年级							合计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一	研二	研三	
手机依赖	否	17	104	34	14	80	14	5	268
	是	2	7	8	5	10	0	0	32
合计		19	111	42	19	90	14	5	300

表 10：不同年级大学生在总依赖程度及各维度的方差分析

ANOVA 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手机依赖* 年级	组间	（组合）	1.189	6	.198	2.120	.051
	组内		27.397	293	.094		
	总计		28.587	299			

2.学历上的比较

本科生中出现手机依赖情况的人数占本科总人数的 11.52%，硕士生出现手机依赖情况的人数占硕士总人数的 9.17%（见表 11），根据方差分析，学历因素在手机依赖上的差异不显著（见表 12）。

表 11：不同学历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数分布

内容	学历	人数	占比（%）※	合计
手机依赖	本科	22	11.52	32
	硕士	10	9.17	

※注：计算方法：本科生出现手机依赖的人数占本科总人数之比；硕士出现手机依赖的人数占硕士总人数之比。

表 12：不同学历大学生在手机依赖程度的方差分析

ANOVA 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手机依赖 * 学历	组间	（组合）	.038	1	.038	.398	.529
	组内		28.549	298	.096		
	总计		28.587	299			

3.低年级和高年级比较

表 13：本科低年级与高年级大学生在手机依赖程度的均值检验报告

年级	均值	N	标准差
低年级	.07	130	.255
高年级	.21	61	.413
总计	.12	191	.320

表 14：本科年级高低不同的大学生在手机依赖程度的方差分析

ANOVA 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手机依赖 * 年级高低	组间	（组合）	.860	1	.860	8.731	.004**
	组内		18.606	189	.098		
	总计		19.466	190			

注：* 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01 的显著性水平。

对于本科生，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出现手机依赖的人数为 13 人，大一大二低年级学生出现手机依赖的人数为 9 人，在方差检验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本科生中，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更依赖于手机。（见表 13、表 14）

对于硕士生，出现手机依赖的研一低年级学生有 10 人，在调查到的研二研三高年级学生中没有出现手机依赖的情况，可能原因的分析如上文，在此不再赘述。

（六）个人因素与手机依赖的关联性

在个人因素方面，通过方差分析，可以得出一个人独处时感到无聊的频率在手机依赖上的差异较为显著，达到了 0.05 的水平（见表 15）。总的来说，独处时经常感觉到无聊的大学生比偶尔或者从未感觉到无聊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

表 15：独处时感到无聊的频率在手机依赖程度的方差分析

ANOVA 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手机依赖 * 独处时感到无聊的频率	组间	(组合)		.801	2	.400	4.281	.015*
	组内			27.786	297	.094		
	总计			28.587	299			

注：* 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001 的显著性水平。

（七）朋辈因素与手机依赖的关联性

在朋辈因素方面，有两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拥有亲密朋友的数量、聚会时看到别人玩手机时的表现。拥有更多亲密朋友的大学生较之朋友较少的大学生产生手机依赖的可能性更低；对于在聚会时看到别人玩手机时的表现，选择“跟着玩”的大学生较之选择“阻止他”或“无所谓”的学生在手机依赖上表现的更为显著。（见表 16）

表 16：拥有亲密朋友的数量、聚会时看到别人玩手机时的表现在手机依赖程度的方差分析

类别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手机依赖 * 拥有多少位亲密朋友	组间	(组合)		.967	3	.322	3.453	.017*
	组内			27.620	296	.093		
	总计			28.587	299			

续表 16

手机依赖* 聚会时	组间	(组合)	.997	3	.332	3.567	.015*
看见旁边有人玩手机	组内		27.589	296	.093		
时会怎么做	总计		28.587	299			

注:* 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0.001 的显著性水平。

(八) 家庭因素与手机依赖的关联性

在家庭因素方面:通过方差分析,发现“与家人关系的亲密程度”在手机依赖程度上较为显著,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与家人关系越冷淡的大学生,对手机依赖表现的越显著。(见表 17)

表 17: 与家人关系的亲密程度在手机依赖程度的方差分析

类别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手机依赖 * 与家人关系的亲密程度	组间	(组合)	.933	4	.233	2.488	.044*
	组内		27.654	295	.094		
	总计		28.587	299			

注:* 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0.001 的显著性水平。

(九)手机功能方面的分析

在社会因素方面,通过方差分析,得到“手机功能增多对个人使用手机的影响”这一因子在手机依赖上表现的特别显著,达到 0.001 的显著水平(见表 18)。手机功能的增多容易使学生产生手机依赖。说明在通讯技术迅速革新的今天,虽然手机功能的增多为大学生提供了方便,但如果年轻的大学生不能正确使用手机,而是过度依赖于手机各项新奇的功能、沉迷于手机营造出的精彩世界而不能自拔,则容易掉入手机依赖的泥淖之中,影响身心健康。

表 18: 手机功能增多对个人使用手机的影响在手机依赖程度的方差分析

类别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手机依赖 * 手机功能的增多会影响您使用手机	组间	(组合)	4.006	2	2.003	24.202	.000***
	组内		24.581	297	.083		
	总计		28.587	299			

注:* 表示 0.0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0.0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0.001 的显著性水平。

四、讨论

HH大学J校区的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性别方面，男生和女生的手机使用在总体上差异并不显著，但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在失控性维度上产生手机依赖，说明男生较之女生更易在手机上花费大量时间而不能自控；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手机使用在总体和四个维度上差异并不显著；在专业方面，文科生和理工科生之间在手机使用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年级方面，各个年级和不同学历的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差别不大，但对于本科生而言，三年级和四年级的高年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低年级学生，原因如下：HH大学的课程安排是在大一大二时的课程较多，学业压力较重，空闲时间较少，低年级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情。而三四年级的学生课程所剩不多或已基本结束，拥有时间较多，同时也即将走向社会，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和考研压力，他们一是需要通过手机来宣泄心中的压抑，释放走入社会前的最后疯狂；二是通过手机这种通讯工具与外界联系，寻找自己的出路，所以他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高^[1]。

调查发现，在个人因素方面，独处时经常感觉到无聊的大学生比偶尔或者从未感觉到无聊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这正是因为经常感觉到无聊的大学生需要借助手机来作为消遣，打发时间，因而更容易过度的使用手机。在朋辈因素方面，对于聚会时旁人玩手机的反映，选择“跟着玩”的大学生由于具有这种从众心理，不能恰当的使用手机，因而较之选择“阻止他”或“无所谓”的学生更易产生手机依赖；另外，具有更多亲密朋友的大学生因为人际交往面广，能够获得更多来自朋友的支持，参与的社会活动也比较丰富，因而较之朋友少的大学生更不易依赖于手机。在家庭因素方面，与家人关系越冷淡的大学生，对手机依赖表现的越显著，与家人关系亲密的大学生则情况相反。这是因为与家人关系亲密的大学生处于温暖的家庭环境之中，遇到困扰能够向家人倾诉，及时解决问题，而与家人关系冷淡的大学生则可能会更多选择到手机网络营造出的虚拟世界中寻求烦恼的排遣和网友的理解。在社会因素方面，受手机功能增多对个人使用手机影响越大的学生越容易产生手机依赖。如果大学生的手机功能相对简单，则他们不会长时间的过度使用手机，而手机功能比较丰富的学生则会容易被多样化的功能所吸引，以致于容易产生手机依赖。

综上，HH大学J校区学生整体对手机的依赖程度略低，手机依赖的学生仅占样本数

[1] 刘朝锋，2012，《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调查研究》，《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第9期，p116-119。

的10.7%。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学生已经出现了手机强依赖的现象，手机逐渐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手机的使用问题，从社会、学校及个人三方面出发，积极引导和监督，通过各种方式促使大学生正确使用手机，并且帮助已经出现手机依赖症状的学生减轻对手机的依赖程度，避免其上升为手机使用成瘾问题。

参考文献：

- 黄才炎、严标宾，2006，《大学生手机短信交往行为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3期。
- 黄玉莉，2009，《大学生手机短信使用情况及影响的调查分析》，《中国教育信息化》第11期。
- 刘朝锋，2012，《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调查研究》，《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第9期，p116-119。
- 刘传俊等，2008，《江苏省513名大学生短信交往行为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5期，p357。
- 蒙雨，《缓解你的“手机依赖症”》，（<http://dlib.cnki.net/kns50/scdbsearch/cdbindex.aspx>）。
- 王芳，2008，《山西大学本科生手机依赖研究》，《中国健康教育》第5期，p380—385。
- 朱其志、宫佳等，2009，《江苏省513名大学生短信交往行为与焦虑状况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第3期。

☆ 作者简介：胥鉴霖，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彭翔



移民社会学

可行性：非自愿水库移民社会整合 的社会工作介入*

刘永飞 许佳君

摘要：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引发了大量的水库非自愿移民，由于大量的土地、房屋等实物被淹占，只能进行搬迁安置。然而，在搬迁安置过程中许多移民会面临着社会关系网络解体、文化难以接纳、心理上难以适应、社区参与性低等社会层面上的问题，陷入进一种“弱势”境遇之中，这也直接导致了移民的整合尤其是社会整合陷入了种种困境。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专业，可以帮助搬迁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社区，预防、解决问题，恢复、改善和发展功能，最终促进他们正常的适应社会生活。它的工作主体、工作对象、功能、价值体系、理论、服务方式在非自愿水库移民社会整合之“场域”中具有介入的适宜性。

关键词：水库移民 社会整合 社会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未来水能资源开发潜力最大的国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 24%，世界上有待开发的水能资源有近 20% 分布在中国^[1]。1949 年以来，我国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了更加有效的进行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创造，改善人类生产环境，提高人类生活福祉，我国加强了对水利资源的利用，进行大量的水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科研创新计划“水库移民创业致富的实践逻辑研究”（CXZZ11-041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太湖环湖地区环境治理长效补偿机制”（09EYB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永飞（1986—），男，江苏连云港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移民社会学、社会评价、城乡社会学。许佳君（1966—），男，江苏淮安人，河海大学移民研究中心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移民理论与实践、投资项目评价与社会发展。

[1] Gary W, Frey Deborah M, Linke. 2002 ,Hydropower as a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source Meeting Global Energy Challenges in a Reasonable Way. Energy Policy.

利工程项目建设,已修建各类水库 8.7 万余座。伴随着水库的建设,大量的土地被淹占,直至导致了大量的非自愿移民的产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了 7000 万以上的非自愿移民,其中,因水库建设而直接迁移的原迁移民人口在 2008 年底已达 1930 万,全国至今还有 2400 万大中型水库移民仍在接受每人每年 600 元的后期扶持金^[1]。这些移民因为土地被淹占要进行搬迁安置,移民安置也就成为水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安置妥善与否也就关系到了工程开展的顺利与否以及社会和谐稳定与否。

库区因为淹没了大量土地,造成土地容量紧张,后靠安置困难较大,所以大多采用外迁安置,这种非自愿移民的搬迁安置不只是简单的人口搬迁,而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系统剧烈变迁的过程,它不仅影响了移民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也影响了安置区现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引发移民和安置区居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移民原来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这种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现象,无法促进社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发展,严重影响了移民安置工作的顺利完成,不利于移民社会生活的适应,不利于安置区的稳定与发展,与“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发展原则是不一致的,更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相违背,因此,非自愿移民的社会整合成为移民社会重构和发展的核心议题。然而,关于社会工作(Social Work)这样一门助人的新兴且与社会学有诸多关联性的学科在移民社会整合中却毫无踪迹。作为一门帮助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社区,预防、解决问题,恢复、改善和发展功能,以促进他们适应和进行正常社会生活的服务专业,它在非自愿水库移民社会整合中有功能发挥的“场域”吗?下文笔者将会做些探索性研究。

二、社会整合及水库移民社会整合

法国的涂尔干(E. Durkheim)在进行“社会事实”的论述中,提到了“整合(integrate 或 integration)”问题。涂尔干为了表现其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而将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称作“社会团结”,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既可以建立在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因为生活需求、功能依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上^[2]。由此可见,社会整体的基础就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共同道德规范,是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

[1] 黄谡、汤耀国,2010,《后移民时期任重道远》,《瞭望》第 38 期。

[2] 刘少杰,2006,《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8 页。

良心”的“同一社会一般公民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总体”^[1]。从涂尔干的社会整合观念，我们可以看出，进行移民的社会整合需要更好的协调和处理好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连结关系，而这种连结关系需要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形成一种称之为“集体意识”的特质，在社会整合的层面，这种集体意识就是社会关系网络意识、共同的社会文化意识。

后来，秉承着社会整合理论研究之衣钵的当属美国的帕森斯（T. Parsons），他认为，任何系统要得以生存，需要具备的功能之一就是“整合（integration）”，即协调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使它们达到某种程度的团结而开展有效的合作，避免陷入分裂性的冲突，整合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适当的情感因素参与，需要法律、规范、宗教制度的某些部分。他同时认为，在由行为有机体、人格、社会和文化系统组成的行动系统中起整合作用的是社会，它一方面通过社会化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促进个人或组织对社会价值观的内化，实现社会对行为有机体的整合，再通过制度化、人际约束、仪式活动和安全阀结构确认行动者的角色和社会地位，并以此来消除紧张和越轨行为，达到人格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和谐；另一方面，它又进行文化系统的整合，通过文化要素的互动和文化模式化的推广来建立一定的均衡机制来控制行为者的致思取向，从而达到行动系统的整合秩序^[2]。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的思想告诉我们，要有效进行水库移民的社会整合，就要努力促进移民工作系统中相关的移民、安置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组成部分的协调、团结、合作，避免陷入分裂性的冲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努力发挥情感、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的作用。

通过对社会整合思想理论的梳理，我们也渐渐明晰了移民社会整合的内涵与目标。水库移民社会整合就是指：因水库建设需要搬迁的这些居民在得到妥善的搬迁、安置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机制调整、关系重建、文化接纳、社会支持等方法促进移民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结构的协调、功能的发挥，消除移民冲突状态，使得水库移民不同群体之间、水库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水库移民与安置地生活环境之间彼此相互适应，帮助移民迅速、有效的融入到安置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在本研究中，水库移民社会整合并不是一个广义上的包括了经济、政治、自然环境、文化等诸多层面融合而成的宏观概念，仅仅包括了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移民生活文化、弱势移民支持、移民社区参与等社会文

[1]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第219页。

[2] 张翼，2004，《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社会学者的“整合”观》，《兰州商学院学报》第1期。

化这一层面的概念。其整合的主体是移民和迁入区居民^[1]，主要达到以下目的：消除移民冲突状态，使得水库移民的不同群体之间、水库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水库移民与安置地生活环境之间彼此相互适应，帮助移民迅速、有效的融入到安置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促进移民发展，最终实现安置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三、社会工作介入水库移民社会整合的可行性

社会工作是一门助人的新兴学科，自 20 世纪初诞生于西方早期的社会工作实践基础上，适应农业社会向工业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社会工作的主体——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与方法，帮助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社区，克服、解决问题并预防问题的发生，恢复、改善和发展其功能，以适应和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服务活动^[2]。单从社会工作这一概念蕴含的文本逻辑中就可以发现其与社会整合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因为非自愿的水库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也会产生许多症结，移民专家迈克尔·塞尼（Michael M. Cernea）就指出，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会面临着失去土地、失去职业、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的权益、社会组织机构的解体这八大问题^[3]。当然，这些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链条连锁效应的结构实体，对移民产生一系列的次生问题，例如，孤独、争斗、贫困等，也正是产生这些困难与问题，使移民在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上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一度成为弱势群体，由此，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移民的社会整合，通过整合的功能来实现移民所面临的结构困境，这与社会工作的概念所表达的意旨是一致的。那么，社会工作在介入移民社会整合过程中具有哪些可行条件呢？

（一）社会工作具有专业的水库移民社会整合的实施主体——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具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可以成为移民社会整合的主要实施主体，他们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与专业技能，要符合国际社会工作界认可的条件：“持有社会工作职业证照；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受社会工作道德与职业守则的制约；从属于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或协会，以社会工作为职业”^[4]。

1978 年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也得到了较程度的发展，在 1994 年就成立了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数百所学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了大批的

[1] 方泉尧、徐和森、施国庆，2004，《工程移民整合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4 页。

[2] 李迎生，2004，《社会工作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迈克尔·M·塞尼，1998，《移民·重建·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二）》，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编译，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4] 王思斌，2004，《社会工作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150 页。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任职上也开始了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的考试，2004年6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发《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试行）》，标志着我国的社会工作开始专业化的发展，开始在国家层面与全国范围进行推广，2006年7月国家又发布了《助理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同时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这些机构的设置以及政策的实施为社会培育了大量合格的社会工作者，这些社会工作者在助人活动中充当着服务者（向服务对象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支持者（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给服务对象以支持、关心）、倡导者（如果一定行动对服务对象有效就会积极倡导）、协调者（通过协调各种社会资源帮助受助者问题的解决）、影响者（可以影响政策制定者，促进社会政策的修正和调整）。

这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使社会工作在移民服务的介入上也更加专业，更能有效的发现移民存在的深层问题，通过专业的方法帮助移民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更好的促进移民的社会整合。例如：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帮助处于弱势中的移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可以为那些存在故土难离情结的移民提供心理上的疏导，可以为那些搬迁后遭受“文化震惊”效应影响的移民进行干预，可以为那些在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不同的移民与安置地居民提供沟通的媒介，可以为那些已经找到某种可以摆脱困境的移民给予引导，使其取得实际进展。同时，这些工作者都有自己从属的专业组织，当个人力量无法帮助移民解决问题时，会从自己从属的专业组织中寻求帮助，为移民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更有效促进移民问题的解决，使移民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

（二）许多水库移民是社会工作的实践工作对象——弱势移民群体

我国水库移民大多生活在较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山区或农村，生活比较贫困，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许多居民在搬迁前就处于“弱势”。然而因水库建设需要搬迁安置，“弱势”的状况会更加明显和严重，会面临着经济上、生理上、社会文化上的进一步弱势。

在经济上，在水库工程开工以前就要忙于搬迁的诸多事宜，许多移民都要停止那些维持生计的工作，无论是做生意、外出务工的还是养殖、种植的，丧失了生活的来源；那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本地的自然资源为生活来源的移民，搬迁将使移民失去这些生活来源，再加上许多水库移民本来就是特困户、贫困户、三无（无依无靠、

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人员，搬迁使他们更加困难。在生理上，许多移民是一些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生理性弱势群体，移民搬迁更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在社会文化上面临着社会关系网络解体、文化冲突、心理上难以适应、社区参与性低等问题，使他们处于一种社会层面上的“弱势”。再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上还存在着“重工程、轻移民”的遗留性思维，不去执行国家的“开发性移民”的方针，使许多移民处于边缘、困苦的地境之中，面临着失去土地、失去职业、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的权益、社会组织机构解体等风险。这些“弱势移民群体”在搬迁安置后往往很难适应安置地的生活，融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的社会整合。

社会工作的介入对象也是弱势群体，是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他们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从移民社会工作介入实践对象这一视角来看，水库移民的社会整合不能忽视这些弱势移民群体。

（三）社会工作的功能与水库移民社会整合目标不谋而合

社会工作具有复原、供配资源、预防、发展、稳定社会的功能，这些功能作用于处在困境中的水库移民，使他们在功能的作用效力下改善困境、摆脱困难。社会作为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完善必将促进社会结构的完善，这些功能的发挥也会防止社会结构解组现象的发生。进行水库移民社会整合是为了恢复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受到损害的移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使安置区与库区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恢复正常，这与社会工作中的恢复受到损害的社会机构的功能，对已经产生的问题进行事后救助，以使处于困境中个体、社会的结构恢复正常的复原功能具有同一性。社会工作提供的、配置资源功能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积极协调社会现有的各种资源，为困境中的主体争取到资源，使他们通过资源的利用改变生存状况，进行水库移民的社会整合也需要为移民提供和争取大量社会资源，通过资源的利用改变移民的生存状况。

进行水库移民社会整合也具有预防移民安置区和库区出现一系列不和谐状态，通过未雨绸缪的方式帮助水库移民更好的搬迁安置，达到安置区社会整合的目的，这与社会工作中的通过预警和应变的策略来预防社会问题发生的预防功能具有同一性。社会工作促进发展与稳定的功能主要是指努力开发受助者的潜能，将外来援助转化为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努力主张通过疏导而不是高压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与解决问题，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弱势个体的发展，这一功能作用与进行移民社会整合的最终目标是一

致的，通过促进移民搬迁与安置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争端的解决，逐步达到移民库区与安置区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目标，这与移民的“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四）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也蕴含了水库移民社会整合的原因逻辑

价值常常会被内化在一定“主体场域”中，当主体是社会个体、群体时就是个体价值观、群体价值观，当主体处于某一专业领域时就形成了专业价值观，例如，社会工作价值观。我国社会工作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中外社会福利思想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在个人方面，认为人应该享有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如生存发展权、受教育权、从事职业发展等权利，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社会的关怀与保护，当受到伤害时社会应当给予支持与扶助，当人在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后，应该受到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在社会方面，强调社会的和谐，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应当建立在与人们共同发展的平等尊重、相互支持以及密切的社会关系中，同时社会工作也要体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1]。

在水库建设中，移民是水利工程实施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支持国家因电力、防洪、灌溉、交通、生产等需求而进行建设事业的发展，甘愿搬迁，离土又离乡，为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移民在搬迁过程中要承受搬迁过程中的繁忙事务，陷入失去土地、失去职业、失去生活来源等风险。他们不仅面临着疾病、贫困、伤残、年老等生理性困难，也面临着文化震惊、生活环境不适应、社会关系网络解体等社会性困难。正是由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才要进行水库移民的社会整合，通过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效应促进移民这些困境的摆脱，这些困境的摆脱也正是社会工作价值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水库移民社会整合可以通过有效的社会工作介入，帮助移民争取到社会的关注与保护，争取到移民自身所必需的发展资源，争取到自己丧失的基本生活保障权利，最终保障移民解决面临的生理性、社会性困境，为移民的社会整合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五）社会工作理论对移民社会整合工作具有指导性

社会工作虽是一门偏重实务性的专业，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自己的指导理论，在指导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水库移民与社会工作相似，也比较注重实务，许多移民专家大多注重实践性操作，系统性的理论知识还比较薄弱，理论指导

[1] 许爱花、甘诺、许芸，2010，《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 50-59 页。

实践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在许多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移民工作容易出现问題，移民社会整合的目标也难以有效实现，这也就迫切需要移民学上的理论建构，一个较简便、快捷、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社会工作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系统总结的危机介入、系统、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对我国水库移民的社会整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例：

它把个体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往看作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结构网络，个体在这个网络中可以获得各种资源（如情感、物质、金钱、机会、权力、声望等）上的支持，以此来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这一理论认为，在进行社会工作介入中要努力利用好以下几种关系网络：^[1] “个人网络，强调受助者的现存人际关系或他处身的环境内有发展潜力的关系，如家人、朋友、邻居，社会工作者要努力帮助受助者建立或强化与这些人员的关系；自助群体，主要是一群有意识地界定目标和加入资格的人所组成的网络，常发展自拥有共同兴趣的朋友自然形成的网络，他们可以当面接触，具有较强的独立能力，有共同确认的问题与关注点，例如面对着共同困难的难友；组织网络联系，主要是指提供资源支持的那些个体或社会组织，例如中华慈善总会、福利基金会、老年人社会福利院等组织机构；社区网络，主要是指受助者所在的社区、比社区范围大一些的道路、镇等网络，包括了社区里的行政组织、群众组织等资源”。

这一理论蕴涵了在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水库移民社会整合中要努力利用好移民的个人网络、自助群体、组织网络、社区网络等关系网络。当移民处于困难或风险中时，我们就可以考虑从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入手，通过关系网络的资源帮助移民解决面临的损害水库移民社会整合的问题。在移民的个人网络中，社会工作者要积极发挥自己联络者的角色帮助困境中的移民建立与家人、亲戚、同事、朋友、邻居的联系，积极动用这些群体的资源，帮助移民摆脱困境；在移民的自助群体中，要积极帮助移民与移民之间建立联系，开展移民的互帮互助活动，也可以建立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联系，使老移民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帮助受困境的新移民；在移民的组织网络中，帮助移民建立与中华慈善总会、福利基金会、老年人社会福利院等非营利组织机构的联系，帮助移民摆脱困境，为移民的社会整合奠定基础；在社区网络中，积极帮助移民与安置区居民建立联系，形成移民与安置地居民合作的关系，同时，积极鼓励移民参与到社区的发展活动中，为移民早日融入社区生活创造机会。做好移民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络者角色，加强移民与政

[1] 范明林，2007，《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第 31-42 页。

府基层机构的联系。这与移民的社会整合理论宣称进行移民的社会整合需要更好的协调和处理好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连结关系，在移民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移民个体系统，还要关注移民外部的环境因素，把移民的不同群体之间、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移民与安置地生活环境之间结合起来进行干预的思想找到了相容的契合点，具有目的意义上的“同一性”。

（六）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对移民社会整合工作具有实用性

由点到面，社会工作理论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理论只是给社会工作介入水库移民社会整合奠定一个合法性的理论逻辑，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可以为水库移民社会整合奠定一个合法性的实践逻辑。

社会工作在实践工作中运用的服务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两大类。直接方法主要是提供实际的工作服务来帮助受助者解决问题，主要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方法。个案工作在移民社会整合中主要是帮助在社会层面中陷入困境的个人或家庭，通过一对一的服务，帮助移民摆脱困境，解决问题，实现移民与安置地社会、环境相适应。小组工作在移民社会整合中主要是以组建移民小组或移民与安置区居民小组方式，通过工作者的协助以及小组成员间的互帮互助来解决移民在社会整合中遇到的问题，最终实现移民与移民，移民与安置地原居民的相互接纳。社区工作在移民社会整合上主要是移民工作者通过运用自己专业技能、资源、价值理念，与社区（全是移民的村庄或通过插花式安置移民的村庄）居民一起行动，共同预防和解决社区问题，培养移民对安置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增强安置社区的凝聚力，最终促进安置社区的整合。

间接方法主要是对受助者实施帮助前所进行的工作活动，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督导、社会工作咨询等内容，这些间接方法主要是与宏观社会的政策、方针联系在一起的，在服务对象上不直接面对工作对象。它也关注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发展，在具体的实用性上不如直接社会工作方法，例如，社会工作行政，它主要是指依照行政程序，为了促进政府或机构特定福利目标的实现，通过资源的协调与运用，将社会福利政策转变为具体、实际的社会服务，在移民社会整合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有效的影响政府有关移民搬迁安置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同时通过有效的方法促进这些社会政策、社会目标变成具体的社会行动。由此可见，这些工作方式的具体运用对水库移民的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也为社会工作介入到水库移民社会整合“场域”做好了方法上的准备。

四、总结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水库移民社会整合主要通过运用机制调整、关系重建、文化接纳、社会支持等方法促进移民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功能的发挥,消除移民冲突状态,使得水库移民的不同群体之间、水库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水库移民与安置地生活环境之间彼此相互适应,帮助移民迅速、有效的融入到安置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促进移民发展,最终实现安置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而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新兴的助人专业,它在工作主体、工作对象、功能、价值体系、理论、服务方式上与水库移民的社会整合工作都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对于移民的社会整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鲜明表征了社会工作介入移民社会整合具有合法性逻辑。本着这一思维,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集中于“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水库移民社会整合具体领域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 范明林, 2007,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 31-42 页。
- 方泉尧、徐和森、施国庆, 2004, 《工程移民整合通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 24 页。
- 黄骞、汤耀国, 2010, 《后移民时期任重道远》, 《瞭望》第 38 期。
- 李迎生, 2004, 《社会工作概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少杰, 2006, 《国外社会学理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8 页。
- 迈克尔·M·塞尼, 1998, 《移民·重建·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二)》,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 涂尔干, 2000, 《社会分工论》, 渠东译, 北京: 三联书店, 第 219 页。
- 王思斌, 2004, 《社会工作导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150 页。
- 许爱花、甘诺、许芸, 2010,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第 50-59 页。
- 张翼, 2004, 《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社会学者的“整合”观》, 《兰州商学院学报》第 1 期。
- Gary W, Frey Deborah M, Linke. 2002, *Hydropower as a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source Meeting Global Energy Challenges in a Reasonable Way*. Energy Policy.

该文章已发表于《西南农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 年第 4 期。

☆ 作者简介: 刘永飞,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许佳君, 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 朱娟娟



求 索

现役军人婚姻质量的调查研究

冯 燕

摘 要：本研究采用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设计问卷，对现役军人进行问卷调查，并以半参与观察法为辅助，旨在了解现役军人的婚姻质量状况。本研究随机抽取了北京、三门峡、乌鲁木齐三个地区的军人，共获得 126 份问卷，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现役军人的婚姻质量大致处于中等水平；平等、信任与和谐是夫妻关系的主流；婚姻生活情趣不足；在生活实践中，“驻地安家”成为趋势；夫妻处于“半分居”状态。

关键词：军人 婚姻质量 军人家庭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综述

军婚是夫妻双方或一方是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的简称，它是连接军人与家庭、部队与社会的感情纽带。虽然本质上是两性结合的形式和制度，但因为部队性质、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使得军婚既独特又神秘。现役军人婚姻质量的高低对军队内部秩序的稳定、军队战斗力的凝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军人的婚姻质量问题不仅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军旅作家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对军婚进行倾情描述，法律工作者根据军队法规以自身的业务对军婚进行深入探讨，其他文学爱好者则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题材对军婚进行大肆渲染，医务工作者从医学角度入手，分析军人身体健康与婚姻质量的关系^{[1][2]}。由于高墙的阻隔和军队保密制度的约束使得社会学对军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极少涉足。1986 年，北京大学国防学会组织编译了查尔斯·H·科茨和罗兰·J·佩里格林合著的《军事社会学》，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军事社会学的译著。该著作使国内人士了解国外军事社会学的现状，结合中国国情，开创中国特色的军事社会学。随后，杨亚平和祁永

[1] 娄振山、伏广清、程军莉，1998，《飞行员质量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第 1 期。

[2] 娄振山、张荣健、伏广清、程军莉，1998，《飞行员家庭婚姻质量相关性研究》，《中国疗养医学》第 5 期

信主编的《军事社会学概论》、张明庆主编的《军事社会学》相继出版。这些专著虽然讲解了军人的恋爱婚姻家庭状况,但是没有涉及军人婚姻质量这方面的内容,本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军人婚姻质量恰好做一补充。

中国学术界关于婚姻质量的定义基本上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婚姻质量视为一个总括性的指标;另一种则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混合性的概念。总括性定义强调夫妻对整个婚姻关系的个人感觉和主观评价,只强调主观方面。混合定义既强调夫妻关系的事实特征和客观状态,也强调当事人对婚姻关系及其配偶的主观评价和感受,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同时也增加了对婚姻质量进行度量的技术难度^[1]。

为了弥补以上两个指标的缺陷,本研究采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安琪和叶文振所下的定义,把婚姻质量的定义表述为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它以当事人的主观评价为主要尺度,并以夫妻调适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这类定义不但指出了婚姻质量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是一个多元的抽象主体,而且指出了理解婚姻质量概念的主客观双重尺度,即主观感知和客观描述,对研究军人婚姻质量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方法和基本情况

(一) 测量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安琪和叶文振设计的“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它由主客观两大指标体系组成,其中主观指标体系包括 20 项关于对配偶、婚姻关系和物质生活的评价指标,客观指标体系包括 15 项对性生活质量、婚姻互动和夫妻内聚力进行直接描述的项目等共计 6 大类,每大类下面各设若干具体指标。如图 1

本研究的对象是现役军人,指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役、具有军籍的人员,不包括复原军人、转业军人、退役军人和在军事单位中不具有军籍的职工。

本研究从北京、乌鲁木齐、三门峡三个地区的部队随机抽取了 126 名已婚现役军人,并对其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三门峡 35 份(27.8%),乌鲁木齐 28 份(22.2%),北京 63 份(50.0%)。所获样本全部为男性,年龄在 18--25 岁 5 人(4.0%),26--35 岁 101 人(80.8%),36--45 岁 17 人(13.6%),46-55 岁 2 人(1.6%);已婚者中军官 63 人(50.0%),士官 62 人(49.2%);民族分布:汉族 119 人(94.4%),少数民族只有 3 人(2.4%);来自城市的有 35 人(27.8%),来自农村的有 84 人(66.7%)。

[1] 徐安琪、叶文振,1999,《中国婚姻质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100-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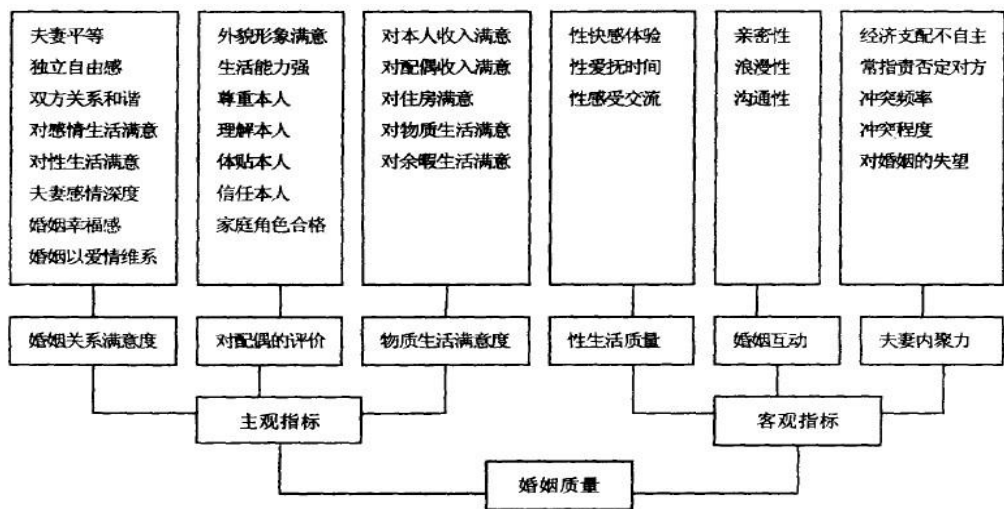


图 1：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的理论构想

（二）主要指标的操作化测量

1. 样本基本情况

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中，一级士官^[1]2 人，二级士官 17 人，三级士官 34 人，四级士官 9 人；军官服役 0--2 年的有 1 人，3--5 年的有 1 人，6--8 年的有 10 人，9--12 年的有 17 人，13--16 年的有 11 人，17--21 年的有 13 人，22 年及以上的有 9 人。

文化程度是初中的有 11 人（8.7%），高中、中专的有 26 人（20.6%），大专文凭的有 32 人（25.4%），大学本科的有 54 人（42.9%），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有 2 人（1.6%），可以看出大部分军人的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中专和大学本科，文化水平较高。经了解，军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有少数军官是大专或硕士文凭。虽然士官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很多人在入伍后不断学习进取，通过社会上的自学考试同样获得了大专或本科文凭。

工资待遇方面，有效回答有 125 份。工资在 4001—7000 元的人最多，有 44 人（34.9%），但是士官在这个工资阶段只有 2 人。3501—4000 元这个阶段，军官和士官持平。而在 2501—3500 元这个阶段，士官的人数明显多于军官，人数之比为 41：5。士官的工资待遇大部分在 2500—4000 元之间，而军官的工资待遇大部分在 3501—7000 元之间，可见军官的工资待遇要比士官高的多。虽然近几年，军人工资呈稳步增长趋势，但由于不少军人家庭两地分居，加上彼此探亲开支较多，因此，军人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如果家庭有

[1] 在服役时间上，3--5 年的士官为一级士官，6--8 年士官为二级士官，9--12 年的士官为三级士官，13--16 年的士官为四级士官，17--21 年的士官为五级士官，22 年以上的士官为六级士官。

了孩子，妻子只持家，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就只有丈夫的工资。

2. 婚姻状况

已婚者中初婚的有120人（95.2%），离异后再婚的有2人（1.6%）。婚龄在0—5年的有84人（66.7%），6—10年的有27人（21.4%），11—15年的有8人（6.3%），16年以上的有7人（8.7%）。大部分已婚军人的结婚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还没有生育子女的有52人（41.3%），生育一个孩子的有57人（53.2%），生育2个孩子的有1人（0.8%）。在居住方式上，家属随军的只有26人（20.6%），两地分居的情况居多，有68人（54.0%），在驻地周围居住的有30人（23.8%）。

3. 和配偶认识的途径

部队是个封闭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小社会，军人缔结恋情的途径不外乎媒介搭桥、邂逅倾情和同学变为妻子^[1]。媒介中的熟人，例如父母、亲戚、首长、同学、战友乃至军嫂等的介绍牵线，成了军人喜结伉俪的主渠道。较多的军人和配偶是通过父母或家人介绍认识的，有48人（38.1%）之多，其次是通过战友或朋友介绍认识的，有22人（17.5%），再次就是原来的同学成为现在的配偶，有17人（13.5%）。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家庭发展理论认为，一对夫妇拥有幸福婚姻必须完成的发展性任务包括与对方进行情感上的分离，建立一种“我们”感，进行有想象力和愉悦感的性生活，并在表达差异时仍保持情感关系的安全^[2]。以下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军人夫妻间“我们”感建立的如何。

（一）婚姻质量现状分析

按照对婚姻质量多维组合表的测定结果，本研究从婚姻质量主客观评价的6个侧面，把调查所获得的有关指标的频率分布分别列表，以期对军人婚姻关系的基本现状作一具体描述。

1. 夫妻关系满意度

从被访者对配偶和婚姻关系的自我评价看，不满意（得分在1—3分之间）的比重较高，一般（4分）的比重较低，满意（5—7分之间）的比重很高，平均得分在5—7分之间（1分为“非常不满意”，7分为“非常满意”）。尤其以双方“平等”的满意度最

[1] 张明庆，2002，《军事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454—478。

[2] 大卫·诺克斯、卡洛琳·沙赫特，2009，《情爱关系中的选择——婚姻家庭社会学入门（第9版）》，金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02。

表 1：夫妻关系满意度自我评价的分布

夫妻关系满意度	得分（%）			合计	平均值 （分）	标准差 （分）
	1—3 分	4 分	5—7 分			
1、夫妻平等	5.4	3.6	91.0	100	6.14	1.30
2、独立自由	12.6	10.8	76.5	100	5.46	1.66
3、双方关系和谐	7.2	6.3	86.5	100	6.04	1.30
4、婚姻幸福感	9.0	8.1	82.8	100	5.80	1.45
5、感情生活满意	10.0	9.1	80.9	100	5.72	1.55
6、配偶尊重本人	7.3	5.5	77.4	100	6.06	1.32
7、配偶体贴本人	9.1	5.5	85.4	100	5.88	1.49
8、配偶信任本人	5.5	6.4	88.1	100	6.10	1.22
9、配偶理解本人	9.1	7.3	83.7	100	5.88	1.40

高，平均得分高达 6.14 分，其次为配偶的“信任”，满意度均值达 6.10 分，而对“独立自由”的评价最低，平均打分为 5.46 分。该分量表的夫妻关系满意度总平均得分在 5.90 分，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对夫妻关系的总体评价在“比较满意”和“很满意”之间。

2. 物质生活满意度

表 2：物质生活满意度自我评价的分布

夫妻关系满意度	得分（%）			合计	平均值 （分）	标准差 （分）
	1—3 分	4 分	5—7 分			
1、对配偶生活能力满意	4.5	6.4	88.9	100	5.90	1.15
2、对物质生活满意	11.8	28.2	71.9	100	5.29	1.46
3、对住房满意	40.9	10.0	49.1	100	4.04	2.24
4、对配偶收入满意	29.4	14.7	56.0	100	4.53	1.95
5、对余暇生活满意	35.5	12.7	51.8	100	4.24	2.12
6、对本人收入满意	28.2	15.5	56.4	100	4.55	1.88

尽管改革开放给家庭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但被访者对物质生

活的评价却相对比较低，尤其对住房的评价最低，平均得分为 4.04 分，其次对余暇生活的满意度，平均打分为 4.24 分，而对配偶生活能力的评价最高，满意度均值高达 5.90 分。“物质生活”总体满意度得分为 4.76 分，仅停留在“一般”的程度上。

3. 性生活质量

表 3：性生活质量

	频 率 (%)				
	1、无	2、偶尔	3、有时	4、经常	5、合计
1、性感受交流	5.6	29.9	38.3	26.2	100
2、性抚爱时间 ^[1]	4.7	19.6	45.8	29.9	100
3、性快感体验	3.8	19.8	44.3	32.1	100
4、平时的亲密行为	14.3	19.0	38.1	28.6	100

表 3 说明，尽管调查对象对夫妻性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打分为 5.70 分，满意度低于感情生活（5.90 分），而高于物质生活（4.76 分），但伉俪间性互动和性愉悦的缺陷也客观存在，如夫妇平时很少或没有性感受交流的有 35.5%；经常交流的只有 26.2%；平时没有或很少有亲昵行为的达 33.3%。性抚爱时间在 6 分钟以上的有 75.7%，在性生活中有时或经常享受到性快感的有 76.4%。总体上，被调查的军人对夫妻间的性生活的满意度还是较高的。性欲望有助于对伴侣保持更强烈的需要，加强“我们”感的稳定性，相互忠诚，不被其他人所吸引。

4. 夫妻内聚力

中国人的婚姻关系以高稳定著称，本次的研究资料也印证了这一事实的存在。已婚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指责或否定对方的只有 2.8%，被访对象对婚姻常有失望感的也仅为 2.8%，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并动武或威胁离婚的夫妻比重也非常低。总体上被访对象的婚姻具有较强的内心力和稳定性。

[1] “性抚爱时间”的分类为：1、无，2、1--5 分钟，3、6--10 分钟，4、10 分钟以上； $p < 0.05$ 。

表 4：夫妻内聚力

	频 率 (%)				
	经常	有时	偶尔	无	合计
1、一方常指责否定对方	2.8	10.2	47.2	39.8	100
2、经济支配不自主	4.6	9.3	30.6	55.6	100
3、经常对婚姻失望	2.8	8.3	34.3	54.6	100
4、冲突频率	7.4	13.0	50.0	29.6	100
5、冲突时至少一方动手	0.9	2.8	13.0	83.3	100
6、冲突时至少一方威胁离婚	0.9	2.8	15.7	80.6	100

5. 婚姻生活情趣

表 5：婚姻生活情趣

	频 率 (%)					年龄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Gamma 值)
	1、无	2、偶尔	3、有时	4、经常	合计	
1、配偶经常表达日常敬语	13.3	20.4	44.2	22.1	100	0.876
2、配偶经常使用赞赏和传情的用语	10.7	21.4	39.3	28.6	100	0.463
3、婚姻生活浪漫性 ^[1]	5.4	12.5	52.7	29.5	100	0.894

研究结果所显示的有关婚姻生活情趣方面的指标相对较低，如认为婚姻生活很浪漫或较浪漫的仅占 29.5%；虽然军嫂们向自己的丈夫经常表达“你辛苦了”、“谢谢”、“请原谅”等日常用语和“亲爱的”、“我爱你”等浪漫情话的只有 22.1%和 28.6%，但是时不时的表达日常敬语和赞赏用语的比重较高，分别为 44.2%和 39.3%。

以年龄为自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显示，26—35 岁的被访者的配偶有时或经常向自己表达日常敬语的占 49.6%，而 36 岁以上者只占 8.0%。有 23.2%的 26—35 岁的已婚军人觉得婚姻生活很浪漫或较浪漫，36 岁以上者仅占 2.4%，8.8%的 36 岁以上的已婚军人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的浪漫性一般。

6. 夫妻调适结果

[1] “婚姻生活浪漫性”的分类为：1、很不浪漫，2、不大浪漫，3、一般，4、较浪漫和很浪漫；
p<0.05

表 6：夫妻调适结果

夫妻感情深度	评价 (%)	淡漠或破裂 3.6	一般 17.1	较深 36.0	很深 43.3	合计 100	居住方式差异的 (Phi 值) 0.001* ^[1]
配偶角色合格	评价 (%)	很不合格 3.5	不大合格 2.7	一般 14.2	基本合格 40.7	很合格 38.9	合计 100 0.033*
婚姻以爱情维系	评价 (%)	否 65.9	是 34.1	合计 100			0.048*

从夫妻角色互动的结果看，被访对象认为夫妻感情“淡漠”或“破裂”的不多，仅占 3.6%，而感情在“较深”以上的占到 79.3%；认为配偶家庭角色“很合格”或“基本合格”的也达 79.6%，这也和前述的当事人对夫妻关系的自我评价较高相吻合；被访者首肯婚姻主要以爱情为纽带维系的占 34.1%。

和爱人居住方式不同对夫妻调适结果产生影响，通过交互分类统计，爱人随军的被访者认为感情“破裂”或“淡漠”的占 6.5%，而两地分居的和爱人在驻地周围居住的被访者则没有觉得夫妻感情“破裂”或“淡漠”，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恰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小别胜新婚”。两地分居的军人认为夫妻关系以爱情维系的占 16.9%，其次是爱人在驻地周围居住的军人认为是爱情维系夫妻关系的占 12.1%，而家属随军的军人则仅占 5.6%。对配偶家庭角色“很合格”或“基本合格”的评价上，两地分居的已婚军人占 40.3%，妻子在驻地周围居住的军人占 18.5%，配偶随军的军人只占 13.7%，因为夫妻两地分居，需要妻子做出很大的牺牲，要赡老顾幼，所以，被访者对自己的配偶评价很高。

（二）婚姻质量总体评价

在对婚姻质量的 6 个侧面进行评价时，对每个具体变量都作了排序分等处理。对于主观满意度指标（“夫妻关系满意度”和“物质生活满意度”2 个子量表中的 15 个变量）把凡是自述“一般”和“不满意”的即打分为 1—4 的都归入低质量，认为“较满意”即打分为 5—6 的将评为中质量，首肯“非常满意”即打 7 分的才视作高质量，借以

[1] $P < 0.05^*$

修正主观评价指标易出现的由于隐匿消极面而使调查结果偏高的样本误差。而对于客观事实指标（“性生活质量”、“夫妻内聚力”、“婚姻生活情趣”和“夫妻调适结果”4个子量表中的16个变量）根据不同刻度分别进行如下排序：凡是分5个等级的变量——1—3分为低质量，4分为中质量，5分归入高质量，如“夫妻感情深度”：“破裂”、“淡漠”和“一般”均归入低质量，“较深”为中质量，“很深”为高质量；分4个等级的变量——1—2分为低质量，3分为中质量，4分为高质量，如“日常的亲密行为”、“没有”或“偶尔有”的为低质量，“有时有”的为中质量，“经常有”的为高质量。

对婚姻质量6个侧面进行排序分等的结果表明，“夫妻关系满意度”、“夫妻内聚力”为高质量，“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夫妻调适结果”为中质量，而“婚姻生活情趣”为低质量。（见表7）

表7：婚姻质量6个侧面的总体评价（单位：%）

	分 等 级			总等级
	低质量	中质量	高质量	
1、夫妻关系满意度	15.3	34.5	50.2	高质量
2、物质生活满意度	37.6	37.8	24.6	中质量
3、性生活质量	27.8	42.8	29.4	中质量
4、夫妻内聚力	3.2	39.5	57.3	高质量
5、婚姻生活情趣	45.4	35.6	19.0	低质量
6、夫妻调适结果	11.5	47.3	41.2	中质量

从各个侧面分等，夫妻相处能达到高质量的只有两项，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他们的妻子需要有奉献精神，要经常一人赡老顾幼、承担家务，尤其是两地分居的夫妻，他们之间需要更多的相互体谅和理解，因此，“夫妻关系满意度”和“夫妻内聚力”为高质量；“物质生活满意度”虽然为中质量，但从表中可以看到，中质量和低质量的比重仅相差0.2%，可见人们的物质欲望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性生活质量”侧面只有四成以上处于一般水平，低质量和高质量的百分比差不多持平；“婚姻生活情趣”被归入低质量的接近五成，可见军人的婚姻比较务实而不太浪漫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因为部队的规定，与我们日常的双休日不同，军人的休息时间是视部队任务而定的，有很大的机动性，并且他们外出需要请假，外出时间也是有规定的，所以军人的爱情很少有花前月下的浪漫。鉴于婚姻质量的2个侧面被评为高质量，3个侧面为中质量，1个侧面为低

质量，作者认为，现役军人的婚姻质量大致上处于中等水平，且具有如下特征：

1. 平等、信任与和谐是军人夫妻关系的主流。被访者对夫妻关系的总体评价在“比较满意”和“很满意”之间（总平均得分为 5.90 分），其中“夫妻平等”、“配偶信任本人”和“双方和谐”的平均得分更高些，分别为 6.14、6.10 和 6.04 分。因此平等、信任和谐可称之为军人婚姻的主旋律。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大部分军人和爱人两地分居，相互信任则更为重要。夫妻双方一旦确立了“我们”感，将认为共同承担风险，信任为他们的关系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基础。

2. 婚姻生活情趣不足。尽管被访者对双方关系的主观满意度相当高，经常吵架、动武、威胁离婚或夫妻感情已淡漠、破裂的比重甚低，表明大多数婚姻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稳定性，但客观指标仍显示出军人婚姻不可忽视的缺陷，这主要反映在婚姻生活情趣不足，忽视以赞语美言或示爱行为来培育浪漫情愫、增添夫妻内聚力。

3. “驻地安家”成为趋势。“牛郎织女”的生活已成为历史，军嫂们采取各种途径来到了爱人所在的地区。从事正式工作，干个体经营，打工抑或考学深造……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与配偶经常见面”^[1]。由于部队的工作性质和特殊任务，军人与其家属们无法做到朝夕相处。因为会给管理带来重大难题，所以部队明文禁止那些不符合随队、随军条件的官兵租住民房。但是又关系到官兵的切身利益，所以，部队执行规定时严时宽、时紧时松，官兵租住驻地附近的民房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驻地安家”成为军人婚恋与家庭中的重要趋势。

4. 夫妻处于“半分居”状态。为了摆脱婚后分居带来的烦恼，军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就地择偶，部队中出现了不少“家门口干部”。他们的家距营区很近，甚至一墙之隔，却不能朝夕相处。《军官留营住宿制度》规定营以下军官必须与战士同吃住。每当重大节日来临，部队都处于节日战备状态，保持较高的在位率。万家团圆时，军嫂们则独守空房，忍受孤寂。

四、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军人的婚姻质量进行基本评估，并结合观察所得到的资料总结了军人家庭安置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下面一些建议以改善其中的不足。

（一）婚姻文化的重建。调研结果表明军人婚姻质量在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低质量的婚姻仍占一定比例。由于社会本位和家庭本位的伦理文化更强调社会的稳定需要和

[1] 刘云慧，2006，《都市基层军官婚恋状况的人类学思考——以驻京某部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31。

家庭的整体利益，强调个人的社会职责和家庭义务，忽略甚至漠视当事人的个人感受和幸福^[1]。而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因此，社会应该把婚姻质量作为衡量生命质量和稳定婚姻关系的主要指标，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增进婚姻主体的福利和满足，不应让婚姻当事人肩负起不该由个人承载的过重的社会压力。发展社会婚姻心理咨询事业，当婚姻出现问题时，我们不能对当事人的婚恋行为进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先期判断，而应该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心理疏导，解决婚姻中出现的问题。

（二）改善物质待遇。工资待遇的提高，既有利于吸收人才入伍，也有利于军人工作积极性的调动，更有利于其社会地位提高及其婚姻家庭实际问题的解决。在家属随队、随军、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譬如，放宽随队条件；与地方协调建家属楼，可供未随军家属租住。这样既解决了军人家庭的住房困难，又便于管理^[2]。

（三）唤起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军人肩负的特殊职能和使命，决定了军人无私奉献的特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军人，因经济地位相对下滑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军人的婚姻质量受到影响。在强调军人牺牲奉献时，应加强全体公民的国防观念，调整社会舆论的导向，增强军人婚姻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 大卫·诺克斯、卡洛琳·沙赫特，2009，《情爱关系中的选择—婚姻家庭社会学入门（第9版）》，金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02。
- 刘云慧，2006，《都市基层军官婚恋状况的人类学思考—以驻京某部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31；p49。
- 娄振山、伏广清、程军莉，1998，《飞行员质量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第1期。
- 娄振山、张荣健、伏广清、程军莉，1998，《飞行员家庭婚姻质量相关性研究》，《中国疗养医学》第5期。
- 徐安琪、叶文振，1999，《中国婚姻质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00-169；p286。
- 张明庆，2002，《军事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454—478。

[1] 徐安琪，叶文振，1999，《中国婚姻质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86。

[2] 刘云慧，2006，《都市基层军官婚恋状况的人类学思考—以驻京某部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49。

☆ 作者简介：冯 燕，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彭 翔

※ ※

教育部公布 2012 年学科评估结果 我院学科发展稳中有进

1 月 29 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全国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结果。本次教育部学科评估按照“提高质量、优化结构、鼓励特色、协同创新”的思路，采用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我院有社会学、公共管理、新闻传播学和教育学四个一级学科参加了本次评估。社会学学科，全国有 13 家一级学科博士点（全国共 14 家）、4 家二级学科博士点、共计 39 所高校参加，河海大学排名第 11，并列扣减后排名为 15 位，在江苏排名第 2（位次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科，60 所高校参评，21 所博士一级授权点（全国共 35 所）、部分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高校参评，河海大学排名第 12，并列扣减后排名为 29 位，在江苏排名第 2（位次于南京农业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13 所博士一级授权点（共 14 所）、部分二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共 48 所高校参评，河海大学排名第 13，并列扣减后排名为 36，在江苏排名第 3（位次于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有 58 所高校参加了教育学专业评估，河海大学排名第 15，按并列扣减后排名为 48，在江苏排名第 7。详细榜单请见相关网站。

评估结果表明，我院学科发展水平稳中有进，是近年来凝练学科方向、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结果，在今后“以学科为引领”的学院发展中将继续坚持保有研究特色，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扩大在社会各界的学术与政策影响力，不断提高学科发展水平

（公共管理学院 供稿）

90 后大学生面子意识与消费购物决策风格关系的一项实证研究

——以河海大学、南航江宁校区为例

石蕾蕾

摘要：本研究采用面子意识量表和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量表对 251 名 90 后消费者施测，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五个面子意识因子和八个购物决策风格因子。再通过相关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发现在四十对面子意识和购物决策风格因子两两间相关关系中，有十三对显著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90 后大学生 面子意识 消费购物决策风格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超高速发展，同 1978 年相比，我国 GDP 年均增长近 10%。我国经济社会步入大众消费时代，民众购买力上升，人们在物质追求上凸显了炫耀性消费的心态。近年来，有大量的数据及社会现象表明：炫耀性消费逐渐呈现低龄化倾向，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在校大学生中也普遍存在着攀比消费、面子消费等现象。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人口约有 3 亿多，这代人已经逐渐进入消费年龄，而 90 后中的大学生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仅是社会消费群体的组成部分，而且有着独立的消费意识和特点，并会对未来社会消费文化的构成有着深远的影响。90 后大学生的消费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价值取向及生活环境，并对这一代人的消费潮流有着不可否认的引导作用。

与“80 后”相比，“90 后”彰显个性、受关注、圈子认同感、品牌喜好、身份象征、维护面子、自我享受、强化社会交往等方面都具有新特点。所以本文想做一个探索性研究：“90 后”消费决策的哪些方面更彰显他们的面子。

二、文献综述

（一）消费者的购物决策风格

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是一种心智导向，它表征着消费者做出决策的方式，具有认知

和情感特征，如品质意识和时尚意识。本质上，它类似于心理学上的个性特质概念，反映了消费者的基本消费特征。1985 年斯普罗罗斯和康达尔采用自制的购物决策风格量表在亚利桑拿大学做了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八种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即追求完美、重视品牌、新颖时尚、消遣娱乐、看重价格、冲动购物、眼花缭乱和习惯化品牌忠诚。他们的研究为标准化地测量购物决策风格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但是，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这八个特征能否概括消费者的所有购物风格，高中生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量表的效度需要多地点、多时点的研究来检验等。为此，他们号召研究者采用 CSI 在不同的人群尤其是成年人和不同背景下进行跨文化研究，以验证 CSI 的普及性。

为了使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量表得到极大地推广和应用，国际上从多个角度对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展开了广泛研究。霍夫斯太德等（1992）对美国与韩国年轻人购物决策风格区别的研究，发现二者有七项消费特征相同，仅有新颖时尚意识表征美国而不代表韩国青年的消费特征。1993 年杜拉等通过对新西兰和美国消费者的研究来检验 CSI 的普及性。他们发现两国在八个特征中共同的有三个，即追求完美、新颖时尚和购物娱乐。他们认为样本和零售环境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其他因素不同的原因。1996 年他们又做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多国研究以检验 CSI 的普及性。1998 年 V.W 米切尔和 L. 贝茨对英国大学生做的一项研究，得出十种消费购物风格。范和肖（1998）对中国、韩国和美国青年做的比较研究得出五种共同消费特征，即品牌意识、时间意识、质量意识、价格意识和利用信息型。而新颖时尚意识、冲动意识和习惯化品牌忠诚既没被美国、韩国样本所代表，又没在中国样本中发现。他们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环境可能是导致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差异的潜在因素。Hui, A. S. Y. et al.（2001）通过调查 387 位成年消费者，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市场中有五种购物决策风格，即完美主义、新颖时尚、消遣娱乐、价格敏感和眼花缭乱。进而，他们将中国消费者分为三种类型：新潮完美型、传统务实型和眼花缭乱型。Leo. C. et al（2005）通过比较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消费者的购物决策风格来探讨文化因素对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的影响，结果发现两国消费者在品牌意识、新颖时尚和眼花缭乱三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认为两国消费者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这些购物决策风格的差异。

（二）面子意识

中国社会是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众多研究和文化比较已证实了这一点（翟学伟，2004）。“面子”在《辞海》中有两个意思，即体面光荣和情面。当人的脸面被赋予人类

意义的时候，也就产生了“面子”文化。在消费中，面子意识更多的是表现体面光荣之义。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时依据自我评价，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所应有的心理地位（翟学伟，1991）。乐国安（2002）认为“面子首先是个体自我拥有、自尊的表现，然后再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得以实现。不管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有多高或多低，甚至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根本无声望，人们爱面子的心理也不会由此得到减弱。这种心理也许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重伦理的渗透、维护祖宗心态的外显和追求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现实中我们有诸多与面子有关的经历，如脸红、感到尴尬、窘迫、羞耻抑或骄傲、自豪等。一方面我们争取做到体面、有面子，另一方面我们尽量保面子、不丢面子。因此面子意识即人们在社会活动、人际交往中尽力提升、维持抑或保全不丢面子的心理倾向。在经济生活中，面子意识影响着人们的诸多消费行为。例如，当周围人购买了某一商品时，人们可能会因保面子而产生购买该商品的欲望或会考虑购买比其更好的商品，这样会显得更有面子等。随着学者们对“面子”认识的深入，研究已从零碎的随笔杂感进入到系统的以现代社会心理学实验和实证方法的专门研究。像朱瑞玲、陈之昭、佐斌及吴铁钧等都对“面子”做了实证研究。朱瑞玲（1994）发现九类关于脸面的事件，分别是违法行为、品行不端、道德问题、家庭伦理、能力、地位和尊严、责任、行为失误及暴露隐私等，并分别归纳出六种丢脸面后的情绪反映及六种避免和挽回脸面的方法。她又对此做实证检验，发现成败经验影响人们的面子需求，而面子需求对成就行为却没有显著影响。陈之昭（1988）通过对412名大学生做调查，来探讨面子行为与面子需要、自尊感、偏狭性、马基型、权威型等人格特质的关系。结果发现，面子行为与面子需要、偏狭性、马基型呈显著正相关，而与自卑感呈显著负相关。男生的面子行为多于女生，而女生的面子需求强于男生。佐斌（1997）通过调查192名武汉市民，发现四类丢脸面的行为，即违背道德、能力缺陷、不良习惯和隐私暴露。吴铁钧（2003）采用自制的“大学生面子观念问卷”对苏州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得出遵从礼俗、能力成就、仪容仪表、社会认可和人际关系五种有面子观念，还有不遵礼俗、没有成就、消极怠惰、人际关系和仪容仪表五种没面子观念。薛海波（2007）的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80后”消费者的追求完美风格与五个面子意识因子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和当前“80后”消费者的购物心态相对应，为了买到自己认为最称心如意、最完美的商品，“80后”的消费者要使尽各种方法，如网上搜索、咨询朋友、反复比较等，以最终做出购买决策。因为这样可以显示出他们的能力和成熟，而且“完美”的商品也

能为他们带来和谐的关系，这样他们会更有面子。（新颖时尚和三个面子意识因子显著相关；重视品牌也和三个面子意识因子显著相关；购物享乐和两个面子意识因子显著相关。）

（三）对中国 90 后大学生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

“90 后”是“80 后”的派生词，一般是指出生在 1990 年 1 月 1 日——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一代中国公民，普遍为独生子女。90 后已经慢慢长大，如今大学校园里至少已经有了两届 90 后学生，社会上也不乏他们的身影。90 后出生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展现出明显成效，优越的经济条件注定了他们将成为商业社会中极速增长的新兴势力。专家预测，在未来几年里 90 后的消费力将是具有冲击性的，其消费水平要远高于 70 后和 80 后，他们是新时代钻石级消费阶层。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迁，90 后的思想理念与前几代中国人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独特的消费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喜好让商家有些茫然，传统的营销方式在 90 后消费群体中面临着失效的风险。近年来，90 后各种消费现象引起了营销学界的关注。

在国内有关于 90 后消费的深入研究数量较少。卢泰宏及其研究团队对我国独生代消费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消费者特征、消费模式等等。薛海波通过对 386 名 80 后消费者的调查分析出他们购物决策风格的 8 个影响因素，这是针对年轻一代消费者行为比较系统的代表性研究。从国内可查阅的文献来看，只有对 90 后消费群体的相关研究，而对于中国 90 后消费者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同时这也是本次研究的创新和价值意义所在。

罗勤林（2009）总结 90 后大学生消费特点为：乐于追逐消费时尚、存在消费攀比、消费浪费严重，部分地体现了炫耀性消费的思想根源。马可（2009）认为 90 后易受传媒广告的诱惑、情绪化消费严重、从众和个性化消费同时存在、消费时尚化，突出了这一群体的消费特征。毛远弟认为“90 后”追求产品（或服务）与自己的情感体验相一致，崇尚自我个性，追逐限量商品，喜欢网络购物。零点集团对 90 后人群在移动通信消费方面进行调查，总结出 4 个特点：追求掌控感、松圈主义、娱乐主义、金钱精算化。90 后作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消费群体，正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90 后是和互联网、信息爆炸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还伴随着孤独、社会压力的加大和人民的富足。他们喜欢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钟情于自己个性化的“圈子”。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设计与过程

本研究的分析方法总体设计如下：（1）首先，以 CSI 量表为蓝本，借鉴范和肖（1998）、Hiu et al.（2001）及吴绍宏（2001）的研究设计问卷来调查“90 后”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以吴铁钧对面子的研究为基础设计问卷来调查其面子意识；（2）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式量尺，其中“5”代表“非常不同意”，“1”代表“非常同意”；（3）在学校进行抽样调查，问卷收集后剔除无效问卷，使用 SPSS17.0 对数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估计因子个数，最终确定“90 后”消费群体的购物决策风格及面子意识的因子特征；（4）接着使用 SPSS17.0 软件对抽取的因子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包括单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多变量间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二）样本和数据采集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河海大学、南航江宁校区本科大一至大四年级的学生，都是以 90 后为主的大学生。收回有效问卷 251 份，其中样本分布情况如下：男生占 46.6%，女生 53.4%，基本达到均衡；调查的年级中大一占 38.6%，大二占 37.8%，大三占 15.1%，大四占 8.4%。专业主要分为两类，文史类占到 26.3%，理工类占到 73.7%。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占受试者的 58.2%。大学生生源地大城市的为 10.8%，中等城市的为 17.9%，小城市包括县城、城郊、镇的为 46.3%，农村的为 25.1%，可见被调查的大学生家庭多在中小城市，还有部分在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大众化。在家庭月收入统计项中，1000 元以下的是 4.8%，1000-2999 元的是 26.7%，3000-4999 元的是 39.0%，5000-9999 元的是 25.1%，10000 元及以上的是 4.4%，所以家庭月收入以 1000-5000 元为主流，还有部分在万元以上，属于一般的工薪家庭较多，代表性很强。最后关于大学生在校生活费的统计，500 元以下的占 6.4%，500-799 元的占 21.5%，800-999 元的占 29.5%，1000-1499 元的占 35.1%，1500 元及以上的占 7.6%。半数以上的受试者月生活费在 500-1000 之间，也有个别同学达到近 2000 元，在这也可以看出，家庭月收入对学生的生活费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按照比例来看，有个别学生超出一般水平的花费，但只是个别现象。由此，也可以分析出，90 后大学生的消费观并非备受批判的超额不良消费，那些只是个别现象，不能作为典型标签贴给 90 后大学生（详见表 1）

表 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人口变量	所占比例	累计比例
性别	男	117	46.6%	46.6%
	女	134	53.4%	53.4%
年龄	大一年级	97	38.6%	38.6%
	大二年级	95	37.8%	37.8%
	大三年级	38	15.1%	15.1%
	大四年级	21	8.4%	8.4%
独生子女	是	146	58.2%	58.2%
	否	105	41.8%	41.8%
家庭所在地	大城市	27	10.8%	10.8%
	中等城市	45	17.9%	17.9%
	小城市（包括 县城）	86	34.3%	34.3%
	城郊	2	0.8%	0.8%
	镇	28	11.2%	11.2%
	农村	63	25.1%	25.1%
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12	4.8%	4.8%
	1000-2999 元	67	26.7%	26.7%
	3000-4999 元	98	39.0%	39.0%
	5000-9999 元	63	25.1%	25.1%
	10000 元及以上	11	4.4%	4.4%
在校月生活费	500 元以下	16	6.4%	6.4%
	500-799 元	54	21.5%	21.5%
	800-999 元	74	29.5%	29.5%
	1000-1499 元	88	35.1%	35.1%
	1500 元及以上	19	7.6%	7.6%

四、数据分析

（一）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与面子因子确定

本研究首先对“90后”消费者的购物决策风格和面子意识做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八种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分别为：（1）“新颖时尚”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对新颖时尚的追求；（2）“难以决策”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面对诸多产品和品牌信息时，感到迷乱难以确定；（3）“追求完美”包含三个问项，描述“90后”消费者对所选商品质量要求高，要尽善尽美；（4）“重视品牌”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对知名品和国际品牌的重视；（5）“习惯忠诚”包含两个问项，表示“90后”消费者一旦找到自己喜欢的品牌，便会重复购买；（6）“价格敏感”包含两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尽量选择低价和平价商品；（7）“购物享乐”包含两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以购物为乐趣的特征；（8）“冲动购物”包含两个问项，描述“90后”消费者购物时冲动，购买后后悔的心理。“面子意识”包含五个因子，分别为：（1）“仁义宽厚”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以重信重义，心胸宽广为有面子；（2）“能力成就”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以成绩优异，被人赞誉为有面子；（3）“成熟灵活”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认为在别人面前显得成熟，社交应变能力强而有面子；（4）“关系和谐”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以家庭和睦幸福，人缘好，人际关系和谐为有面子；（5）“朝气蓬勃”包含三个问项，反映“90后”消费者以勤奋、有理想和有爱心为有面子。

（二）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与面子因子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究面子意识与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本研究首先对抽取的因子做两两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以初步探测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总的来说，在“90后”消费者八个购物决策风格因子和五个面子意识因子间四十对关系中共有十三对关系显著相关。在八个回归分析中的四个回归方程中，至少有两个面子因子来预测“90后”消费者的购物决策风格。这些发现反映出面子意识与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详见表2）

表 2：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与面子因子的相关分析

Correlations							
		家庭月收入	新颖时尚	购物享乐	冲动购物	价格敏感	重视品牌
家庭 月收 入	Pearson	1	.270**	.106	-.021	.039	.188**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000	.092	.745	.540	.003
	N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新 颖 时 尚	Pearson	.270**	1	.000	.000	.000	.000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000		1.000	1.000	1.000	1.000
	N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购 物 享 乐	Pearson	.106	.000	1	.000	.000	.000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092	1.000		1.000	1.000	1.000
	N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冲 动 购 物	Pearson	-.021	.000	.000	1	.000	.000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745	1.000	1.000		1.000	1.000
	N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价 格 敏 感	Pearson	.039	.000	.000	.000	1	.000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540	1.000	1.000	1.000		1.000
	N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重 视 品 牌	Pearson	.188**	.000	.000	.000	.000	1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003	1.000	1.000	1.000	1.000	
	N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首先,探讨新颖时尚。五个面子意识因子中有三个与之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能力成就的相关系数最大,其次是成熟灵活和关系和谐。这反映出以高能力成就、成熟灵活和人际关系和谐为有面子的“90后”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新颖时尚产品,因为新颖时尚产品能够使他们更有面子。

其次,看追求完美。五个面子意识因子均与其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关系强度依次为成熟灵活、关系和谐、能力成就、仁义宽厚和朝气上进。这反映出要面子的“90后”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较高,希望所购物的产品尽善尽美。这是因为,高质量的产品使他们显得更有面子。对于重视品牌来说,五个面子意识因子中有三个与之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关系强度依次为能力成就、仁义宽厚和成熟灵活。但是,仁义宽厚与重视品牌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越认为仁义宽厚有面子,则在购物选择时对品牌是否是国际知名品牌就越不重视。这是因为仁义宽厚表现出对他人的接纳和容忍程度很高,那么在产品品牌的选择上就越可能接纳那些非知名品牌。而对于购物享乐来说,仅有关系和谐及能力成就两个面子意识因子与之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最后,对于难以决策、习惯忠诚、冲动购物和价格敏感四种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来说,统计数据没能反映出其与五种面子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其中价格敏感和五种面子意识的相关系数均为负数,虽然不显著,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面子意识和价格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对于要面子的“90后”消费者来说,购买低价的商品似乎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

五、结果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90后”消费者的追求完美风格与五个面子意识因子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和当前“90后”消费者的购物心态相对应。为了买到自己认为最称心如意、最完美的商品,“90后”的消费者要使尽各种方法,如网上搜索、咨询朋友、反复比较等,以最终做出购买决策。因为这样可以显示出他们的能力和成熟,而且“完美”的商品也能为他们带来和谐的关系,这样他们会更有面子。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不仅要在产品质量上精雕细凿以尽完美,而且还要在其他方面做到完美,更重要的是要向“90后”消费者宣扬产品和品牌的完美。这样有产品品质的保证和完美的诉求将会获得“90后”消费者的青睐。

新颖时尚和三个面子意识因子显著相关反映出当前“90后”消费者正是各种消费

潮流的领导者，他们敏锐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他们是最“in”的人，在诸多方面都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因为新颖时尚的消费可以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很有能力，深谙社会世故，并能吸引他人的关注。服装品牌“美特斯·邦威”正是把握了“90后”消费者的这一心理，而宣扬自己的休闲服是最时尚的、最“in”的，所以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为休闲服市场的第一。

重视品牌也和三个面子意识因子显著相关但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得出重视品牌和仁义宽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对一些“90后”消费者来说，拥有名牌产品并不代表什么，他们更喜欢朴实无华的事物。某些商家已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赞助优秀贫困大学生，将产品赠送给他们使用，这样贫困大学生朴实、勤奋的形象就成为该品牌无形的代言人，以吸引以朴实为有面子的“90后”消费者。当然，要提醒企业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小市场。而对于大多数的“90后”消费者来说，面子和名牌还是正相关的。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培育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是当务之急。

购物享乐和两个面子意识因子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反映出“90”消费者不仅仅为了购买一件产品，他们还强调对购买过程的体验，追求享乐性消费。因为购物享乐可以显示出他们会生活，而且其过程也可以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因而使他们更有面子。所以，对于商家来说，如果注意到销售的不仅仅是产品而且还有快乐，而因此增加消费者购买过程中的享乐体验，这对于“90后”消费者来说将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迪斯尼乐园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迪斯尼专门为排队等待进入的游客播放游乐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其他游客的一些精彩画面，这样不仅消除了游客等待的无聊感，而且也激起了游客想尽快体验的欲望。

最后，虽然其他四种购物决策风格与面子意识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本研究仍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预测，如面子意识和价格敏感之间应该具有负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对于“90后”消费者来说，在乎价格的轻微变化以及购买平价的产品可能是不太体面的事情。当然，这需要通过后续实证研究来证实。另外，由于本研究调查的对象还很年轻，因此他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对某一产品或品牌的习惯忠诚，或习惯忠诚本身和面子意识之间确实没有相关关系，这些都需要通过其他研究来验证。

参考文献：

姜彩芬，2008，《面子、符号与消费》，《广西社会科学》第5期。

薛海波，2007，《面子意识与“80后”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关系的一项实证研究》，上

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经济管理学科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袁丽峰，2011，《中国 90 后大学生炫耀性消费动机的实证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薛海波，2007，《消费者购物决策风格量表研究述评与展望》，《消费经济》第 5 期。

翟学伟，1991，《中国人际心理初探——“脸”与“面子”的研究》，《江海学刊》第 2 期。

翟学伟，2004，《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张正林、庄贵军，2008，《基于社会影响和面子视角的冲动购买研究》，《管理科学》第 6 期。

☆ 作者简介：石蕾蕾，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彭 翔

※ ※

牛津大学 Anna Lora-Wainwright 副教授讲座： 环境-健康的人类学研究

3 月 6 日下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地理学系 Anna Lora-Wainwright 副教授在河海大学管理楼 402 会议室做了题为“环境-健康的人类学研究”的讲座。讲座由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毅杰副教授主持，社会学系老师和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Anna Lora-Wainwright 博士长期从事中国环境-健康领域研究。此次讲座从她在四川省的一个村庄进行了长达 15 个月的田野调查展开，讲述了她是如何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收集资料，了解当地村民对疾病及医疗的理解和认识；并详细阐述了她关于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她认为人类学在寻找、研究农民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健康损害问题上的效用和优势，但想要获得丰富真实的一手资料，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与当地建立密切的关系。由于环境-健康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对于解决当地和环境与健康问题也显得无力，许多研究结论比较有限。

最后，社会学系老师和学生就农村调查方法、受害村民抗争行为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等相关问题与 Anna Lora-Wainwright 博士进行了深入交流。

（谢江平 供稿）

同龄群体对发型选择的影响机制探析

——以 H 高校大学生问卷调查为例

朱运亮

摘 要：本文基于“镜中我”理论视角，分析同龄群体对个体发型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龄群体的发型选择、对个体发型的评价及个体对他人评价的认知与个体的发型选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通过对发型影响因素的研究，验证了“镜中我”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社会化的作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发型选择 朋友同学 镜中我 社会化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起来，发式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对发式开始了新的追求，时尚发型由此产生了。进入 21 世纪，发型的样式更加多元。

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文明对人们日常生活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发型的选择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化意义。据一份大学校园 2007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校园内女老师头发做过效果(包括拉直,电卷,染色)的将接近三分之一。而学生,女生超过半数头发做过效果，发型多以拉直、电卷、染色为主；男生也有五分之一做过头发效果,多以烫发为主。

在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社会中，应该把人们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与社会化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社会现代化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入侵、渗透和交融，现在的人愈加现代化，在表现自我的过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选择被赋予功利性的意义，染上了浓郁的工具理性色彩，这种理性不是韦伯强调的与制度和规则相联系或经过投入产出的精密计算的理性，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与社区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就变成了研究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在发型选择问题上，现在的发型的可选择性日益增多，选择发型的原因除了性别、身高等自然属性因素外，还会考虑朋友同学的意见、周围的环境等社会属性因素。发型选择极具社会化色彩，人们变化发型是为了看到“镜中我”的美好和认可。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实际上涉及社会价值观念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生活在他人

评价的世界里，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社会交往。而现代和后现代文明的入侵，对人们的自我认识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宅男”、“宅女”等新名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网络进行交流互动，网络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受到网络等现代工具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90后”、“00后”群体对于“镜中我”的认知度也在发生变化。

本文试图从大学生发型选择角度入手，了解青年群体对他人评价的认知情况，分析“镜中我”是如何作用于青年群体价值选择的。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以往的研究发现，发型选择不仅是个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辛亥革命后剪掉长发；30年代女士波浪式为主的烫发；建立新中国后，喜悦、乐观、向上的精神氛围影响了每一个人，大家纷纷“解放形象”剪成短发；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吹发流行起来；21世纪发型的可选择性更加丰富。

根据连素萍在《发型设计与艺术》中的研究，发型具有功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在影响发型选择的因素中，除了发质、头型、五官等自然属性因素外，还有职业、环境、民族与宗教等社会属性因素（连素萍，2004）。发型的选择影响社会交往圈的范围和交往方式，透过发型选择，我们可以了解人们心里特征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基于此，本文关注当代大学生是如何进行发型变换的，父母、同学及朋友等的评价对他的选择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选择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以下结合“镜中我”理论进行相关阐述、分析。

美国的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获得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透过这面镜子来观察、认识和把握自己，形成“镜中我”。因此，人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的，即自我要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进行调整，以使自己不断进行社会自我的实现（赵泽鸿 李云芳，2009）。在现代社会，运用“镜中我”理论分析当代大学生发型选择的影响因素，对于认识大学生的社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每一个人都是这两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但由于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和行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认知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自我认知及社会认知的过程对个体的实践活动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发型变换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带有社会的深刻含义，人们变换发型不仅受到自身心理的驱使，更容易受到周围社会人

及社会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影响，而这也反映了人的行动社会化和价值社会化过程（宋官东，2002）。

此次调查面向的 H 高校大学生，社会化的场所主要是同龄群体和学校，同龄群体对于发型选择及其背后人的现代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同龄群体换发型的密度，同龄群体对个体发型的评价，个体对同龄群体负面评价的反应构成了完整的“镜中我”。个体通过同龄群体这面“镜子”进行着社会化活动。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库利认为“镜中我”形成有三个阶段：一是我们所感觉到我们在他人面前的形象，这是感觉阶段，是我们设想的、他人的感觉；二是我们领悟了别人对我们的行为的判断，这是解释或定义的阶段，即我们想象的他人的判断；三是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我们评价我们的行为。

针对发型选择过程中的三个“镜中我”阶段，本文提出：1. 同龄群体换发型对自己换发型有没有影响；2. 同龄群体评价对发型选择的影响；3. 同龄群体负面评价认知对发型选择的影响。以下将分别给出研究假设及其背后的关系机制。

（一）同龄群体换发型的影响

我们可以就同龄群体换发型对自我换发型的影响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 1a：同龄群体换发型的数量越多对自我换发型的影响越大

假设 1b：同龄群体换发型对自我换发型没有影响

社会化的场所有家庭、同龄群体、学校、职业、大众媒体等。对于大学生群体，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同龄群体是社会互动的主要对象。朋友、同学作为同龄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是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同龄群体的社会活动对个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个人在同龄群体的社会活动中，会模仿他们的行为。如果同龄群体中换发型的数量越多，则个人就会不自觉有换发型的意愿。

如果同龄群体都倾向于换某种发型，而个体又没有换此类发型，那么换发型的朋友就会形成一个小群体，个体则会被排斥，无法融入到他们的互动中去。为了获取其他同龄群体的社会认同，获得共识，个体也大多会选择换发型，即使他对换发型的愿望并不是很强烈，这也是趋同论的典型特征。

（二）同龄群体评价的影响

在日常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如果其他同龄群体换了最新的发型，他们形成了换过发型的小群体，小群体对没换发型的个体会产生排斥。此时，个体就会意识到自我在他人

面前的形象，感受其他人对他的态度、感觉。由于只有这个个体没有换发型，个体就会判定是因为没有换发型才与其他同龄群体产生隔阂。而且由于没换发型，其他人对个体就会有不良评价，个体对此就会产生抵触。

此外，如果其他人认为某个体的发型不合适、不好看，个体的自我认知就会受到负面影响，自信心也会受到影响。为了保持高度的自我认知，恢复在别人心中的良好形象，个体就会选择根据同龄群体的意见改变发型。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同龄群体对个体发型的评价越低，选择换发型的几率就会越高。

（三）个体对同龄群体负面评价的认知对发型选择的影响

在镜中我理论中，第三阶段是基于他人的评价，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行为。即根据自己在他人镜子中的镜像形成最终的对自我的评价，这个阶段的结果表现为正面评价、负面评价或者没有获取到评价。

在发型选择问题上，如果同龄群体对个体评价较低，那么个体则会进行自我反思或无所谓的态度，个体从他人获得的自我评价也就表现为负面评价、不认同自我。个体自我的负面评价促使个体反思发型的问题，个体对于没有换发型或现在的发型会感到越来越不满意，那么个体就会倾向于实现自我认同，通过换发型这个行为达到目的；如果个体的自我认同较高，则不会选择变换发型。由此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3：由于同龄群体评价形成的自我评价越低，换发型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数据与研究设计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调查小组在 H 大学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选择发型的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 300 份问卷，实际回收 297 份问卷，有效问卷 280 份，17 份无效问卷。问卷回收率 99%，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3.33%。运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本次变量设置情况为，是否换发型作为因变量，问卷的其它三部分作为自变量。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性别、专业、消费水平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同龄群体（朋友、同学）是否换发型、对个体发型的评价、个体对同龄群体负面评价的认知等对发型选择的影响，第三部分是父母是否换发型及对发型的评价等对发型选择的影响，另外最后一部分的性格测试量表作为探索性研究的一部分，性格分为内向、中间、外向三种类型，对符合赋值 2，对不一定赋值 1，对不符合赋值 0，从而探析性格的影响。

问卷调查主要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调查小组分别到图书馆、自习室、宿舍进行问卷发放。由于 H 高校图书馆、自习室里大都是学习的大学生，所以说这种方法得出的

数据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被调查对象对于调查内容都比较熟悉，问卷调查相对容易开展。

测量人们变换发型的影响因素（身高、体型、脸型等自然属性因素，身份、社会环境等社会属性因素），本文从“镜中我”理论出发，分析同龄群体对个体发型选择的影响关系。

假设 1 关注的是同龄群体是否换发型对个体发型选择的影响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发型社会化的过程中，同龄群体的行为选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假设 2 关注的是同龄群体对个体现在发型的评价对个体是否变换发型的影响。这在“镜中我”理论中处于第二阶段，个体感知到他人的评价，并根据他人的评价做出选择；假设 3 关注的是个体在感知他人负面评价并做出自我评价后，对发型选择的影响。

本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主要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同龄群体对个体发型选择的影响机制。个体发型选择变量的指标为“没换过”、“换过”，同龄群体发型变换变量的指标为“没换过”、“换过”，同龄群体评价变量的包括“不好”、“适合自己”两个指标，个体对他人负面评价的认知包括“赞同”、“反对”两个指标。

五、结果与分析

（一）对假设 1 的检验与分析

通过表 1 可以看到，同龄群体换发型与是否换过发型之间的显著性通过检验（ $0.000 < 0.01$ ），两者的 Pearson 相关性为 25.4%，这说明同龄群体换发型对个体是否换发型具有显著影响，朋友、同学中换发型的越多，个体也会越倾向于换发型，从而完成社会化，实现在同龄群体中的自我认同。由此得出结论，假设 1 通过检验。

表 1：同龄群体换发型对发型选择的影响

		是否换过发型	同龄群体换发型
是否换过发型	Pearson 相关性	1	.254**
	显著性（双侧）		.000
	N	280	280
同龄群体换发型	Pearson 相关性	.254**	1
	显著性（双侧）	.000	
	N	280	280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对假设 2 的检验与分析

通过表 2 可以看到, 同龄群体对个体发型的评价与个体是否换发型之间的显著性通过检验 ($0.034 < 0.05$), 两者的 Pearson 相关性为-12.7%, 这说明同龄群体对个体的评价会影响个体的行动选择, 同龄群体的评价越低, 个体换发型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得出结论, 假设 2 通过检验。

表 2: 同龄群体的评价对发型选择的影响

		同龄群体的评价	是否换过发型
同龄群体的评价	Pearson 相关性	1	-.127*
	显著性 (双侧)		.034
	N	280	280
是否换过发型	Pearson 相关性	-.127*	1
	显著性 (双侧)	.034	
	N	280	280

*. 在 0.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三) 对假设 3 的检验与分析

通过表 3 可知, 个体对别人负面评价的认知与是否换过发型之间通过双侧显著性检验 ($0.002 < 0.01$), 显著性水平较高, 两者的 Pearson 相关性为 18.5%, 说明自己对他人负面评价的认知与是否换过发型之间呈现轻度的正相关, 即个体认同他人对其发型的负面评价, 就会选择变换发型, 从而消除这种负面评价, 实现他人认同和自我认同。由此得出结论: 假设 3 通过检验。

表 3: 对同龄群体负面评价认知对发型选择的影响

		是否换过发型	对同龄群体负面评价的认知
是否换过发型	Pearson 相关性	1	.185**
	显著性 (双侧)		.002
	N	280	280
对同龄群体负面评价的认知	Pearson 相关性	.185**	1
	显著性 (双侧)	.002	
	N	280	280

*. 在 0.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四）对比分析

在上述分析中，三者的相关性排序分别为 $25.4\% > 18.5\% > -12.7\%$ ，相关性大小说明同龄群体对个体发型选择的影响机制更多的表现为实际行动的影响。即当同龄群体中选择变换发型的人数越多，个体受他们行动选择的影响也就会越明显，这也是对社会化中人的行动社会化的直接解释；其次，个体对于同龄群体负面评价的认知与是否变换发型之间的相关性达到 18.5% ，这也说明“镜中我”第三阶段的自我认知对于行动选择产生了作用，但这种影响力度不如直接的行动影响；而同龄群体对是否换发型的轻度负相关性也是对现在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越来越多的个体倾向于独立、个性，同龄群体的评价对行动和价值选择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小一些，如果同龄群体在实际的生活也选择此类的行动并作出这样的价值选择时，个体受影响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六、总结与讨论

伴随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外来时尚与潮流对当代大学生青年群体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人们的行动选择也越来越多，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与社会进行互动的舞台，互动的结果或好或坏，结果的产生一方面与社会文明规范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自我价值有关。对于青年大学生这个群体，由于代沟的原因，家庭在个人社会化中扮演的角色正在退化，个体成年之后，社会行动越来越受到同龄群体的影响，运用“镜中我”的作用机制了解青年群体的社会行动选择受同龄群体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个体行动和价值选择作为社会化的产物，深受同龄群体的影响。透过分析，我们可以探究到这样一种影响机制。首先，同龄群体在实际生活中的行动和价值选择会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行动倾向性，就像数据中看到的同龄群体变换发型与个体变换发型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再次，同龄群体对个体的评价对个体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的作用就要小一点，因为现在青年大学生越来越叛逆，他们一方面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抵触他人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同龄群体评价的影响就会减弱一些；第三，也就是“镜中我”中对自我认知这部分，当个体对他人的负面评价达成认知后，会选择其认知方向的行动。在发型选择中，如果个体对他人负面评价的认可的话，就会倾向于选择换发型。

“镜中我”理论为分析“同龄群体对发型选择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适合的视角，从中透视青年大学生的行动选择和价值倾向，对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连素萍，2004，《发型设计》，摄影艺术出版社。

宋官东，2002，《对从众行为的在认识》，《心理科学》第2期。

赵泽鸿、李云芳，2009，《解析年轻一代“镜中我”缺失与代沟问题的产生》，《科教文汇(上旬刊)》第2期。

☆ 作者简介：朱运亮，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冯 燕

※ ※

博士生蒋培获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资助

2013 年度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学子项目立项名单于近日公布，我系社会学2012 级博士生蒋培榜上有名。他的题目是《城市化背景下市民环境行为研究——基于杭州市若干城郊社区（村）的经验研究》，资助金额为2.5 万元，项目周期为两年。本次学子项目经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组织评审，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提供经费，共审批了8 个学子（博士生）项目。其优秀成果将推荐参加“钱学森城市学奖”评选。

“光棍节”大学生消费现状、影响因素及特点研究

——以河海大学为例

李亚慧

摘要：光棍节由于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再加上近年来通过得到网络等媒介传播和商业推动，大学生以其自身特点会参与到节日中去，必定会产生消费。本文以河海大学为例，通过对大学生在光棍节消费情况的调查，得出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受到月生活费的影响，当天消费结构与日常消费结构存在差异以及易受周围同学影响等结论。总的来说，因节日的特殊性，大学生在光棍节当天的节日消费也具有独有的特点。

关键词：光棍节 消费结构 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光棍节”源于大学生自创的娱乐性节日，本意特指单身男性，其中多少带有些调侃和自嘲的味道，随着单身女性的加入，光棍的队伍逐渐壮大，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传播和商业推动，近年来已蔓延到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节日文化。如今，这天已成为年轻人聚会、狂欢、购物、相亲或结婚的日子。“光棍节”的兴起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发展的烙印，在快速的人口流动、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快速的生活节奏、强大的工作竞争压力、狭窄的社会接触面等因素推动下“光棍节”越来越热。再加上，目前中国以“淘宝”为主的网络商企，抓住“光棍节”这特有的节日氛围，推出了售卖物品半价的商业促销活动，使“光棍节”衍生出另外一个名称“双十一”，这种网络促销活动吸引了大量以年轻人为主的消费者关注“光棍节”这个节日，增加了这个节日特有的节日氛围，提高了这个节日的认知度。

在目前中国大学校园里，以年轻人为主的大学生群体具有文化水平较高、视野较宽、容易尝试新鲜事物等特点，同时大学生群体周围围绕的都是以大学生为主的同辈群体，大学生的从众性较强，此外大学生群体由于年龄较小，很多学生都处于单身状况，较高的文化背景总是容易使单身的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得到某种共鸣，这种共鸣总带有调侃或自嘲的味道。所以在“光棍节”特有的文化氛围再加上商家在这一天所进行的商业促

销活动，大学生群体总是特别关注“光棍节”这个节日。当大学生特别关注这个节日时，根据“光棍节”特有的节日特点，大学生在这一天总会产生消费，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主要有追求实用，理性消费；追求时尚，超前消费；追求差异，个性消费；追求虚荣，攀比消费等特点。

在以上背景下，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的消费结构和影响消费因素是什么，与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结构和影响消费因素有哪些差异等问题是本文所重点探讨的研究问题。

二、文献综述

随着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迅速壮大，国内学者对于大学生消费问题关注度不断提高，目前，无论是教育界还是理论界，都对大学生的消费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通过对大学生消费的文章和分析，可以将其研究内容和观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大学生消费水平的研究

目前普通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大学生是消费水平偏低的社会群体，所谓的大学生高消费误区可能是局部现象，不构成整体现象。王晖认为“90后”大学生的消费总体趋于朴素且理性，大学生基于经济实力的限制和自身较强的理性，呈现出科学和适度的消费状况(王晖，2009)。余耀森认为大学生消费水平不高，大多数人的消费属于适度型消费(余耀森，2009)。任翔认为大部分学生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经济支付能力有限，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只是处于温饱状态略有结余(任翔，2001)。二是认为大学生的消费水平高，且存在盲目消费、高消费行为，偏离了理性消费的轨道。贺冬萌认为大学生整体上有消费水平比较高的趋势，且高消费和浪费严重(贺冬萌，2009)。

2. 关于消费结构的研究

郭奉元通过对大学生消费现状实证分析指出大学生消费支出主要是用于饮食、衣着、交际、娱乐、学习和其它方面(郭奉元，1997)。任翔通过对北京某大学的消费调查，了解了目前大学生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特点，表明在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支出中，饮食消费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娱乐社交消费和通讯费，最后才是生活用品消费和购买书籍消费(任翔，2001)。张志祥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及其趋势的研究，将当代大学生消费结构归纳为大学生基本生活消费、学习消费、休闲及娱乐消费、人情消费四个方面(张志祥，2002)。

3. 关于消费特点的研究

张文潮通过对上海某高校一至三年级的大学生的消费情况的调查，指出当代大学生

的消费行为有以下特点:追求实用,理性消费;追求时尚,超前消费;追求差异,个性消费;追求虚荣,攀比消费(张文潮,1999)。程玉桂对南昌市部分高校学生消费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学生消费有以下几个特点:个性品牌消费占主流;消费决策趋于理性;社会消费需求逐渐凸现(程玉桂,2006)。张燕对内蒙古师范院校大学生消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则显示,大学生消费的多样性与差距性共存;独立性与依赖性共有;时尚性与从众性同在;物质性与精神性并重;求知性与实用性辉映(张燕,2007)。张天华对大学生消费特点的研究得出:大学生消费成多元化趋势;追求个性化和自我满足;自主意识强(张天华,2007)。

4. 关于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观念研究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消费观念的变化总是基于一定的消费心理。他们有着不同于社会其他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其研究结果总体认为,大学生消费心理既有理性特点,也存在不成熟的一面。

在理性消费方面:施应玲通过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调查及分析认为大学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消费时大都从经济角度出发,注重商品的价格,会选择既经济又实惠的商品,特别是在食品和耐用品消费方面,很少受到广告宣传和特价活动等促销形式的影响,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识别品牌及阅读产品说明书了解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这属于理性型消费行为(施应玲,1998)。闰纓认为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为“趋同心理”,他们的消费心理在社会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压力下,相互影响并呈现趋同现象(闰纓,2005)。

在不理性这一方面:闰纓认为大学生正处于自我需求不断扩张的发展时期,因此总是希望以标新立异的消费形象向社会展示自身的成熟,通过消费行为的时尚新潮来显示自己青春的活力,具体表现在饮食消费的高档化、人情消费的模仿化、娱乐消费的新潮化、日用消费品的名牌化,而且在大学生消费群体中,炫耀性消费心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闰纓,2005)。

综上所述,以上所有的文献主要关注在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特点和消费心理及观念的研究,但是对于大学生“光棍节”这一特殊节日内的有关消费的研究文献很少,所以本文在参照以上文献所关注的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消费各方面的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光棍节”这一天消费的研究内容,以主要探讨在“光棍节”这天与日常生活的消费的差异问题。

三、研究设计及假设

1. 研究内容及研究假设

本研究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河海大学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当前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的消费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消费的影响因素。主要从性别、年级、单身情况及平均月生活费等方面来探讨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消费的影响因素问题。该方面的研究假设主要为：a. 1性别与在光棍节节日消费有关；a. 2年级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有关；a. 3大学生的单身情况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有关；a. 4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越高，光棍节节日消费的金额越高。

第二，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的消费结构与日常生活消费结构的差异问题。主要从餐饮、网购、商场购物、娱乐、其他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该方面的研究假设为：b. 光棍节这天的消费结构与日常生活消费结构存在差异。

第三，大学生光棍节消费的从众性问题。主要从身边的同学消费数量及周围同学的消费行为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方面进行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假设为：c. 大学生身边同学在光棍节这天消费的数量越多，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越大。

第四，大学生光棍节消费的合理性问题。主要从周围同学消费行为的合理性、自己消费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假设为：d. 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越低，光棍节那节日消费就越合理。

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河海大学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在光棍节这天的消费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法，能够获得较客观的数据并分析原因，从而取得比较科学可靠的结果，以达到研究目的。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并没有按照随机抽样原则进行抽样，只是按照男女比例进行了问卷发放，并及时将问卷收集整理、统计分析。

3. 调查的实施情况和样本特征

本次调查共在河海大学发放了2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100%，经过问卷的整理、编号、数据录入，运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样本学生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在基本情况的填写中，没有缺

失值，被调查学生性别比例为男生55.5%，女生44.5%；一、二、三、四年级及以上分布为5%、14.5%、8.5%、72%；单身情况为61.5%，非单身为38.5%；调查者的每月生活费在600元以下为6.5%、600—900元为37%、901—1200元为36%、1201—1500元为13%、1500元以上为7.5%；光棍节除了基本消费外还消费的钱数（即节日消费）在500元以下为74%、500—1000元为21%、1000元以上为5%。通过这些数据得知：本问卷的调查对象男女比例基本相同，单身大学生远多于非单身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每月生活费多集中于600元到1200元之间，在光棍节当天节日消费的钱数多集中在500元以下。

表1：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变量	有效样本	统计值
性别	200	男，55.5%；女，44.5%
年级	200	大一，5%；大二，14.5%；大三，8.5%；大四及以上，72%
是否单身	200	是，61.5%；否，38.5%
月生活费	200	600元以下，6.5%；600—900元，37%；901—1200元，36%；1201—1500元，13%；1500元以上，7.5%
节日消费	200	500元以下，74%；500—1000元，21%；1000元以上，5%

四、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面提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以验证所有假设是否成立。

1. 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消费的影响因素

研究假设：a. 1性别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有关

表2：性别与节日消费交互分类

		节日消费			合计
		500以下	500到1000	1000以上	
性别	男	86	20	5	111
		77. 5%	18. 0%	4. 5%	100. 0%
	女	62	22	5	89
		69. 7%	24. 7%	5. 6%	100. 0%
合计		148	42	10	200
		74. 0%	21. 0%	5. 0%	100. 0%

卡方值为1.586 Sig值为0.452

性别身份是大学生角色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女大学生由于社会期望、消费偏好和习惯的差异，在光棍节这天的消费水平上可能存在差别，因此我们对性别和光棍节节日消费两个变量进行交互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在将大学生按性别分类后，我们发现在光棍节不同层次的节日消费水平上男女所占的比例都集中在500元以上，与总体中的比例分布也接近相近，显著性检验结果也表明：性别不同，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总体差异不大（ $P=0.452$ ），性别对于大学生在光棍节当天节日消费金额的影响不大，具体原因，一是笔者认为在光棍节当天大学生节日消费金额都存在，就是大多数大学生进行了节日消费：二是调查问卷有关这一选项设置不合理。

研究假设：a. 2 年级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有关

年级身份往往与大学生年龄成正比，年级越高学生年龄越大，受到的知识程度越高、视野越大，对光棍节的认识程度不同，参与程度也不同，所以年级在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上可能存在差别。因此我们对年级与光棍节节日消费进行了交互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在将大学生按年级分类后，发现在不同年级上光棍节节日消费的水平集中在500元以下，与总体中的比例分布也接近，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年级不同，光棍节节日消费的总体水平差异不大（ $P=0.626$ ），即年级与光棍节节日消费的水平无关。

表3：年级与节日消费交互分类

		节日消费			合计
		500以下	500到1000	1000以上	
年级	大一	8	1	1	10
		80. 0%	10. 0%	10. 0%	100. 0%
	大二	21	7	1	29
		72. 4%	24. 1%	3. 4%	100. 0%
	大三	10	5	2	17
		58. 8%	29. 4%	11. 8%	100. 0%
	大四及以上	109	29	6	144
		75. 7%	20. 1%	4. 2%	100. 0%
合计		148	42	10	200
		74. 0%	21. 0%	5. 0%	100. 0%

卡方值为4.375，Sig值为0.626

研究假设：a. 3 大学生的单身情况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有关

根据光棍节特有的节日文化涵义，处于单身状态的大学生在这种特有的节日氛围里可能找到某种共鸣，表达这种共鸣的方式可能参与各种相亲活动或者参加各种交流活动，这必然会引起消费，所以大学生单身与否可能在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上有差别。因此，将单身与否与光棍节节日消费金额进行交互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在将大学生按是否为单身分类后，发现在是否为单身的层次上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大多数集中在500元以下，与总体中的比例分布也接近，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单身与否，与光棍节节日消费的水平差异不大（ $P=0.254$ ），单身情况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无关。

表4：单身情况与节日消费交互分类

		节日消费			合计
		500以下	500到1000	1000以上	
单身情况	是	96	22	5	123
		78.0%	17.9%	4.1%	100.0%
	否	52	20	5	77
		67.5%	26.0%	6.5%	100.0%
合计		148	42	10	200
		74.0%	21.0%	5.0%	100.0%

卡方值为2.741，Sig值为0.254

研究假设：a. 4 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越高，光棍节节日消费的金额越高。

大学生的平均月生活费决定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所以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越高，光棍节这天节日消费也就可能越高。因此对大学生的平均月生活费与光棍节节日消费两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是大学生的平均月生活费，因变量是光棍节节日消费，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系数 $R=0.307$ ，表示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每增加100元，光棍节节日消费每增加30.7元，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 $\text{sig.}=0.000$ ，小于0.01，说明在95%的置信区间通过检验，即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水平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相关，并且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越高，光棍节节日消费越高。

表5：月生活费与光棍节节日消费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834	.111		7.489	.000
	月生活费	.171	.038	.307	4.545	.000

2. 大学生在光棍节这天的消费结构与日常生活消费结构的差异问题

研究假设：b. 光棍节这天的消费结构与日常生活消费结构存在差异

根据光棍节特有节日氛围，网络商家在这一天搞网络商业打折活动，以及年轻人进行的所谓“脱光”行动和相亲交友以及朋友联络感情进行各种的娱乐活动，都会产生可能比日常生活消费更高的消费，光棍节这天的消费结构与日常生活消费结构存在差异。因此笔者把消费结构分为餐饮、网购、商场购物、娱乐及其他等5个部分，调查研究对象在日常消费和光棍节消费在这5个部分的比重，然后进行计算5个部分比重的均值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如表6所知：餐饮消费比重方面，日常生活消费和当天消费的均值分别为53.25%、49.22%，差距不大；网购消费方面，日常生活消费和当天消费的均值为16.13%、27.48%，相差11.35%；商购方面，日常生活消费和当天消费的均值分别为9.93%、6.27%，相差3.66%；娱乐消费方面，日常生活消费和当天消费的均值分别为10.98%、11.39%，相差0.41%；其他消费方面，日常生活消费和当天消费的均值分别为9.88%、7.02%，相差2.86%。根据这些数据得知，光棍节这天的消费结构与日常生活消费结构存在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网购消费上。这些数字说明网络商企做的网络商业促销打折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学生在这方面的消费显著增加。

3. 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的从众性特点

研究假设：c. 大学生在光棍节节日消费的身边同学数量越多，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越大。

从众性是大学生消费特点之一，在日常生活的消费中有所体验，那么从众性也可能是大学生在光棍节节日消费的特点，也就可能大学生在光棍节节日消费的身边同学数量越多，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越大，因此对身边消费的同学数量与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相关系数 $R=0.362$ ，表示光棍节身边消费的同学数量与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成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证明（ $\text{sig}=0.000$ ）说明这两个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所以光棍节身边消费的同学数量与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即大学生在光棍节节日消费的身边同学数量越多，对自己消费的影响程度越大，也验证了大学生在光棍节消费同样具有从众性的特点。

表6：相关分析

		同学数量	同学消费影响程度
同学数量	Pearson 相关性	1	.362**
	显著性（双侧）		.000
	N	199	199
同学消费影响程度	Pearson 相关性	.362**	1
	显著性（双侧）	.000	
	N	199	200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 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的合理性问题

研究假设：d. 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越低，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就越合理。

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不盲目性，而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的高低与消费行为的合理性可能有关系，也就是说大学生每月的平均生活费越低，就越可能不会盲目消费，进而消费较为合理，因而可以提出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的合理性相关的假设。因此对每月平均生活费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的合理程度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相关系数为-0.159，表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弱的负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得知sig=0.024，表示两个变量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所以说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与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的合理性显著相关，即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越低，光棍节节日消费水平就越合理。

表7：相关分析

		月生活费	自己消费理性问题
月生活费	Pearson 相关性	1	-.159*
	显著性（双侧）		.024
	N	200	200
自己消费理性问题	Pearson 相关性	.159*	1
	显著性（双侧）	.024	
	N	200	200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的影响因素只与大学生的月平均生活费有关,而其他如性别、年级、单身情况等因素都没通过假设检验,没有相关关系。在研究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与大学生的月平均生活费的相关度时,发现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越高,光棍节节日消费越高。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的高低往往代表着大学生背后的家庭经济情况,也就说明经济条件越好的学生在光棍节这天节日消费越多。

在分析大学生光棍节消费结构与日常生活消费结构存在差异与否时,发现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差异比较大的是二者在网购消费方面的比重。这也就说明,光棍节那天网络商企所进行的商品打折促销活动吸引了大学生的目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

通过对光棍节周围同学的消费行为与对本人的消费程度的影响分析得出,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情况存在着从众性特点,也就说明大学生在消费方面的易受影响性。在探讨大学生光棍节节日消费的合理性特点时,发现月平均生活费越低的同学,往往光棍节当天的消费的合理性越高,也就说明经济条件越好的大学生在光棍节消费时越合理性越低。

最后,本文主要探讨了大学生光棍节消费行为问题,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比如在比较光棍节和日常生活消费结构时,只比较出二者在网购方面有较大的差距,但娱乐方面消费(这里主要包括参加单身联谊活动、与朋友交流感情等活动)差异性不大,这是否就能说明大学生在光棍节当天大多数关注网购促销活动,并不认同这种节日氛围这个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另外,在这种特定的节日氛围里,怎样减少大学生消费的盲目性、攀比性这也是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程玉桂, 2006,《当前大学生消费行为特点与消费市场分析—南昌市部分高校学生消费情况调查分析》,《商场现代化》第21期。
- 郭奉元, 1997,《大学生消费现状实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第5期。
- 贺冬萌, 2009,《大学生高消费现象研究》,《消费导刊》第23期。
- 任翔, 2001,《大学生消费状况的调查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第1期。
- 施应玲, 1998,《大学生消费心理及消费行为的调查与分析》,《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第4期。

闫纓，2004，《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引导分析》，《昆明大学学报》第1期。

余耀森，2010，《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消费的几点思考》，《当代经济》第2期。

张干群，2004，《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天华，2007，《大学生消费特点及成因研究》，《商场现代化》第13期。

张文潮，1999，《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消费价值观》，《青年研究》第4期。

张燕，2007，《现实透视与理性引导——对内蒙古师范院校大学生消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张志祥，2002，《当代大学生消费的特征及趋势》，《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作者简介：李亚慧，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孙运宏

※ ※

洪岩壁博士讲座：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2013 年 5 月 8 日下午，香港大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洪岩壁博士受邀来我系做了主题是“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和网络闭合视角”的讲座。公共管理学院王毅杰副院长及张虎彪、杨方、胡亮、沈洪成、张鑫等诸位老师及十几位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洪博士就他近期的研究和发表的成果向与会老师同学进行了介绍，他认为布迪厄的“网络资源”和科尔曼的“社会闭合”两种研究进路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领域，前者强调蕴含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后者则强调闭合网络的支持作用。他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试图将这两类社会资本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联系及其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他认为两类社会资本间的主要差异体现在社会资本来源的不同，“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的来源是家长的社会网络，其作用主要是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而“社会闭合型”社会资本的来源则是家长与孩子本人、教师及其他家长之间形成的紧密社会结构，孩子可以直接从此类社会资本中获益。但两种社会资本之间又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可以共同促进孩子的学业成绩。演讲结束后，洪老师就相关问题和与会者进行讨论，并和博士生就毕业论文选题、学习生活等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均表示对相关论题的方法和视角上都有启发，受益匪浅。

（丁芝燕 供稿）



开 卷

农村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顾金土 邱昊

摘 要：我国农村自然灾害既与气候、季节、地域有很强的相关性，也与危机管理能力、体制有很强的关联性，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合力的结果。当前，农村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呈急速上升趋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如何最大程度地防治农村自然灾害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从危机意识、灾情透明度、村组织力量、应急权责、应急资金投入、恢复重建等方面总结过往经验，以期农村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 自然灾害 危机管理

进入 20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安全仍然是人类关心的第一要务。自然灾害基于突发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其发生的风险一直存在，特别是与新型灾害如核辐射、有毒气体等耦合性极高，传统与现代灾害相互交织，灾难的破坏力更深，影响面更广，给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危机管理都予以高度重视。我国在 SARS 事件后，将公共危机管理纳入到政府管理领域。此后，不断进行完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呈现“重城市、轻农村”的非均衡态势。这一失衡现象，直到 2008 年年初的南方数省特大雪灾和“5·12”大地震时，由于城乡之间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心理、风俗民情等差别巨大，简单的套用和复制城市公共危

*本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政策研究类课题资助项目“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居环境评价机制研究”（2011ZCYJ13-2）的部分研究成果。

顾金土（1974—），男，浙江绍兴人，河海大学副教授，博士学位，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社会政策学、社区社会工作、环保和灾害社会工作等

邱昊（1987—），男，安徽亳州人，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机管理机制应对农村危机并不适用，农村自然灾害问题才得到全社会重视。

一、农村自然灾害的现状

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异常变化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一系列事件。我国自然灾害主要有洪涝、干旱、台风、风雹、雷电、高温、热浪、地质灾害、风暴潮、赤潮、森林草原火灾和植物森林病虫害等。我国近 50% 的农村，70% 以上的城市，50% 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地区。^[1]每年受各类灾害影响的人口达 4 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高达 2000 多亿^[2]，其中年均死亡人数约为 1.6 万人，相当于全球灾害死亡人数的 1/8。^[3]当前，我国自然灾害防控在信息收集和发布、组织管理、机构设置、科技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比较完善，但在危机意识、信息透明度、村组织力量、基层应急权责、应急资金投入以及灾后恢复重建方面还存有不足。

古代曾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形象反映出我国灾害发生频率高、强度大、损失严重的特点。据史料统计，在公元前 206 年至 1949 年的 2155 年中，共发生水灾 1029 次，较大的旱灾 1056 次，死亡万人以上的灾害平均 10-20 年出现一次。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我国每年都会多次受到干旱、洪涝的影响，低温冷冻天气每年出现的次数也较多。^[4]此外，从表 1 的数据可知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末这 50 年时间里，平均每 10 年发生 1.8 次重大自然灾害。21 世纪以来，重大自然灾害的出现有明显的加大趋势，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我国就发生了 4 次重大自然灾害，远高于 20 世纪平均水平。

表 1：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自然灾害

时间	地点	灾害性质	灾害后果
1950. 8. 15	西藏察隅县	8. 5 级地震	死亡 4 000 人
1960-1962	全国	三年自然灾害	死亡约 2000 万
1966. 3. 8	河北隆尧县	7. 2 级地震	死亡 8064 人
1970. 1. 5	云南通海	7. 7 级地震	死亡 15621 人
1975. 2. 4	辽宁海城	7. 3 级地震	死亡 1328 人

[1] 邹铭，2010，《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北京：科学出版社。

[2] 菅强，2009，《中国突发事件报告》，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3] 刘山勋，2005，《论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在我国的表现形式》，《辽宁警专学报》第 2 期。

[4] 张新文、罗倩倩，2011，《自然灾害救助中政府职能探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报》第 4 期。

续表 1

1975. 8. 7	河南板桥水库	堤坝垮塌	死亡 24 万
1976. 7. 28	河北唐山	7. 8 级地震	死亡 24. 2 万
1996 夏	湖南洞庭湖	水灾	死亡估计数万
1998 . 7	长江、松花江	特大洪水	死亡 4150 人
2008. 5. 12	汶川	8. 0 级地震	死亡 8 万多人
2009	西南五省	极端干旱	6130 多万人受灾
2010. 4. 14	青海玉树	7. 1 级地震	死亡 2064 人
2010. 8. 8	甘肃舟曲	特大泥石流	死亡 1417 人

二、农村自然灾害的相关因素

建国以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自然灾害的防治工作。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目前灾害管理在预警信息（如地震局、气象局、网络、媒体和科研中心）、机构设置（如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家防洪抗旱总指挥部和中国地震局等）、组织管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等方面相对完善；当前，农村自然灾害防控的不足之处主要在基层。具体而言有，基层危机意识较低、危机信息透明度不够、村组织力量薄弱、应急权责不清、资金投入不足、恢复重建不理想六个方面。

1. 危机意识淡薄

危机意识是整个危机管理的前提和核心。安全文化知识普及是公众“免疫力”提升的重要保证，是直接减灾最有效的方法途径。当前，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经常对全民进行危机意识的教育和自救互救技能的训练，模拟突发事件发生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逃生技能、急救知识等。而在我国农村，农民群众对自然灾害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感官经验阶段，较为朴素缺乏现代系统的科学统计，对减灾防灾认识不足。虽身处多灾多害之侧，却少有忧患意识，对灾害没有足够的心理、知识和物质准备。一旦发生灾害，往往措手不及，损失惨重。村组织亦是如此，危机意识淡薄。村干部对农村的意外灾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对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危机缺乏警惕性和应对力。一些村领导根本不知道“危机管理”为何物，更没有针对危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后，只能听天由命。另外，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深入发展，农民现在也习惯于将安全责任交给政府，忽视自身的首要责任。

2. 危机信息透明度不够

当前,我国危机信息在上下级政府之间沟通舒畅,但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隔阂。灾害事件所涉及的公共信息不同于国家安全信息,应该及时、公开、透明,以达到稳定社会和公众信心的目的。开展灾情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提高各级政府的灾害管理能力,开展社会公众灾害应对教育和演练。同时,公众了解各种灾害发生的过程,掌握一定的灾害自我保护的技能,也有利于增强全社会对于预防灾害的心理、行动和物质方面的应对能力。^[1]在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中,媒体所起到的传递灾情、传播政府指令、动员志愿者服务和社会捐赠作用是显著的。反之,如若灾情得不到及时、权威的公布,则会导致传言迅速蔓延,给农民正确识别和应对危机设置了障碍,不利于迅速处理危机和防止危机扩散。

3. 村组织力量薄弱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两级组织的制度性权力大大弱化,基层组织无力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物品,特别是无法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两级组织改革时,不但采取撤乡并镇和村组合并,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村民小组这个传递信息的乡土机构。因此,在面临农村公共危机时,一方面,村民小组缺乏信息传递人,导致信息反馈不及时,使得危机隔离出现延误,不利于农村公共危机的及时应对;另一方面,由于“村落合并”导致农村由“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农民的集体认同和行动单位发生了变化,因而在面对村庄公共危机时,村庄基层组织往往无力动员各个村民小组以采取集体行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2]

4. 应急权责不清

目前,中国的责任制正处在建设之中,还存在很多漏洞,特别是乡村一级。宏观来看,责任机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责任规定不明确。政府与社会、同级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层级之间。第二,责任监督缺失。监督县乡政府行政责任的主体有两类,一类是上级机关,一类是农民群众。乡镇作为政府系统的基层,距权力中心较远,其行动很少受上级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另外,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就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其监督作用现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监督的缺失更加剧了某些基层干部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三,责任追究难以落实。法律对于责任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有的法律中的责任甚至只针对整个组

[1] 邹逸江,2008,《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启示》,《灾害学》第1期。

[2] 郭占锋、李小云,2010,《关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若干问题》,《农业经济问题(月刊)》第8期。

织，没有追究到个人，造成了最后谁也不负责任，不了了之。甚至常常以党纪、政纪等较轻的责任方式取代较重的法律或政治责任。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责任制不能很好地实行，无法对基层官员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1]

5. 资金投入不足

许多农村社会突发事件之所以造成重大损害，从根本上讲，还是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所致。首先，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以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例，1978 年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3.4%，1990 年为 9.98%，2001 年为 7.71%。其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基建总支出的比重 1978 年为 12%，1990 年为 10.2%，1995 年为 3.09%，2001 年为 2.54%，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这就造成农业基础设施欠账太多。^[2]其次，地方政府也存在财政困难，无力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更不用说再有足够资金投入应急管理之中。依我国农村消防设施现状为例，在全国东、中、西 681 个行政村消防设施先进的仅占 2.9%，够用的也仅占 20.4%，两者总和还不足四分之一；消防设施简陋和不够用占了 32.3%，消防设施全无的村庄竟然占到总数的 44.4%。最后，农民由于缺乏资金及危机意识淡薄，基础设施安全性较差。以农村住房为例，农村住房在抗震、抗台方面存在很大不足。依据人居环境调查数据，农民住房抗震、抗台能力良好以上的约占 30%，一般的占 53%；在台风、地震面前比较脆弱的约占 17%，这里的 17% 并不仅仅是数字，一旦这 17% 的地区发生地震或台风，就意味着 17% 的生命和财产将遭到损失。

6. 恢复重建不理想

自然灾害往往对当地民众的生计系统和社会心理系统都造成很大的影响，且对不同群体所造成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这时灾后的评估规划对安抚人心，保持社会稳定，迅速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危机管理工作多止步于危机应急阶段，对灾后恢复视而不见。对于农村公共危机问题往往是单一的复原式处理，并不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更缺乏农村灾后综合发展规划机制。2009 年孙光德在陕西某县地震灾区发现，无论是贫困户和富裕户，在修建新房时一律补贴 2 万元，由于灾后建筑材料高涨，修建普通的房子都需要 6-7 万元，因此导致许多无存款且缺乏社会资本的贫困户无力重建新房。此外，灾后重建政策过于偏重改善农户住房环境，而忽视农户的生计可持续问题。如某县在灾后把全村 1/3 的水田作为新房宅基地，这为将来农户的生

[1] 赵灿芬，2010，《农村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刘兵，2004，《公共风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增收》，《农村社会》第 8 期。

计埋下了隐患。此外，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民很少或基本上没有购买意外灾害保险。在自己投入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又缺乏险支撑，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其恢复重建将异常艰难，灾后返贫、致贫率将大幅提升。

三、农村自然灾害的相关对策

农村自然灾害的防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想要在短期内转变农村自然灾害的现状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当前，我们应立足于农村现实，特别是农村经济、教育、文化落后，社会保障水平低，基层政府组织力量薄弱、管理不力的实情，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1. 提升安全意识

首先，要结合新农村文化建设，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板报、标语、短信以及各种农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减灾防灾宣传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减灾防灾知识宣传，使农民了解自己村庄所面临的灾害风险、特点及危害，使“减灾防灾”理念深入人心。其次，地方政府应组织农民在闲暇时开展应对诸如洪涝、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的演练，掌握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1]最后，应把自然灾害管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小学开设相关课程，并邀请家长陪同自己的孩子共同学习，通过模拟演练，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操作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家庭协调能力。

2. 及时公布危机信息

政府部门要将收集的危机信息及时公布出去。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不但可以防止信息的误传和谣言的散播，而且可以起到稳定民心、教育、监督等众多作用。如 2012 年 3 月 16 号下午，相继有两个谣言开始流传。谣言之一是日本电站发生了核泄漏，将会严重污染海水，而我国供应的食盐以海盐为主，因此将来生产的海盐都极不安全；谣言之二是我国供应的碘盐里含有碘，而碘可以帮助人们抵抗核辐射。随着谣言的迅速传播，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哄抢碘盐现象，导致市场碘盐供应断档，人心惶惶。因此，危机信息及时公布至关重要。此外，危机信息公布要符合农民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接收方式。最好是由当地权威部门通过官方微博、政府短信平台、官方网站、当地电视媒体予以公布，这样做可以使人们对疫情有个权威的认识，不至于受“谣言”的左右。

[1] 黄帝荣，2009，《关于增强农村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能力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第 4 期。

3. 完善村级组织

强化基层管理能够有效提升基层组织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农村许多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党的政策出现问题，而是基层执行不得力、歪曲政策或搁置执行所致。因此，要提升农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首先，要加强村组织建设。解决有人管事、有人办事的问题。其次，提升村干部素质。鼓励和引导村民选出有能力、有威信，既能带领大家致富奔小康、又能公平有效排除化解社会矛盾的村“两委班子”。最后，健全与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凡是村里的重大事项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都要及时向村民公开，充分发挥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作用，规范集体经济的财务管理。

4. 制定村级应急预案

农村作为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也是面临危机的最前沿。农民应该依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身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村组织制定本村应急预案时，应会同地方政府、村内企业、村民及专家共同协商。应急预案必须考虑到特殊群体（如残疾人、老人和儿童）的需要；危机发生时的撤离规划，包括撤离地点（撤离地点的食物、饮用水、医疗卫生、治安等）和撤离的交通工具；此外，还应考虑到环境、遗产和文化保护。在预案完成后，村组织还要对该预案进行定期演练，这既可以提高人们公共安全的意识和公共危机的应对能力，也可以检验预案的科学性，并对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修正。村组织应在第一时间向新迁入的居民提供公共危机应急预案，并宣传公共危机的相关知识。

5. 建设农村应急避难场所

有些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农村应建立应急避难场所。它不但可以解决村民在危机来临时的避难需求，而且能够使村民在灾难来临时有目标的撤离，避免因灾难的撤离混乱及民众惶恐心理。农村避难场所的设计应尽量位于村内安全地带同时也要考虑到大家的方便程度，使大家能够以最短时间到达避难场所。农村应急避难场所除配备基本生活物品，如饮用水、食物、厕所、医疗设备、通讯设施外，还应有明确指示标志，方便非本地人灾时使用。应急避难场所可以有多种用途，在保证应急功能的前提下平时可以用作休闲娱乐广场供人们休闲娱乐。

6. 参与主体多元化

农村自然灾害具有潜在性、突发性、大规模性、扩散性和不可抗拒性等特点，任何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都只能履行有限责任。因此，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农民、市场

组织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各行为主体在进行合作时要进行合理的定位。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转向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实现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非政府组织(NGO)是政府的有效补充,所以依法加强农村 NGO 组织建设,在农村自然灾害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广大农民既是自然灾害损害的对象,又是防范和化解危机最重要的主体力量。农民作为自然灾害治理主体之一,必须增强危机防范意识、掌握防范知识、加强道德建设和法制教育,积极参与危机防范。^[1]市场主体可以经政府允许承担部分危机管理工作,当然这种承担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如研发危机预警器材、培训危机管理人员、发展农村意外灾害保险等。

7. 完善灾后重建制度

面对农村自然灾害,灾后总结非常重要。有效的总结可以对潜在的公共危机事件提供预防和警示。公共危机事件一旦被控制、危机消除后,政府除了迅速查找发生灾害、事故的原因、进行事故分析评估、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危机后的重建工作,包括对财产、设备、生产、工作进行恢复以及受灾人员的心理恢复和治疗,成立相应的配套机构,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2]政府应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针对农民的生产问题,政府应以优惠补贴政策引导农民加入农业保险,使农民能够在灾后快速恢复生产。

参考文献:

- 郭占锋、李小云, 2010,《关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若干问题》,《农业经济问题(月刊)》第 8 期。
- 黄帝荣, 2009,《关于增强农村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能力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第 4 期。
- 营强, 2009,《中国突发事件报告》,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李霞, 2006,《提升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华东经济管理》第 9 期。
- 刘兵, 2004,《公共风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增收》,《农村社会》第 8 期。
- 刘山勋, 2005,《论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在我国的表现形式》,《辽宁警专学报》第 2 期。
- 张新文、罗倩倩, 2011,《自然灾害救助中政府职能探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报》第 4 期。

[1] 李霞, 2006,《提升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华东经济管理》第 9 期。

[2] 朱正威、张莹, 2006,《发达国家公共安全理念述论》,《深圳大学学报》第 1 期。

赵灿芬, 2010,《农村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朱正威、张莹, 2006,《发达国家公共安全理念述论》,《深圳大学学报》第 1 期。
邹铭, 2010,《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北京:科学出版社。
邹逸江, 2008,《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启示》,《灾害学》第 1 期。

本文已发表于《江西农业学报》2013 年第 3 期。

☆ 作者简介:顾金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邱 昊,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刘飞



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

聋人与主流社会融合研究

2007 级博士研究生：许巧仙 指导教师：施国庆 王毅杰

答辩时间：2012 年 5 月 3 日

关键词：聋人 文化适应 结构融合 心理融合 社会包容

摘 要：当前形势下，聋人群体融入社会的愿望十分强烈，但他们融入社会仍然困难重重。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保障聋人群体基本生活，积极发展聋人教育事业和促进聋人劳动就业，其目标是要让更多聋人适应社会、参与社会和共享社会各项文明成果，因此，对聋人与主流社会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本研究以 M 市青年聋人为研究对象，文献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对聋人与主流社会融合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聋人与主流社会融合表现为，在特定宏观社会背景制约下，受多元因素影响逐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和行为的过程，是与健听人构建相互关系并在心理层面完成整合的过程，还是健听人与聋人之间社会距离消减的过程。聋人与主流社会融合既不是他们单向适应主流社会，也不是同质地融入其中，而是双向互动、差异与分层融合的过程。聋人与主流社会融合可以从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心理融合和社会包容四个维度展开，借鉴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从聋人个体特征以及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方面考察影响融合的主要因素可以获得较为具体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通过对 M 市 N 学院 304 名聋人大学生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心理融合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聋人大学生社会融合整体水平不高，呈现差异和分层融合的特征，相当数量聋人大学生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处于困境之中；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影响聋人大学生不同维度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不同，一些因素对聋人大学生与主流社会融合的某个维度有显著影响，另一些因素如聋人大学生的性别、受教育方式对三个维度融合都有显著影响，部分研究假设得到验证，部分研究假设没有得到验证。

通过对 M 市 445 名健听人对聋人社会包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主流社会对聋人的包容有待进一步提高,微观层面健听人的户口、性别、受教育水平和聋健空间隔离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发现,缺失听力补偿和康复训练机会导致大部分聋人大学生有声语言沟通困难;不恰当的家庭教育观念和行为会影响聋人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随班就读和聋人特殊教育质量不高扩大了聋人和健听人之间的差距;手语翻译等沟通无障碍支持不足导致聋人和健听人隔离;空间隔离影响了健听人对聋人的社会包容。本研究最后从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提出了促进聋人社会融合的建议。

环境意识及行为影响因素差异研究

——基于新生态范式下的人群比较

2007 级博士毕业生: 仲 秋 指导教师: 施国庆 王毅杰

答辩时间: 2012 年 5 月 3 日

关键词: 环境意识 环境行为 新生态范式 价值-信念-规范模型 城市农村 迁移者

摘 要: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背景下,以新生态范式为基础,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作为分析研究对象,对城市居民、迁移者、农村居民三类人群[1]各自的环境意识水平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解析,并探讨环境意识指导下的环境行为形成机制。

以问卷调查方法为主体,数据主要采用频数分析和回归分析;全文贯穿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城市居民、迁移者和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问卷 1067 份,有效问卷 1008 份,最终纳入符合三类人群基本特征的 816 个样本进行研究分析。

研究发现:①三类群体的环境意识水平存在差异,其中,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最高,迁移者次之,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水平最低;②城市居民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环境意识的解释力最低;与之相对,农村居民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环境意识的解释力最高;迁移者居中;③影响环境意识水平的要素中,农村居民对应的变量是年龄、科学主义和受教育程度,城市居民对应的变量是受教育程度、是否遭受过环境污染和环境知识得分,迁移者对应的变量是相对污染、受教育程度、是否遭受过环境污染和科学主义;④划分

为环保意愿、环保行动和环境抗争三个维度的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联系并不密切。除抽象的环保意愿外，环保行动和环境抗争的程度与环境意识水平没有显著联系；⑤通过激活要素能够使得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建立联系，但三类人群的激活要素并不相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激活要素是“后果意识”和“责任归属”，迁移者的环境行为在环境意识提升的基础上，由“外部规范内化”和“家园认同感提升”共同完成，在激活要素上表现为“城市居住时间”。

小组计件制下的赶工游戏 ——对一家私企工人劳动过程的研究

2010 级博士研究生：王开庆 指导老师：王毅杰

答辩时间：2012 年 12 月 5 日

关键词：私营企业 劳动过程 小组计件制 自愿性顺从 赶工

摘 要：基于三个月的田野调查，本文探讨了没有严格管理制度的私营企业，工人为什么努力工作，为什么心甘情愿接受资本的剥削？

开发区的发展看似给城边村的农村妇女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当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发现劳动力市场存在由社会文化、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多重区隔，而只能进行十分有限的选择。她们在有限的选择下进入工作场所后，发现自己完全暴露在市场之中，得不到任何保护。但是车间内却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

工厂纪律以及摄像头的监控力图规训“散漫”、“小偷小摸”的“农民性”；空间分配与性别、技术相互交织，形塑着工人的认同与行为。这些微观权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工人的行为，但并不能保证工人卖命的工作，也就是无法解释工作场景中的“热火朝天”，从而我转向了对薪资制度的分析。

分析发现，国邦的小组计件制其实是一种计时制，以计件制的表现掩饰了计时制的本质，这样的组合共同完成了既取得又掩饰剩余价值。而掩饰是靠计件制运作的效应来完成的。在计件制下，工人产生了“掌控收入”、“挣多挣少全凭自己”、以及“纯劳动”等意识。这些意识不仅掩饰了计件制是计时制的本质，而且强化了资本家和工人劳动力商品化的共识。也就是说，薪资制度运作本身及工人对薪资制度的体会，也有自愿性顺

从的效应。

小组计件制的一个重要效果是赶工，赶工游戏激起了工人异常努力的工作，产生了对游戏规则的同感，使工人自发接受工厂秩序，投身于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那么工人为何选择赶工？既源自养家糊口无从选择必须工作的压力以及强制性文化所带来的压力，也是为了获得劳动所带来的自豪感、成就感、愉悦性、“气”的释放以及社会性消费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劳动的意义和工作现场的强制性文化系统相结合，使工人更加努力的工作。

此外，小组计件制以及由此所带的赶工还形塑了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结构性矛盾的社会关系反而强化了工人的赶工。

从“漏网捕鱼”到“一网打尽”

——海洋捕捞方式转变的原因与影响

2010 级博士研究生：唐国建 指导教师：陈阿江

答辩时间：2012 年 12 月 5 日

关键词：环境行为 自然资源的有限所有 生存策略 生存空间

摘 要：基于环境社会学的视野，本文以海洋捕捞及其可选择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海洋捕捞方式的转变及其原因与影响。全文运用了文献法和实地研究的方法，通过结合微观的案例研究和宏观的功能分析，试图阐释渔民因何选择竭泽而渔式的捕捞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力图为构建可持续的捕捞方式提供建议。

传统海洋渔民选择的是“漏网捕鱼”。这是一种有限的捕捞。首先，基于传统工艺的木帆船和简单的辅助工具迫使渔民只能在熟悉的海域中活动，而低耐用度的棉麻网限制了渔民的作业时间。其次，渔获物的物物交易模式和以剥削为主的雇佣制渔业经济组织阻碍了渔民生产规模的扩大；政府为确保海防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制约了渔民的日常生产活动；海神信仰和祖辈经验积累而成的习俗行规在心理上控制了渔民在作业过程中的肆意行为。

现代海洋渔民选择的是“一网打尽”。这是一种无限的捕捞。首先，大功率的钢壳船、坚韧细密的网具和先进的辅助工具确保了渔民可以在整个海域中进行全年候的作

业。其次，以竞争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为渔民和渔业公司选择“一网打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海洋渔业管理的弱约束和渔业补贴的强刺激为“一网打尽”提供了政策维护机制；海洋神灵的退隐和传统价值的丧失使得渔民的捕捞活动没有任何的心理约束。

从“漏网捕鱼”转向“一网打尽”，原动力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需求。但是，以产权为核心的现代海洋渔业管理制度诱使着渔民去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以竞争为原则的现代渔业经济体系成为迫使渔民选择“一网打尽”的强制力量。捕捞方式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而这个危机通过影响渔民群体之间的关系促发了海洋渔业社区的崩溃。

应对捕捞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渔业资源枯竭问题，需要一种可持续的海洋捕捞方式。这种可持续的捕捞方式应该体现为有发展的捕捞、有限制的市场和有限理性的消费，它的实现需要由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系统提供相应的支撑条件。技术提供的只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工具，实现海洋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均衡仍将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发挥。